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論文

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歷程與原生家庭關係
之影響探究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dult women's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trauma and their original family relationship

指導教授：陳慧女 博士

林明傑 博士

研究生：曾莉雅 撰

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 十二月





國立中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

犯罪防治學系

研究生 曾莉雅 所提之論文

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歷程與原生家庭關係之影響探究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碩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召集人

陳增毅

簽章

委員

陳慧中

陳增毅

林明保

盧鴻文

指導教授

陳慧中 林明保

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謝誌

由衷感謝陳慧女老師、林明傑老師的細心指導與照顧；

感謝口試委員陳增穎老師、盧鴻文老師的建議和指教；

感謝碩班導師簡美華教授的學術指引；

感謝勵馨基金會、吳督導幸芳、楊督導菁惠、鍾專員予晴的協訪聯繫；

感謝社工淑圓、社工千誼協助與受訪者聯絡及溝通；

感謝父母的包容和信任；

感謝一路上遇見的溫暖人們所給予的支持與鼓勵。

本文謹獻給五位溫柔而有力量的受訪者。



曾莉雅 謹誌於

國立中正大學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





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歷程與原生家庭關係之影響探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生命史方法，經立意取樣邀請五位成年女性參與研究。探討兒時遭遇性侵害之知覺及揭露兒時性創傷經驗的歷程與影響，以及其與原生家庭關係之動態發展。

研究發現原生家庭功能失調是增加性侵害發生的風險之一。多數受訪者幼時對於性侵害行為懵然未覺，直到發現不對時已落入驚懼害怕、抗拒排斥及麻木隱忍的循環迴圈，生心理、人際互動和日常生活所遭受的創傷影響更是如影隨形。然而，受訪女性對於加害者與兒時性創傷事件隨著生命歷程產生不同的解讀與意義。

揭露或不揭露是來自個體、人際與社會層面之推力與阻力的斡旋。不論兒童或成年時期的揭露都有其目的性，受訪者大部分採間接的方式向信任之對象揭發事件。缺乏凝聚力的家庭常有負向反應，互動良好的家庭未必會展現正向支持，但是受訪者知覺大部分非施虐家庭成員的立場與態度有轉變可能性，與原生家庭關係亦會隨之變化。揭露後所得之正向和負向回應皆於生態系統中交織作用，破壞或修復受訪女性的人生。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當前生態層次系統無法區辨揭露後所知覺之正、負向回應分別受到五個層次多大的影響，且在個體與環境的適配度中忽略個體的主動權能，在理論應用上宜考量個體的心理韌性，並建構各層次的影響力排序。實務工作加強兒童及家長對於性侵害的認知能力，提升性侵害相關執法人員、社福機構的專業知能，落實減述流程，創造更友善的環境。未來可同時邀請親子受訪討論彼此知覺原生家庭的變化與差異，或從事縱貫性研究探索遭遇兒時性創傷女性在不同人生發展階段與原生家庭之互動關係。

關鍵字：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原生家庭、家庭關係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dult women's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trauma and their original family relationship

Abstract

Purposive sampling of 5 female survivors were interviewed in a life history research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which explored the early adulthood women's experience of child sexual abuse, the disclosure of CSA, an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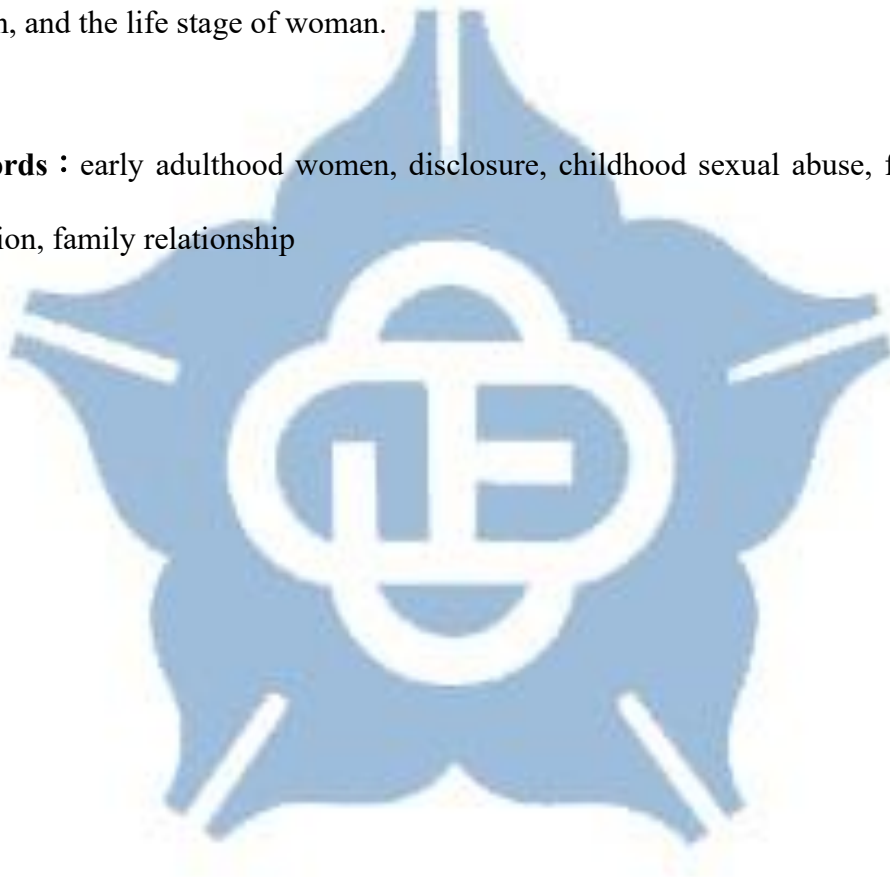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Dysfunction of the fami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CSA. Most respondents were unaware of sexual abuse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had fallen into a cycle of fear, resistance, and numbness until they found out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The impact of trauma 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daily life was stuck nightmare.

The decision of disclose or not was the mediation of assists and barriers from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levels. No matter what age the victims are in, disclosure must have a purpose for them. Most respondents reported CSA to trusted objects indirectly. Lack of cohesion in the family were related to negative rea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ealthy family didn't always show positive responses. However, the attitudes of most non-abusive family members were flexible. All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were intertwined in Ecological Systems, destroying or repairing the lives of the women interview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current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couldn't show how muc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after disclosure were affected by the five systems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pondents' empowerment was ignored in goodness-of-fi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researcher proposed ranking the influence of each system and considering individual

resilience. In practical work, for creating a more 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er recommended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CSA of both child and parent,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e sexual assault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implementing the directions on relieving the victims from repeated statements. Future research could invite both parents and child to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to compare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in each other's perception of the original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conduct a longitudinal stud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SA,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nd the life stage of 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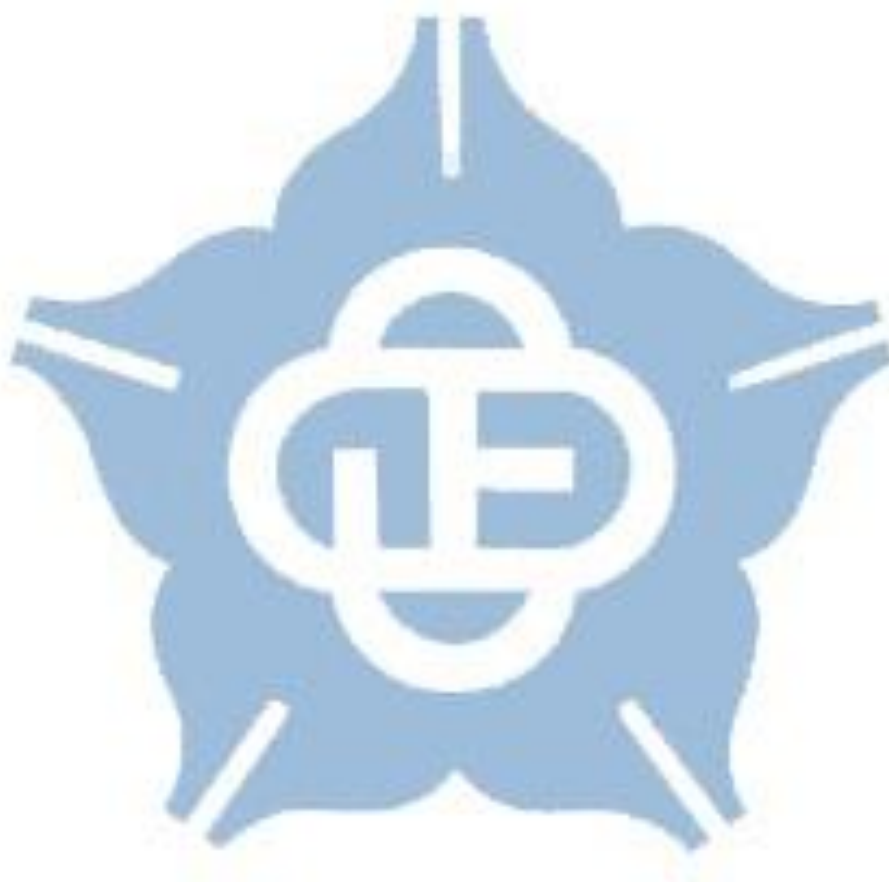
Key words : early adulthood women, disclosure, childhood sexual abuse, family of orient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



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問題嚴重性..... | 1 |
|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 4 |
|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6 |
| 第四節 名詞定義..... | 6 |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
| 第一節 兒時性創傷對女性之長期影響..... | 9 |
| 第二節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 | 16 |
| 第三節 女性生命歷程與原生家庭之關聯性..... | 32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43 |
|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 | 43 |
| 第二節 研究工具..... | 43 |
|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 45 |
|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流程..... | 47 |
| 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 49 |
| 第六節 研究倫理..... | 52 |
|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 55 |
| 第一節 受訪者的生命故事..... | 55 |
| 第二節 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 63 |
| 第三節 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 | 77 |
| 第四節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與影響..... | 93 |
| 第五章 研究討論與建議..... | 115 |
|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 115 |
|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 131 |

| | |
|------------------|-----|
| 參考文獻..... | 139 |
| 一、中文部分..... | 139 |
| 二、英文部分..... | 144 |
| 附錄一、訪談大綱..... | 178 |
| 附錄二、訪談邀請函..... | 181 |
| 附錄三、訪談同意書..... | 182 |
| 附錄四、同意研究證明書..... | 186 |



表次

| | |
|--------------------------|----|
| 表 3-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 46 |
| 表 3-5-1 編碼範例 | 50 |
| 表 3-5-2 主題歸類 | 51 |
| 表 3-5-3 主題精緻化 | 51 |
| 表 3-5-4 主題目的、意義與範圍 | 52 |



圖次

| | |
|--|-----|
| 圖 2-2-1 OMARZU 的揭露決策模式..... | 20 |
| 圖 2-2-2 CHAUDOIR 和 FISHER 的揭露程序模式..... | 21 |
| 圖 2-2-3 本研究揭露歷程構想..... | 23 |
| 圖 2-2-4 阻礙揭露兒時性侵害的三層級..... | 28 |
| 圖 2-3-1 代間關係圖..... | 34 |
| 圖 4-1-1 小葵的家系圖..... | 56 |
| 圖 4-1-2 忘憂的家系圖..... | 58 |
| 圖 4-1-3 薔薇的家系圖..... | 59 |
| 圖 4-1-4 鈴蘭的家系圖..... | 61 |
| 圖 4-1-5 天星的家系圖..... | 62 |
| 圖 4-2-1 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 77 |
| 圖 4-3-1 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 | 92 |
| 圖 4-4-1 揭露的發展軸..... | 113 |
| 圖 5-1-1 成年女性與原生家庭關係圖..... | 118 |
| 圖 5-1-2 兒時性創傷經驗與創傷影響概念圖..... | 122 |
| 圖 5-1-3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與影響..... | 128 |
| 圖 5-1-4 揭露後原生家庭關係之變化..... | 131 |

第一章 緒論

大部分的人回想兒時情景普遍是充滿著陽光與歡笑；有些人的回憶卻是陰暗且荊棘遍佈。遭遇兒時性創傷是成年女性生命中無法輕易抹殺和遺忘的烙印，復原之路漫漫。本文深入探索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並討論其與原生家庭親子關係發展之關聯性。

第一節 問題嚴重性

全球約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自述兒時曾遭受身體虐待，其中每五位成年女性和每十三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兒時曾經遭受性侵害（Child Sexual Abus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美國 2020 的年度統計資料顯示，總共有 618,399 位兒童遭遇不當對待（child maltreatment），其中的 9.4%（58,130 人）遭遇性侵害、0.2%（1,237 人）從事性交易，12 歲以下有 499,010 人（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22）。儘管這個數字可能是低估的，卻足以說明兒童性侵害是不可忽視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

彭淋等人（2013）的事後回顧研究顯示，近 10 年中國境內兒童性侵害的發生率為 18.2%。Chan（2011）訪談 5,049 位香港居民發現，其中 0.9% 曾遭遇兒時性侵害。此兩項華人社會的研究顯示出遭遇兒童性侵害似乎有性別上的差異，女性受害的比率高於男性。該結果與西方社會的實證研究結果一致，如：Opydo-Szymaczek 等人（2018）、Sawyer 和 Bagley（2017）、Sethi 等人（2013）。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的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加害者和受害者彼此不認識的案件約 10%，加害者為家人的比例約為 23%。2019-2021 年平均每年約 7,633 位兒童遭遇不當身體對待，其中受性侵害人數約 2,979 人，女童受害數為男童的五倍（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上述通報數據顯示：兒少是性侵害的高風險群。除了發展階段的認知能力、生理體型、表達能力受限

之外，實證資料也彰顯不少遭受兒時性侵害者對性侵害行為之理解有限，直至青少年期發育階段與性知識的習得後才知悉該行為的不當性（Bussey & Grimbeck, 1995）。

兒童時期遭遇性侵害可能引發受害兒童身心及自我形象上一連串明顯的短期和長期創傷反應，影響期間由數天到數週、數年，甚至存續於受害者一生（Lewis et al., 2016; Talmon & Ginzburg, 2018）。或許是因為受害者會持續內化和外化其創傷症狀，如：青少年時期女性的內化性問題尤其更趨嚴重（Lewis et al., 2016）。

以短期負向影響來看，受害兒童可能出現焦慮、憂鬱、自我效能下降、缺乏自信、身體疼痛；行為上有攻擊、自傷，甚至有不適當的性化行為展現（Tyler et al., 2008）。長期創傷反應則有異質性，為受害者生心理、行為或人際界線帶來各種負向衝擊（Latzman & Latzman, 2015）。

在生理層面，受害者可能患有複雜且多樣的健康問題（Sigurdardottir & Halldorsdottir, 2018; Sigurdardottir et al., 2014）。常見的狀況如：身體疾病及不適感（Sawyerr & Bagley, 2017）、慢性疼痛（Sigurdardottir & Halldorsdottir, 2018）、睡眠障礙（Mansbach-Kleinfeld et al., 2015）、生殖器受傷或感染、性病感染和懷孕等情形（Adams et al., 2018），甚至有肥胖、飲食失調或進食障礙（Opydo-Szymaczek et al., 2018）。

心理層面罹患情感性疾患的風險較高（如：Chang et al., 2018; Ensink et al., 2016; Mansbach-Kleinfeld et al., 2015; Palo & Gilbert, 2015; Sawyerr & Bagley, 2017），也易產生負面認知、負向情緒，以及低自我價值（Sawyerr & Bagley, 2017; Kilimnik & Meston, 2016）。只要在童年時期經歷一次性侵害，都可能提高成年後患有心理疾病的機會（Rehan et al., 2019）。但，是否會出現嚴重的心理疾患則需考量受害者個體差異（Ensink et al., 2020）。

有些受害者可能出現一些行為問題，如：危險性行為（Kilimnik & Meston, 2016）、遭受霸凌或霸凌他人（Mansbach-Kleinfeld et al., 2015）、藥物濫用（Sawyerr

& Bagley, 2017)，或出現自殘及自殺企圖（Talmon & Ginzburg, 2018 ; Radford et al., 2013）。

性侵害是一種侵入個體私密身體界限的行為，受害者喪失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破壞或扭曲其對身體界限之認知（Talmon & Ginzburg，2017）。其引發和他人接觸時不舒服感的升高（Talmon & Ginzburg, 2018），並影響個人的界限（楊思芳、丁原郁，2017）。

在性侵害事件中，是否選擇揭露（disclosure）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兒童不願揭露的主要原因是恐懼（Collin-Ve'zina et al., 2015）。其他導致延遲揭露性侵害事件的因素，如：缺乏性方面的知識（不知道性侵害是什麼）（Brazelton, 2015）、來自加害者的壓力或威脅、考量和加害者的關係（Malloy et al., 2011）與缺乏開口的機會（McElvaney & Culhane, 2015）。

社會文化脈絡的阻力，或許可顯現在基於家族顏面、父權體制、對長輩的孝順與遵從權威、由於女性貞操所引發之強烈羞愧感、性禁忌（Fontes & Plummer, 2010）、權力不平衡的混亂家庭結構（Collin-Ve'zina et al., 2015），而影響向父母、主要照顧者或重要他人揭露兒時性侵害的經驗和深度。Xiao 和 Smith-Prince（2015）的研究發現，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影響多數亞洲人，為了保全家族顏面，而選擇延遲或避免揭露。

當性侵害的加害者是家庭成員或有如同家人間親密感的對象時，揭露更顯得困難，常是事隔多年後受害者才開口述說（Scho'nbucher et al., 2012）。顯示著與加害者的關係是影響揭露的因素之一（Easton, 2013）。除了社會污名化的影響外，權力不對等和當時教養關係，皆可能導致受害者不立即揭露遭遇性侵害（Leclerc & Wortley, 2015）。

當兒童揭露遭遇性侵害，成年人（如：父母、師長）有能力提供支持和協助，以及幫助兒童脫離受虐情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15）。一項研究發現，及時獲得社會支持可以降低各年齡層受害者罹患心理疾病的風險

(Alaggia et al., 2019)。與父母擁有良好安全的依附關係，更能減緩受害者心理疾患和憂鬱的可能性 (Cantón-Cortés et al., 2015)。但是，家庭成員及關係是否會因為性侵害而受到挑戰也令人深思。

非施虐父母在得知子女可能遭到性侵害後，大部分會經歷嚴重的情緒和心理困擾 (Fong et al., 2017)，如：憤怒、憂鬱以及罪惡感 (Jobe-Shields et al., 2016)。對子女的擔憂、對自身教養能力的負向信念、家庭成員的行為和舉止改變，以及自己過去的性侵或虐待經歷記憶重現，常是困擾非施虐主要照顧者的因素 (Fong et al., 2017)。事後的處理和隨後而來的調查過程也會對家庭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力 (Tavkar & Hansen, 2011)，可能導致家庭的動力、主要照顧者的情感需求和支持網絡的改變 (van Toledo & Seymour, 2013)。當加害者為家庭成員時，家庭關係的變化更是複雜難解。受害者不易受到保護與信任，或遭受長輩指責 (Catherall, 2005)。曾遭遇性創傷的女性與原生家庭的親子互動關係，對於其考量是否揭露，以及揭露後的家庭關係變化的影響，均應受到重視。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兒童性侵害案件因犯罪型態本身不易覺察，常因缺乏目擊者和明顯外傷致使蒐證上有難度 (Wiley, 2009)。家庭功能不彰、父權思想與傳統社會文化的抑制，使得通報案件數常僅反映問題的冰山一角。目前國內針對因應兒時性侵害之研究已陸續出版一些相關實證研究及翻譯書籍，如：李維倫 (2017)、洪素珍與王珮妤 (2004)、陳慧女與廖鳳池 (2006)、鄭怡欣與黃宗堅 (2012)、蔡秀玲與王淑娟 (譯) (2002)、賴姘臻 (2016)、簡美華 (2008)，但仍值得更多研究予以探索。

現有關注受害者原生家庭經驗的文獻主要探討的範疇有三類：導致受害風險增加的家庭型態、父母的教養方式對於受害者調適創傷症狀的影響，以及受害者成為父母的親職經驗。

通常家庭功能失調，包含：家庭關係疏離、父母關係緊張 (Cabbigat & Kangas,

2018)、有婚姻暴力行為(Ramírez et al., 2011)、缺乏監護功能 (Testa et al., 2011)、親子關係較差 (Cabbigat & Kangas, 2018), 是增加兒童性侵害發生風險的情境脈絡之一。

兒童的重要他人, 如: 父母、主要照顧者、治療師, 可助長心理成長 (賴紹臻, 2016)。研究顯示若家庭提供支持、父母親職功能較佳, 將減緩遭遇性侵害的兒童身心受害的程度 (陳慧女、廖鳳池, 2006)。若父母採用正向且溫暖的方式教養兒童, 可使受害兒童在成長過程展現生命韌性。但是, 過度保護與威權的方式反使受害兒童較難從性侵害中復原 (Lind et al., 2018)。兒童時期揭露性侵害事件能為父母或成年人理解且相信, 將減少受害人自責的程度 (Pitzer, & Fingerman, 2010)。成年階段獲得家人、朋友的心理及社會支持, 對於兒時遭遇性侵害者有調節或緩衝心理健康之效果 (Wyatt & Mickey, 1987)。

性創傷影響衝擊日後為人父母之經驗, 例如: 擔心女兒遭受性侵害、期許自己成為好母親或好父親, 若女兒遭受性侵害, 受害者會深感自責, 並可能致使性創傷記憶重現 (陳慧女, 2011)。如何調適自我並重新定位父職或母職角色, 將是受害女性的新挑戰。

對於遭遇兒時性創傷的女性與原生家庭關係的動態變化, 目前的實證研究仍相當少。父母是兒童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對其生理和心理發展都極具影響力 (Sullivan, 1953)。對性侵害者而言, 原生家庭可能是壓力源, 同時是獲得支持的機會 (Musliner, & Singer, 2014)。在姚淑文 (2001) 的研究中, 強調傳統社會中父母角色責任的不同, 導致非施虐父母在面對性侵害事件可能有不同的因應。另一研究則發現, 在危機情況下, 父母因為對子女的擔憂, 動員了所有的能力資源來協助兒童 (Cyr et al., 2014), 不受傳統的父母角色功能區分侷限。是以, 對於父母在面對兒童揭露遭遇兒時性侵害時, 是否因其性別不同而有異同, 仍需要進一步檢視。

生命韌性 (resilience), 通常定義為成功適應逆境的動態過程 (Luthar et al.,

2000)。其可以解釋有些兒童期遭受虐待的受害者成年後的健康狀況不佳，但是有些受害人有相對較好的健康和狀態（Pitzer, & Fingerman, 2010）。一些研究發現：兒童本身具有自我復原的力量，例如：正向認知因應（Newsom, 2013）、優勢、原諒（Bogar & Hulse-Killacky, 2006）。非施虐主要照顧者或其他重要他人的支持與正向關係，有助於減輕兒時性侵害的負向影響，亦能增強生命韌性（Cyr et al., 2014; Musliner, & Singer, 2014; van Toledo & Seymour, 2013）。只是，當事人索求的支持與良好關係是否能夠無限供給與維持，或許尚有待討論。受害者與原生家庭關係的動態發展和性創傷經驗之關聯性，以及與個人生命歷程發展的交互影響，皆值得深入分析與探究。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遭遇兒時性侵害之成年女性揭露事件的心路歷程，以及在揭露後與原生家庭關係的變化會對她們帶來哪些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 一、瞭解成年女性知覺兒時性侵害經驗的過程與影響？
- 二、探索當事人揭露的歷程？（如：揭露的方式、時間點、揭露的推力與助力、對象、目的、揭露對象的反應、揭露的關係變化等）
- 三、向非施虐家庭成員揭露前後，與原生家庭關係之動態發展？

第四節 名詞定義

為使本研究相關概念清晰明確以利研究之進行與分析，界定本研究重要名詞如下：

一、揭露

在兒童階段或成年階段，採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偶發、回應他人詢問或引導，以及有意為之，向任何第三方敘說兒時性侵害事件的發生。

二、兒時性創傷

根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2 條之規定：「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欲探討成年女性的兒時性侵害經驗，以發生在 12 歲以前的性侵害經驗為主要探討範疇。在 12-18 歲間，由於女性的身心發展漸趨成熟當中，且涉及相關議題可能更複雜，對生心理的影響漸趨廣泛，非本研究主題所欲探討的領域，故排除此時期發生之性侵害行為。

三、成年女性

成年早期的年齡區間從最小 17 歲至最大 45 歲，每個研究有不同界定（見：李淑杏等，2021；張慧芝譯，2014；張宏哲等譯，2018；陳彰惠、楊玉娥，2013）。考量當代社會脈絡、個人生命歷程、敘事能力，以及首婚年齡的提高，並給予揭露當事人適切的沉澱與緩和時間，本研究將成年女性界定為介於 20-45 歲間之女性（含已婚、離婚或喪偶）。

四、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是指從己身所出，至少包括自己、父母和祖父母三代的家庭（林國亮，2004）。其為個體所待最久的，與主要照顧者互動影響深遠且廣泛的環境（楊惠敏，2005）。本研究之原生家庭為成年女性所出生的家庭，包括當事人與其父母兩代。

五、加害者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對於性侵害及性剝削的定義。本研究之加害者為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兒少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猥褻、從事色情有關情事之剝削謀利者，且不限於家庭內或外的人員。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從生態觀點探討兒童性侵害對受害女性之長期影響，瞭解其向非施虐父母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以及探究不同生命階段與原生家庭之關係變化。

第一節 兒時性創傷對女性之長期影響

生態觀點引用生態學中有關生物與其棲息地 (habitat) 的交流與調適過程 (Gitterman et al., 2020)。可藉由生態觀點探討兒童遭遇性侵害之長期影響，聚焦兒童性侵害與五個系統之交流。

一、兒童性侵害之定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的定義，兒童涉入一項因他或她身體及心智年齡尚未發育成熟而無法完全理解 (且缺乏知情同意的權力) 的性行為，是為兒童性侵害 (Child Sexual Abuse)。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受害兒童和加害者的年齡及關係未明確定義，可能發生在兒童與成年人，或兒童與另一個在年齡或身心發展上相較可負起行為責任，並掌握權力關係的兒童之間，旨在滿足或取悅另一個人的性需求。至於性行為類型，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包括：(1) 暴力、脅迫或誘使兒童從事非法性行為；(2) 強迫兒童從事非法性交易；(3) 利用兒童進行性剝削以謀利。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明定，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這些法條表明，對於成年及未成年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甚至利用權勢或機會而為性交或猥褻者，皆屬性侵害犯罪。

實證研究的報告上對兒童性侵害的定義未見共識 (Sumner et al., 2015; Mathews & Collin-Verzina, 2019)。如：兒童年齡的定義、遭遇性侵害的程度與頻率、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係，常使兒童性侵害研究之嚴謹性遭質疑。

從兒童身心發展階段來看，性侵害破壞人際間基本的信任感（Ensink et al., 2020）。受害兒童與加害者間呈現權力不對等（Cooky, 2012），認知能力亦有差異（Mcguire, & London, 2019）。有時加害者會以秘密此一概念強迫受害者隱瞞事件（Magnusson et al., 2017）。這些現象皆造成界定兒童性侵害的困難，也意味著兒童性侵害之特性與成人性侵害之根本性差異，應考量兒童之心智發展與反應能力，不能僅以刑法或成人觀點狹隘定義。

多數國家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之界定：兒童為未滿十八歲者。但本研究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二條，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者。將兒童性侵害定義為年滿十二歲前，遭遇暴力、脅迫或誘使從事性的行為（從身體撫摸至強制性交），且不限定加害者和受害者年齡間距。

二、從生態觀點探討兒童遭遇性侵害之長期影響：當事人與環境的適配程度 （goodness-of-fit）

發生性侵害打破兒童和環境的適配程度，成功調和與否影響日後的身心適應情況。

（一）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

生態系統理論假定有機體為附屬於環境體系內的次系統，並與大自然組合成一個完整系統（Von Bertalanffy, 1971；引自張紉等譯，2019）。正向或負向的系統回饋，決定每個系統的開放或封閉、穩定或不穩定狀態（潘淑滿，2000）。生態系統理論的人與環境相互適應（mutual adaptation）一概念，可運用於說明個體的一生是一連串適應外在環境變遷的過程，個體也會試圖改變外在環境來滿足需求，兩者間為一不斷相互轉換（transaction）的歷程（張紉等譯，2019；許臨高，2016）。

人在環境中的交流與轉換是複雜且非線性的（Gitterman & Germain, 1996；引自黃松林等譯，2018）。個體與環境在互動過程中交互影響，努力朝向最佳的

調和度（宋麗玉等，2012）。適應力好者能順利成長，且對生活感到滿意，達到良好適配程度（good fit）（Gitterman et al., 2020）；反之，妨礙生理、心理或社會的需求（Germain, 1979；引自許臨高，2016）。

個體所經歷的「問題」非僅是個人病態或偏差之結果（宋麗玉等，2012），乃因人與環境和其需求、能力、權利及志向之間配合不良而出現（Gitterman & Germain, 1996；引自黃松林等譯，2018）。當個體需求和環境間的平衡受到破壞，且超過個體可應付的範圍，就會產生壓力（林萬億，2013）。生態觀點的生活模式（Life Model）主張壓力來自：生活的轉變（life transitions）、外在環境的壓力與人際過程（interpersonal processes）（許臨高，2016）。

生態觀點有四個相互關聯要素：（1）個人和環境脈絡間動態關係形塑發展過程；（2）個體的生理、認知、情緒、行為和特徵對其發展過程具影響；（3）發展的環境脈絡（the context for human）必須予以考量；（4）生命週期會因時間多維向度而有變化（Bronfenbrenner, 1995；引自 Gitterman et al., 2020）。女性在兒童階段遭遇性侵害事件是非預期性的重大轉變事件，勢必對其生活有重大的危機。當受害女性無法從社會環境獲得足夠資源、人際過程中遭遇壓力時，對其長期影響不容忽略。

（二）從 Bronfenbrenner 生態層次系統探討兒童性侵害與各系統之相互影響

個體的一生與環境相依互動，經由不斷地調適來維持其動態平衡狀態（Bronfenbrenner, 1979；引自溫信學，2021）。以下從 Bronfenbrenner 和 Morris（1998）的微視、中介、外部、鉅視及時間系統五個面向，探討兒時遭遇性侵害之衝擊。

1. 微視系統（micro-system）

在微視系統中，遭遇性侵害的創傷反應受到個人特質（如：性別、年齡和歸因風格），和與其有直接互動關係之的人、事、物與環境的影響，例如：能夠訴說事件的朋友、擁有良好社會凝聚力的鄰里關係和家庭功能角色的發揮。

(1) 個人特質

目前的研究仍未能檢證性別在性侵害的負向影響上是否有所差異 (Gallo et al., 2018; Maikovitch-Fong & Jaffee, 2010)。已有的研究顯示，女性受害者易將痛苦內化 (Gray & Rarick, 2017; Montgomery et al., 2015)。女性常有的症狀包括自傷及自殺行為 (Diniz et al., 2019)，以及心理疾患。例如：焦慮、憂鬱 (Sawyer & Bagley, 2017; Ensink et al., 2016)、情緒調節困難 (Chang et al., 2018)、睡眠問題 (Mansbach-Kleinfeld et al., 2015)、躁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 (Palo & Gilbert, 2015)。

在兒童時期遭遇性侵害，因溝通能力有限和無法理解行為的不適當性，可能更易引發創傷 (Kumar et al., 2017)。將近一半的兒時遭受性侵害者初經提早至 11 歲前 (平均初經年齡為 12.5 歲) (Boynton-Jarrett et al., 2013)。有些受害兒童出現與年齡不符的性動作或行為 (Wager et al., 2016)。有些在發展至青少年階段表現高風險性行為，如：過早性行為 (Draucker & Mazurczyk, 2013)、不安全性行為 (unprotected intercourse)、多重性伴侶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懷孕或使女性伴侶懷孕 (Homma et al., 2012)。但一些在青少年時期，反而對性表現厭惡與反感 (陳昱如、周愨嫻, 2016)。成年後亦可能因性創傷經驗引發性方面的問題，如：性功能障礙 (Pulverman et al., 2018)、性冷感或性成癮 (Vaillancourt-Morela et al., 2015)、對性關係不滿意、性交疼痛 (Rellini & Meston, 2011; Desrochers et al., 2010)，以及恐懼婦科檢查 (Talmon & Ginzburg, 2017)。

根據 Weiner (1979) 的歸因論觀點，遭遇兒童性侵害當事人可能將性侵害歸諸於內在因素，如：我不夠聰明、應得懲罰。目前研究顯示：受害兒童對性別角色的態度較為保守時，傾向內在歸因 (Okur et al., 2019)。例如：易產生侵入思考 (intrusive thought)、逃避症狀 (avoidance symptoms)、憂鬱症狀 (depressive symptoms) 和創傷後壓力症 (Kennedy & Prock, 2018)，其與內在歸因之關聯性

值得重視。對性侵害採外在歸因的兒童，衝擊對人的信任度及無能力感（Feiring et al., 2002）。例如：缺乏正向態度、過度疏離或過度討好他人、無法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McGregor, 2008）。也常見缺乏安全感、易有不信任感、出現不安全或混亂的依附關係（Ensink et al., 2020）。

遭遇任何形式的兒童性侵害，都與喪失自我價值感或內疚感顯著相關（Chen et al., 2014）。性侵害受害者容易因為感到羞恥，而將自我身體物化（Talmon & Ginzburg, 2017）。當身體物化程度愈高，受害者的創傷反應就愈嚴重（Miles-McLean et al., 2015）。

(2) 家庭系統

Bowen 認為家庭是一個情緒單位，當家庭內出現負面事件或正向改變皆會帶來的壓力反應（Gilbert, 2018）。性侵害事件使受害者處於緊張狀態，在關係融合的家庭中，每位家庭成員也可能同樣感受到不安的焦躁情緒。

經歷照顧者虐待（含：精神、言語、身體及性侵害）的孩童，常會受到加害者的負向信念灌輸，如因為你不好才會受到不當對待。其常使受害者對自身出現負向自我價值，以及害怕被拋棄的不安全感，也可能導致受害者為防備傷害再度來臨而保持高度警覺，出現難以信任他人的情況（王雪岩，2022）。

家庭成員都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思考與想像，希望自己的期待和需求能夠得到滿足，當沒有辦法獲得滿足，內心的痛苦就回逐漸累積直至爆發（楊蓓，2014）。有些受害者因不想繼續受傷或擔心自己憤起傷人，會做出離家的決定，導致情緒截斷。

2. 中介（中間）系統（meso-system）

影響當事人創傷的中介系統，應考量與個體直接接觸且親近的兩個微視系統間的連結，包含：家庭、學校、教會、社區組織和社會團體間的互動。

學校若是有教授預防兒時性侵害的相關教育計劃，或許能夠增加學齡兒童及家長對性侵害行為的認識，並有效地避免潛在的危險情況（Walsh et al., 2018）。

另外，參加之教會、社區組織或聯誼小組與家庭間的良好互動，或者物質和心靈層面的資源提供，亦能轉換為支持當事人的力量之一。

3. 外部系統 (exo-system)

個體未直接參與但對個人決策有影響力的環境稱為外部系統，舉凡法律組織、社福機構對於兒童性侵害事件的看法及回應、大眾傳播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都隱含社會期許和文化框架，間接地影響社會大眾的對性侵害事件的立場和當事人採用何種策略面對兒童性侵害。

當服務對象受到性侵害，經通報主管單位及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後，即啟動司法調查程序。調查期間工作人員除協助安撫服務對象情緒外，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性侵被害人補助申請原則，衛福部也會提供醫療、心理復健、訴訟、緊急生活等相關補助。如果資源不足，工作人員可以再運用其他外在民間資源（如：現代婦女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社團法人桃園縣助人專業促進協會、全芯創傷復原中心等），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屬的需求。

4. 鉅視系統 (macro-system)

鉅視系統係指較為抽象卻會形塑個體價值信念、習俗和文化體系。文化意識形態下的父權制、個人責任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和男性霸權 (hegemonic masculinity)，可能影響受害者、家庭成員或其他親屬知悉性侵害事件後的反應 (Jeremiah et al., 2017)。華人社會乃是以差序格局為主要特徵 (費孝通, 1984)，人際親疏奠基血緣和地緣關係，重視社會秩序與人際間的親密關係 (Bond, 2002)。和奉行個人獨立自主的西方社會不同，亞洲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將社會的基本單位視為家庭 (Hofstede, 1980)。比起個人更重視家族和諧，使受害者對性侵害事件更容易產生羞愧感 (Stoltenborgh et al., 2011)、自責 (Han & Kim, 2016)。害怕衝突、講究和諧，即常要顧及他人評價，導致多數亞洲人會選擇延遲、避免揭露來保全家族顏面 (Xiao & Smith-Prince, 2015)，甚而對性侵害事件禁言，形塑出一種沉默文化 (Crisp, 2010)。

一些傳統刻板印象內化成意識型態，像是女性對於名譽、貞操的維護比起身體安全更為重要，故不應將遭遇性侵害公諸於世，以免受到他人指指點點（黃軍義、林旖旎，2008）。女性在遭受性侵害後，可能因隱藏在社會文化的意識形態下保守處女或傳統貞節觀，感到自卑、罪惡和羞恥（Fontes & Plummer, 2010），進而影響當事人的求助意願，甚至影響同樣身為女性的母親或擁有傳統觀念父親之反應。如何理解兒時性創傷和受害者的因應，應將社會文化因素對個體及其父母的影響程度併同考量。

5.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在「近側歷程—個人特徵—環境脈絡—時間」模式（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簡稱 PPCT 模式）中，人類發展的主要核心乃是近側歷程（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個體直接參與的微觀系統為近側歷程發生的地方。其受到個體特徵和與近側歷程相關之環境脈絡和時間等元素共同作用，影響個體發展過程與結果（Bronfenbrenner, 1995; 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引自李佩珊，2019）。Bronfenbrenner 和 Morris（1998）認為時間有三種層次概念：微觀時間（micro-time，在某些特定活動或互動的過程中發生的事情）、中介時間（meso-time，活動與互動在發展中個體所處之環境的作用程度），以及鉅觀時間系統（macro-time，同於 chronosystem，個人隨著時間推移與環境背景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化用三種時間層次概念，將其區分成為：（1）微觀時間：性侵害事件的脈絡；（2）中介時間：性侵害事件對於當事人和各系統間的衝擊；（3）鉅視時間：隨著時間推移，個體的性創傷經驗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分述如下：

（1）微觀時間

通常受害程度愈嚴重，性侵害行為持續的時間也愈長（Adamsa et al., 2019）。長時間或遭遇多次性侵害，導致受害者罹患多重疾病的可能性增加（Adamsa et al., 2019; Pegram & Abbey, 2019），其症狀包括：憂鬱、焦慮症狀、創傷後壓力

症 (Adamsa et al., 2019)、自殺意圖及自殺未遂次數增加 (Lopez-Castroman et al., 2013), 嚴重者甚至需要仰賴抗精神病藥物 (antipsychotic) 生活 (Hu et al., 2018)。

(2) 中介時間

除了個體身心狀況受到衝擊, 受害者的日常生活與其在學期間在校表現也易受波及。例如: 可能有學習困難、翹課 (Fahrudin et al., 2018), 以及學業表現變差 (Hu et al., 2018) 的情形。

(3) 鉅視時間

一些研究發現, 受害者本身擁有恢復的能力 (Fisher et al., 2017)。隨著時間流逝和個體的因應能力, 有些兒時性侵害的負向影響似乎有減輕的現象 (Easton et al., 2019; Rapsey et al., 2018)。也有不少研究顯示, 兒時性創傷的衝擊會持續到成年 (Fergusson et al., 2013; Kamiya et al., 2016), 且在人際與親密關係發展上容易遭遇障礙 (McTavish et al., 2019; One in Four, 2015)。

2017 年全球反性騷擾、反性侵的「#MeToo」運動, 以網路平台作為媒介, 在世界各國各個領域掀起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廣泛討論, 為各國的受害者提供勇氣說出自身經歷 (高瑱娟、陳政智, 2019)。儘管目前在我國響應該運動的人數相對寥寥無幾 (林世琴、李玉嬋, 2020; 彭秀玲, 2017), 但或許能為提升環境友善、理解並重視受害者帶來一些助益。因此, 探討兒時遭遇性侵害者在發展歷程中, 如何因時間序列的前進而有了改變契機更顯重要。

三、小結

兒童性侵害的影響是複雜且多面向的。儘管事件本身是主要造成當事人創傷的因素, 其他系統亦是影響創傷及因應的關鍵。對遭遇兒童性侵害的女性而言, 面對並處理性創傷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第二節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

揭露可能在任何時刻發生, 包括: 在該行為發生時揭露; 在侵害行為終止時,

或終止數年後才揭露 (London et al., 2005; Ullman, 2003)。從性別來看，女性較男性願意揭露兒童性侵害 (Jackson et al., 2015)。一項研究顯示，揭露性侵害事件的時機是預防罹患精神疾病的保護因子之一，尤其是在性侵害後一年內 (Easton, 2019a)。然而實際上，卻僅有不到 10% 的受害者願意揭露或因性侵害事件報案 (Alaggia et al., 2019)。

首次揭露兒時性侵害所得到的回應，對於再次揭露的意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Easton, 2014)。若受害者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幫助，或揭露後得到負面回應，易導致日後揭露的可能性降低 (Gagnier & Collin-Vézina, 2016)。有學者認為，揭露是邁向復原的第一步 (Easton, 2019a)。因此，不論是在兒童階段或是成人階段，受害者揭露兒時性侵害之歷程具有重大意義。

一、揭露之定義與類型

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在社交中建構與整飾自我形象。自我揭露是克服人際間的不信任，使他人了解一部分真實自我的過程 (Jourard & Lasakow, 1958; 引自 Masur, 2019)。

(一) 定義

Cozby (1973) 將自我揭露定義為，以言語的方式向他人表述或傳遞個人的資訊。後續的理論及實證研究擴充此概念，將非言語行為納入自我揭露的一環，例如：一個人的穿著、行為舉止或面帶微笑與否 (Greene et al., 2006)。Masur (2019) 進一步將自我揭露定義為，主動且有意願地將自我資訊傳遞予其他人或群體。可見，自我揭露的內涵涉及了主動向他人呈現自己的資訊 (含口語和非口語)。

揭露是一個複雜的、漸進的、多層面的，如同講述一個故事般，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過程 (Alaggia, 2004; Draucker & Marsolf, 2008)。Olafson 和 Lederman (2006) 將揭露兒童性侵害定義為，透過一項清楚的語言表達，可指出至少一次的侵害行為，而不必然要說出所發生的事情始末。Olafson 和 Lederman 的定義不包含使用具暗示性的輔助娃娃 (anatomical dolls) 進行的會談或不完整的隱晦性

揭露。最廣義的定義是，告訴他人性侵害經驗，包含正式或非正式，出於己意或是為了回應他人詢問地敘說（Ullman, 2003）。

（二）揭露的類型

兒童揭露性侵害可區分為直接揭露與間接揭露二類型（British Columbia, n.d.）。有些兒童主動部份揭露（Partial Disclosure）（London et al., 2005），以試水溫觀測對方反應而決定繼續深層揭露與否。大多數兒童透過間接或被動方式（Magnusson et al., 2017），例如：行為改變或模稜兩可言語的陳述，盼引起成人注意（Ungar et al., 2009）。因此，兒童的間接揭露可能引發進一步詢問細節（Shackel, 2009）。亦有藉由一部講述性侵害的電影做為與兒童討論性侵害的媒介，令兒童揭露自身遭遇之方法（McElvaney et al., 2014）。

一些回溯性研究顯示，兒童遭遇性侵害的延遲揭露，以及選擇不揭露是普遍的現象（見：Alaggia et al., 2019; London et al., 2005; London et al., 2008）。延遲的定義是，當事人迴避訴說遭性侵害經驗（Smith et al., 2000）。其可能是暫時的，直到受害者遇見「對的人」才進行揭露；也可能是永久的，由當事人決定對事件閉口不言（Tener & Marphy, 2015）。

二、揭露兒時遭遇性侵害之意義

或許，自我揭露如同剝洋蔥，愈接近核心層所涉及的議題會愈私密及敏感，其歷程可能隱含個人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影響。可從揭露的廣度（breadth）、持續時間（duration）和深度（depth）三向度，分析當事人如何詮釋揭露兒童性侵害的意義（Omarzu, 2000）。

（一）揭露的意義

性侵害事件是極為私密的議題，需發展至穩定的親密互動關係才可能促使受害者揭露。社會滲透理論（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從發展觀點（developmental aspect）出發，主張當關係愈親密，自我揭露的程度會愈廣泛且深層。Altman 和 Taylor（1973）將其分為四個時期：（1）定向期（orientation stage）：互相熟悉階

段，藉由閒聊軟性議題可以看出彼此對事物的好惡。一些初見面者常以天氣、交通、運動為話題；(2) 探索期 (exploratory affective stage)：雙方互動在可控制下進一步發展關係，如談論對一些硬性社會議題的態度；(3) 情感交換期 (affective exchange stage)：試探彼此交心的底線，比如：分享價值觀、恐懼；(4) 穩定交換期 (stable exchange stage)：自然地相互揭露，例如：分享真實自我。

從人際過程來看，自我揭露具有目標取向的策略，如：自我表達、社會認可、自我認同、關係發展和社會控制 (Derlega & Grzelak, 1979; 引自 Masur, 2019)。揭露做為因應策略可使當事人釋放負向情緒與壓力。或許也能夠獲得社會支持，包含：資訊支持、情緒支持 (van Toledo & Seymour, 2013)、增進自我價值 (esteem)、工具支持和動機 (motivational) 的支持 (Derlega et al., 1993)。

遭遇兒童性侵害是難以向他人訴說的秘密，在不同發展階段揭露有其特殊意義值得探討。一項研究發現，向他人揭露具有尋求治療、安全與支持 (Easton, 2019b) 和希望找回記憶之意義 (Roesler & Wind, 1994)。兒童階段的揭露大多是希望有人可以察覺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情 (Hunter, 2011)、停止持續遭受性侵害 (Pratt & Tolliday, 2018)、避免其他兒童成為受害者 (Roesler & Wind, 1994)，或為獲得他人信任，尤其是家庭成員 (Stiller & Hellmann, 2017)。成年階段的揭露通常經過深思熟慮且經過妥善安排 (Draucker & Martsof, 2008)。由於當事人發展成熟、成年後的能力 (capacity) 增加與揭露的阻力減低 (Pratt & Tolliday, 2018)，代表著發展親密關係 (Draucker & Martsof, 2008)、長期因應負向影響、情緒釋放、爭取重要他支持和自我復原過程 (洪素珍、王玥好, 2004)。但是，將受性侵害的童年事件重新於現實生活中提起，也隱含可能將永久背負該創傷的危機 (Tener, 2010)。

愛、支持與關懷形塑兒童對成年人和世界的信任感，也影響童年時期願意主動向父母親揭露遭性侵害 (Morrison et al., 2018)。當青少年將父母視為支持者，

會更願意透露自身訊息而非隱忍保密 (Tilton-Weaver, 2013)。成年階段受害者向父母親揭露兒時性侵害經驗，或許是個人充權、具有能力及意願增進人際親密。

(二)揭露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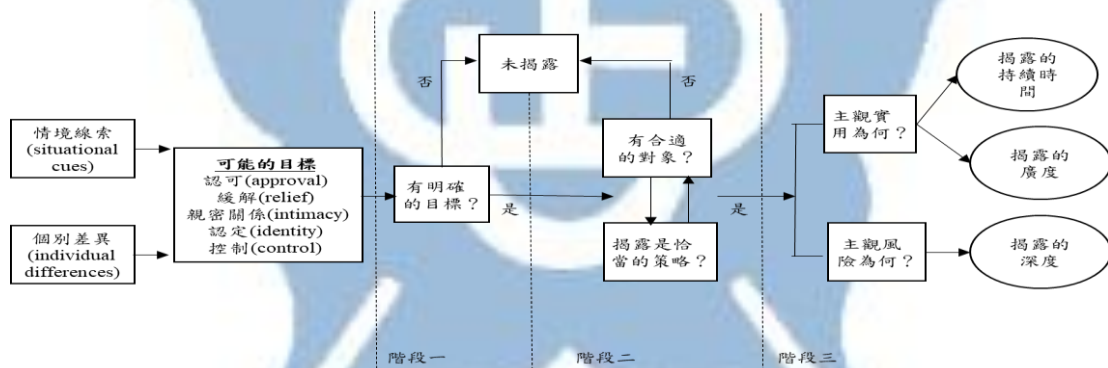
Omarzu (2000) 揭露決策模式與 Chaudoir 和 Fisher (2010) 揭露程序模式為兒童性侵害的揭露研究上提供重要概念，以下就此兩個模式加以討論。

1. Omarzu 的揭露決策模式 (The Disclosure Decision Model, DDM) —— 依情況而定

該模式的主要假設為，個體有自己的目標，在權衡揭露的優勢和風險後，決定揭露什麼、如何揭露和向誰揭露。決策歷經三階段：(1) 進入情境 (entering into the situation)；(2) 選擇策略；(3) 尋找合適對象，並考量實用大於風險 (見圖 2-2-1)。

圖 2-2-1

Omarzu 的揭露決策模式 (the disclosure decision model, DDM)



註：取自 *Situational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Online Environments* (p.83), by P. K. Masur, 2019,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http://doi.org/10.1007/978-3-319-78884-5>).

個體在考量情境線索、人格特質和人際交往互動的需求下，影響特定目標的選擇。階段二選擇對象與策略，由個體決定要向接收訊息者揭露什麼和以何種方式揭露，言語交流通常是實現目標的有效方法。在最後階段，個體會衡量揭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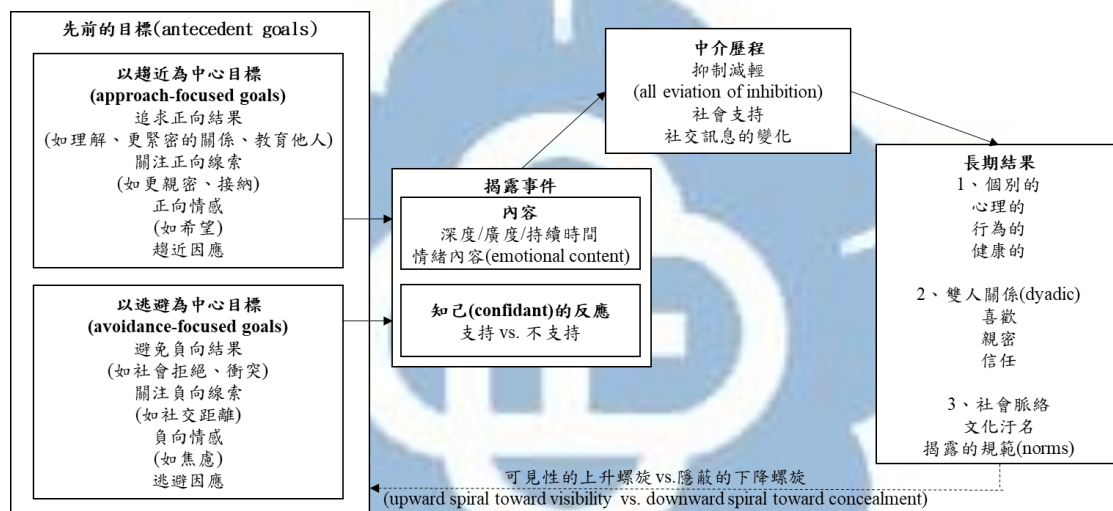
效用及風險，當揭露的效用愈高，且風險愈低時，個體會選擇揭露更多且深入的資訊。

2. Chaudoir 和 Fisher 的揭露過程模式 (the disclosure processes model, DPM) ——目標導向

以 Omarzu 的揭露決策模式為基礎，並考量長期的時間因素。該模式顯示長期的結果會反過來影響先前揭露事件的目標，可能往更好的方向延伸，促使揭露更深層，也可能朝向負面結果發展，消弭揭露的發生（見圖 2-2-2）。

圖 2-2-2

Chaudoir 和 Fisher 的揭露程序模式 (the disclosure processes model, DPM)



註：取自 *Situational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Online Environments* (p.85), by P. K. Masur, 2019,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http://doi.org/10.1007/978-3-319-78884-5>).

Chaudoir 和 Fisher 將其區分成二種相對的目標取向：以趨近為目標和以逃避為目標。前者像是：尋求他人的理解與協助 (Hunter, 2011)、與信任對象的良好關係 (Morrison et al., 2018)、信任的對象表示關心 (Petronio et al., 1996)，對於揭露的深度、廣度和持續時間皆有著正面的影響力；反之，後者例如：在家庭、鄰里間不談論性議題 (Brazelton, 2015)、避免增加家庭負擔 (Shalhoub-Kevorkian, 2005)、講了不會有人相信 (Schönbucher et al., 2012)、受害者的負

向情緒 (Alaggia, 2004; Dorahy & Clearwater, 2012) , 則是會降低揭露的程度。事件的揭露會對個體多方面帶來衝擊, 得到社會支持與否會影響結果的不同。揭露過程模式強調, 長期結果會回饋至揭露事件的先前目標, 正向的長期結果能增加未來揭露的可能性, 負向的長期結果反而會阻礙繼續揭露。

3. 小結

儘管存在個體因素和情境線索, 個體願意向他人敘說是為了某個對其具有特殊意義的目標, 達成該目標有其效益與風險, 在考量兩者的比重後, 個體會選擇是否進行揭露, 並決定揭露的內容。生態系統會衝擊其兒童階段和成人階段當事人對事件的認知與解釋, 造成揭露的差異性。揭露後所獲得的回饋亦有其影響力, 顯示揭露是一個長期性的、循環的並有變動可能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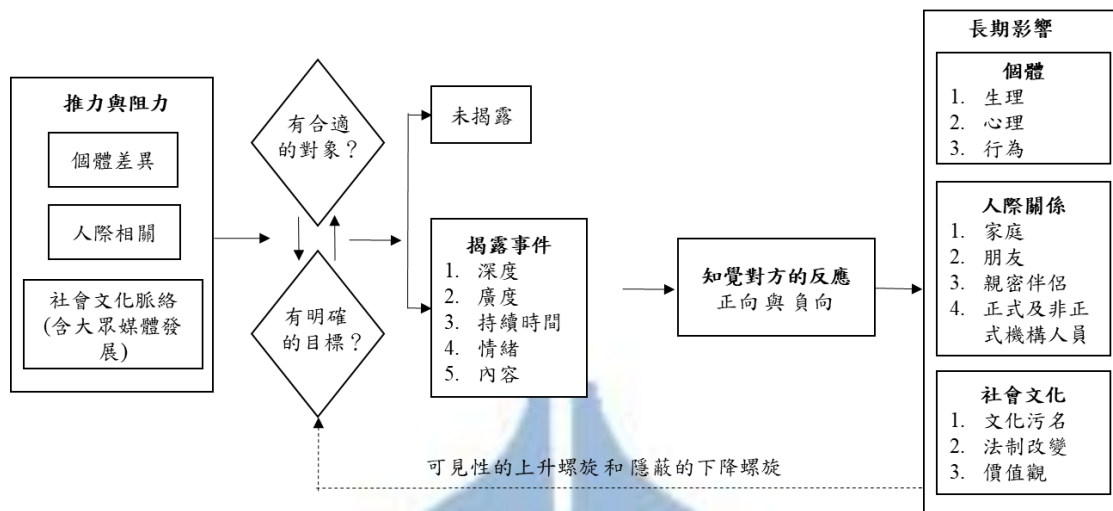
自我揭露在人際互動間是普遍的社會現象, 有助於建立、維持或發展關係, 但自我揭露的同時也須面臨到自我隱私暴露的風險。或許兒童性侵害僅是單一事件, 但對當事人來說揭露性侵害是一段且戰且走的歷程, 每一次的揭露 (包含言語、非言語和部分揭露) 都會影響當事人該停止、繼續, 或者更加深層且完整揭露。

三、揭露兒時遭遇性侵害之歷程與影響

研究者整合 Omarzu (2000)、Chaudoir 和 Fisher (2010)、Alaggia (2010)、Collin-Ve'zina 等人 (2015), 以及 Easton (2019b) 五篇學者的研究論點, 對揭露的歷程提出構想, 包含: 揭露的阻力與推力、對象和目標、揭露的類型、揭露事件 (含揭露對象的反應) 和長期影響五個部分 (見圖 2-2-3)。以下針對五個部分分別說明:

圖 2-2-3

本研究揭露歷程構想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一) 影響揭露的阻力與推力

Collin-Vezina 等人 (2015) 的研究顯示，阻礙揭露兒童時期性侵害的因素可區分成三個層級：來自個體內在的 (barriers from within)、與人際有關的 (barriers in relation to others) 以及與社會聯結有關的阻礙 (barriers in relation to the social world)。研究者以前揭層級概念為基礎，分別探索個人因素、人際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揭露阻力與推力，並整理如圖 2-2-4。

1. 個人因素

年齡較小的性侵害受害者未及時揭露的原因相當多。例如：遺忘 (London et al., 2008)、沒有意識或不理解該行為乃性侵害 (Lahtinen et al., 2018; McGuire, & London, 2019)。有些兒童覺得經歷的事件只是幻想或噩夢 (Everson, 1997)，或認為性侵害的程度未嚴重到需要揭露 (Lahtinen et al., 2018)。

一些研究顯示年齡較大的兒童選擇揭露的機會較高，起因於難以承受隱瞞的壓力 (Foster & Hagedorn, 2014)，或因其身心發展較成熟，能更準確地表達其性侵害經歷與感受 (Crisma et al., 2004)。然而，亦有研究發現一些年齡愈大的兒

童比起年齡小的兒童，更容易因為自責、害怕加害者傷害其他家人，以及恐懼不好的結果，而難開口述說（Goodman-Brown et al., 2003）。

年齡和揭露大致呈現線性關係。Leach 等人（2017）的研究卻發現在 12-16 歲時，揭露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因青春期階段的孩童身心發展皆趨於成熟，認為自己該擔起一部份的責任，或是對事件感到羞恥，而影響揭露與否。

對受害兒少而言，羞恥、自責是阻礙揭露的重要因素（Collin-Ve'zina et al., 2015; McElvaney & Culhane, 2015）。受害兒童常內化受害者形象而自責或羞恥，尤其嘗試在脈絡下理解創傷事件時，會經歷困惑及不真實感，因為外在環境依然持續彷彿性侵害事件未曾發生過（Fontes & Plummer, 2010）。與未出現羞恥感的兒童相比，具強烈羞恥感者更不願意揭露性侵害事件（Hamilton et al., 2016）。由於罪惡感，有些兒童認為自己是共犯，而無法或不願揭露事件（Paine & Hansen, 2002）。

害怕家族分裂或不想玷汙家族名聲（Brazelton, 2015）、害怕他人不相信、揭露後會受家庭成員或其他成人的懲罰或指責（Alaggia et al., 2019）、擔心自己和家人受傷害（McElvaney et al., 2014）、害怕揭露後的負向後果（Malloy et al., 2011）、避免遭受指責（Ullman, 2003），甚至是破壞家人關係（Shalhoub-Kevorkian, 2005），皆為兒童保護自我而不願揭露的展現。然而，有一研究發現兒童因恐懼或害怕而抗拒與成年人接觸的行為反應，反而引起大人詢問而促使了意外揭露（Morrison et al., 2018; Schaeffer et al., 2011）。

一些文獻顯示，成年階段不揭露的原因有幾種：由於兒童性侵害發生的時間已久遠，成年階段的揭露易因記憶的缺失及準確性受質疑（Dorahy & Clearwater, 2012; Tener & Murphy, 2015）；揭露能否真的解決兒時性創傷，是成年者的疑慮（Sorsoli et al., 2008）；揭露是否會破壞現有生活的穩定性（Donalek, 2001）。成年階段講述性侵事件可助療癒（healing）（Draucker & Marsolf, 2008）。但是對於某些成年者來說，受害經驗早已是陳年往事，揭露就成非必要（Sorsoli, 2010）。

2. 人際因素

非施虐照顧者的正向支持，以及親子關係的連結強度，是促使揭露的重要因素之一（McCarthy et al., 2018）。Priebe 和 Svedin（2008）發現，父母正向的教養方式，使得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揭露性侵害的意願較高；負向教養環境易影響對父母的形象、心理支持、依附關係和對家庭的感受。當受害者處於家庭功能失調（例如：吸毒、酗酒、犯罪或兒童虐待），可能導致其因不想再為家人增添額外困擾而隱瞞事件（Collin-Ve'zina et al., 2015; Leclerc, & Wortley, 2015）。也或許受害兒童知道無法從家人獲得支持，故選擇緘默。此外，身處在無法自在說出感受與情感的家庭環境，也影響著受害兒童的揭露意願（Hunter, 2011）。

兒時遭性創傷者可能事先預設揭露後對人際的反應與結果，而決定其揭露時機與方式，甚至是揭露的深度。在預期到壞結果時選擇延遲揭露，例如：對自己或非施虐家庭成員產生負向影響（McElvaney, 2015; Malloy et al., 2011）、沒有人會相信（Malloy et al., 2013）、加害者拒絕承認（McElvaney et al., 2014）。在猜測能獲得正向回應，且能幫助解決問題的考量下，向他人揭露（Jensen et al., 2005）。

成年階段受害者同樣考慮揭露是否會有人相信或願意傾聽（Alaggia, 2004），以及能否獲得足夠的支持（Jonzon & Lindblad, 2004）。成年者易擔憂傾聽者未經其同意，而將兒時性侵害事件散播（Del Castillo & Wright, 2009; Dorahy & Clearwater, 2012）。與揭露對象（如：家人、伴侶、諮商師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對其揭露與否別具意義（Hunter, 2011; Sorsoli et al., 2008）。與加害者地理距離的遠離，亦是成年階段考量揭露的因素之一（Alaggia, 2004; Hunter, 2011）。

加害者對受害者，甚至是家庭對受害者間的權力動態關係，也是影響因素。如：與加害者同住（Leclerc & Wortley, 2015）、透過言語的誘騙或是直接的恐嚇威脅，加害者掌控受害兒童的話語權（Collin-Ve'zina et al., 2015）。如同 Bowen（1993）的家庭投射歷程，有些家庭的情緒在不自覺中，以某種隱晦、間接形式，在每個家庭成員的身上流動。若家庭將遭遇性侵害視為代代流傳不可言喻的秘密，

受害者似乎只能沉默以對 (Xiao & Smith-Prince, 2015)。當加害者在社區地位崇高，或者其乃家中經濟來源，為避免家庭受到傷害，受害者通常秘而不宣 (Fontes & Plummer, 2010)。

3. 社會文化脈絡

性別社會化影響受害兒童不揭露，女孩大部分是出於害怕（如：害怕懲罰、對家庭產生不好的後果、沒人相信），男孩更多是由於性別刻板印象和同性戀標籤而感到羞恥。成年階段的揭露更容易受外在框架限制。保守社會上缺乏對性議題的開放討論，和對遭性侵害者的負向標籤，易導致受害者談論事件的畏縮，也間接影響受害者的自我認知及求助管道的缺乏 (Collin-Verzina et al., 2015)。

傳統性腳本印象，如：男人陽剛而非傳統受害者形象、女人是因其自身暴露穿著或行為不檢點而受害，也是受害者無法自在訴說的原因之一 (Alaggia, 2010; Fontes & Plummer, 2010)。討論兒時性侵害議題時，需要審慎考量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女性在文化地位上的相對弱勢 (Fontes & Plummer, 2010)。

相對於西方社會的自我揭露，華人社會中親子情感的顯露明顯更為內斂且間接 (Schug et al., 2010)。在華人文化的生活中，上一代總是教育著下一代要忍讓、要犧牲，遵循文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要求子女無條件遵從父母權威與管教。女性更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遺失表述自己感受、勇於為自我發聲的機會，影響當事人對「自我」的輕視和觀點 (Collin-Verzina et al., 2015)。深受「家醜不可外揚」桎梏的女性，最終仍不敢向父母揭露 (Han & Kim, 2016)。身處在這樣以父權為中心的家庭結構，反映女性在家庭中的弱勢和困境。

相對於過去的保守年代，現在的女權得到較多的提升和重視。然，潛移默化、根深柢固的觀念，不一定能隨時代更替一夕改變。但是文化框架並非堅而不摧的，Fontes 和 Plummer (2010) 的研究發現：對兒童性侵害的成人加害者零容忍、對婦女與兒童的重視、家庭對兒童的監控、男人參與扶養兒童、母親和兒童的親密關係、社會制裁的強制力、改變兒童和性行為無關的觀點、支持兒童大聲說出需

求、合作的社會、相互同意的性行為、對性的開放討論，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兒童保護資源取得，可以幫助跳脫文化囹圄，促進揭露性侵害的意願。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和大眾傳播媒體的轉變，社群網媒對於改變公眾意識有其力量，例如：全球「#MeToo」運動透過網路平台的傳遞，促使世界各地的受害者訴說自己遭遇性騷擾與性侵害的經驗、網路媒體社群（如：女○迷）架設可以選擇匿名性平台，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發問、發表創傷經驗，獲得廣大支持與回響。一些受害者資源，包括：實證程序（evidence-based programming）、自助書籍、網路團體、國際倖存者組織的取得相較以往容易（Easton, 2019b; Wang, 2019）。比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蝴蝶朵朵》的出版，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兒童性侵害的討論和政法界的關注。

隨著社會運動的發展，名人作為加害者或受害者的性侵害經驗，以及教育界或神職機構所掩蓋的性侵害事件通過媒體報導而公諸大眾，和社會對加害者的法律訴訟程序予以關注，能給予其他受害者訴說的勇氣（Kennedy, 2011）。上述社會環境的改變向受害者提供一個正向的環境（Easton, 2019b），打破以往社會文化的藩籬，使得性變成可以開放談論的話題，提供成人階段受害者揭露的鷹架。

4. 不揭露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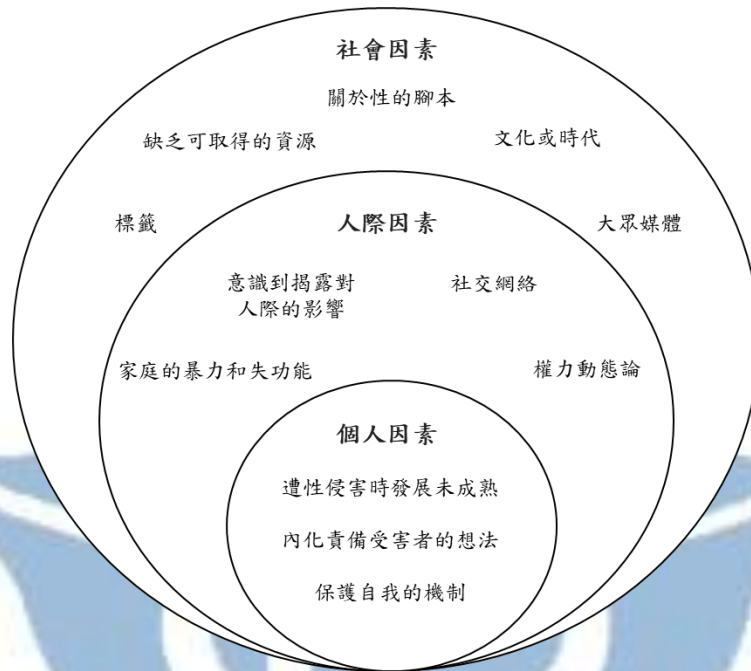
揭露是情感和理智在充滿著煎熬和困惑中掙扎的過程。由於揭露的不可控性（Tener & Murphy, 2015）與其他內在和外在因素（Alaggia, 2010; Collin-Vézina et al., 2015）的影響，使揭露的阻力始終大於推力。故，對於受害者而言，不揭露似乎是更安全的選擇（Hunter, 2011）。

未揭露兒時遭性侵害者在進入青少年時期，處理負向情緒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大相逕庭的生活風格：破壞性行為（destructive behaviour）和完美主義行為。前者透過吸毒、酗酒、濫交表達說不出口的傷痛；後者藉由在學業、生活上表現出色，希望轉移對遭性侵害的感知（Brazelton, 2015）。

努力保守秘密意味受害者要持續承受性侵害的烙印 (Brazelton, 2015)。直到進入成年階段，未說出口的秘密仍時不時在受害者面對親密關係發展、處理教養孩童等議題時浮上心頭，甚至帶來長達一生的身心困擾。

圖 2-2-4

阻礙揭露兒時性侵害的三層級



註：修改自 A preliminary mapping of individual, rela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impede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by D. Collin-Vezina, D. L. Sablonni, A. M. Palmer, & L. Milne, 2015,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43, p.12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5.03.010>).

(二) 揭露的對象

人們普遍會向具有同理心和展現解決問題信心者訴說秘密 (Slepian & Kirby, 2018)。從親密朋友、家人、社福機構，到醫療服務提供者都可能是受害者揭露性侵害經驗的對象 (McTavish et al., 2019)。

受害兒童揭露的對象主要是朋友、同儕或非施虐的父母 (Jernbro et al., 2017; Lahtinena et al., 2018)。與其他家庭成員相比，非施虐母親最有可能是兒童的揭露者 (Allnock & Miller, 2013; McElvaney & Culhane, 2015)。年幼兒童最常和非施虐父母訴說 (London et al., 2007; Lippert et al., 2009)，青少年則是同齡人 (如同

學或朋友) 透露 (Lahtinen et al., 2018)。然而, 選擇向朋友或同伴揭露大多時候並不能終止該性侵害行為 (Mcguire, & London, 2019)。成年人對於揭露過程有更多的掌控權, 依據其揭露目的, 親密伴侶、諮商心理師、研究者或警察皆是成人選擇之考量 (Hunter, 2011; Tener & Murphy, 2015)。

受害者亦可能根據不同原因選擇揭露的對象。例如: 當青少年受害者害怕面對主要照顧者的反應, 或擔心得不到來成年人的正向反應時, 選擇向同儕揭露尋求情感支持 (Mathews et al., 2016); 當想制止性侵害行為, 有正式支持及採取法律途徑, 會主動向成年人揭露 (Linell, 2017)。

(三) 揭露對象的反應

現存的文獻多以非施虐父母於性侵害事件揭露後的回應為主要探討範疇。一些兒時受性侵害者在揭露前未曾準備, 也未考慮父母的反應, 容易導致非預期的結果出現 (簡美華、管貴貞, 2006); 有些當事人是因為已對揭露結果有負向想像而不揭露 (McElvaney, 2015)。當事人揭露性侵害後, 非施虐父母展現不支持時 (如: 負向情緒或言語攻擊), 可能增加無助和孤立感, 進而沉默或遭遇二度創傷 (Bolen & Lamb, 2007; Courtois & Ford, 2013)。反之, 與父母的安全依附關係, 是揭露後發展正向適應的要因之一 (Parent-Boursier & Hebert, 2015)。受害女性向非施虐父母揭露時會期盼得到支持, 因此父母當下的回應, 極有可能對親子關係帶來後續效應, 而影響父母態度轉變的因素及其歷程有待進一步探尋。

一些研究顯示, 受害者在通報或揭露性創傷經驗時, 若有未獲得幫助的感受、經驗正式的服務體系人員 (如: 警政、社工、司法、醫療、教育和媒體) 的冷漠或不當對待 (如: 責備、否定或懷疑受害者), 例如: 校方沒有重視揭露之性創傷經驗, 更試圖掩蓋事件, 常使受害者經驗背叛感 (Smith & Freyd, 2013)。這些負面經驗會增加性侵害的創傷影響, 甚至造成二次傷害 (Campbell et al., 1999; Campbell et al., 2001; Campbell, 2008)。一些實證研究發現, 遭體制背叛的受害

容易有更嚴重的創傷相關症狀（Smith & Freyd, 2013; Wright et al., 2017），以及有自殺意圖（Monteith et al., 2016）。

得到立即、正向的回應，以及和重要他人建立強支持力關係，就如同是一強大解毒劑（antidote）（Knott & Fabre, 2014; Stillera & Hellmann, 2017）。Easton（2019a; 2019b）的研究發現，來自非施虐照顧者、同儕或其他重要他人的正向回應，能為受害者在生命歷程和復原過程中提供有力的轉變，有助於重建受害者的人際信任與依附關係、增進自我效能感，進一步獲得更多元的支持。

（四）揭露的影響

對於當事人而言，揭露事件對其心理及行為皆帶來長期影響。不僅如此，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層面與揭露事件後的交互作用，對於當事人往後是否再次揭露的意願有其影響力。

1. 個體層面

一項研究發現，當受害者選擇揭露時，普遍其復原的過程和適應力會比未揭露者好（Graham-Bermann et al., 2011）。揭露性侵害也可能降低再次受害的風險（Sorsoli et al., 2008）。當有一個可以信任，發覺他們的求助信號，且願意傾聽的人出現，揭露就得到助力（Brattfjell & Flåm, 2019）。但是，揭露對象的負向回應，可能會加劇受害者身心的痛苦和偏差行為（Crisp, 2010）。當經驗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揭露的失敗，將阻礙其未來繼續尋求幫助的意願（Wager et al., 2016）。

2. 人際關係層面

揭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撼動當事人的人際關係。有一些研究顯示，揭露兒時性侵害不僅影響受害者的個人生活，也易對家庭產生不良影響（Clevenger, 2016）。例如：家庭關係（Tavkar & Hansen, 2011）、家人的身心健康、就業和經濟穩定（Cyr et al., 2016）。

非施虐主要照顧者知悉兒時性侵害事件後，易經歷嚴重的失落感和創傷（McGillivray et al., 2018）。例如：強迫意念、身體化症狀和創傷後壓力症（Dyb et al., 2003）、憂鬱、羞恥和恐懼（Holt et al., 2014）。母親在兒童揭露後出現較多內在化情緒，如：未盡保護之責而愧疚和憂鬱；父親表現出對加害者憤怒與責怪母親的外在化情緒（Han & Kim, 2016）。

檢視揭露對家庭次系統的衝擊（如：父母親的婚姻關係、手足關係）發現：非施虐父母間可能產生衝突（Han & Kim, 2016），出現彼此對孩子行為的監控程度不足的討論，或教養意見的分歧（Santa-Sosa et al., 2013）。手足有出現替代性創傷症狀（secondary trauma symptoms）、焦慮或悲傷的可能性（Hill, 2003）。當受害兒童在揭露性侵害事件時遭受的痛苦愈大，其手足經歷相同感相對愈大（Pogue et al., 2014）。手足內化和外化問題，將加重家庭承受的壓力，使家庭關係更加惡化（Crabtree et al., 2018; Schreier et al., 2017）。

3. 社會文化層面

周吟柔與施俊名(2013)指出，執行人員在處理性侵害案件時的歧視與偏見，或對於性侵害行為有錯誤之觀念，將為受害者帶來二次傷害。對於受害者來說，秘密公諸於世的污名和誤解比起事件本身可能更讓人受傷(施宏達等譯, 2018)，以至於影響其對於自身正義的伸張。

缺乏性侵害相關知識背景和冷漠的鄰里關係，使得當揭露時社區的人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或無法及時察覺受害者出現偏差行為的原由（Alaggia, 2010）。族群和宗教對於談論性相關議題的開放程度，也反應在當事件發生時非施虐父母的應對方式，例如：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父母不信任受害者說詞並教育對該事件保持沉默（Gupta & Ailawadi, 2005）、受到東亞社會孝道觀念的華人父母拒絕談論事件以尊重和維護父權至上（Gilligan & Akhtar, 2006）。一代代繼承對於談論性侵害事件的禁忌（taboo），甚至是負向標籤，便形塑出社會中的沉默文化。

新興傳播媒體的發展 (Schwab-Reese et al., 2018; Wekerle et al., 2018) 與時代的演變 (Collin-Ve'zina et al., 2015) 或許可以打破受害者舊有觀念與其所處脈絡的枷鎖。世界各國、國際組織，以及國內司法立法機關對於人權、性侵害相關議題的重視，相對以往開放且訊息流通快速的年代，受害者是否因而能更容易取得多元且友善的發聲管道而觸發揭露的發生，值得更多研究探討。

四、小結

揭露是一個隨著時間和在個人生命歷程，不斷尋求合適機會訴說的動態過程。需要檢視個人、人我關係、家庭動態、鄰里和社區環境，以及會文化脈絡和發展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對揭露與否有更完整的理解圖像。

對受害者來說，選擇揭露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個當事人、每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考量。兒童和青少年通常採取一套逐步公開的模式 (a stepwise pattern of disclosure)；成年人大多視目的而決定是否揭露以及揭露的程度。

揭露過程中當事人易產生強烈之負向情緒，例如：恐懼、孤單、困惑、憤怒及悲傷。但多數當事人能在揭露後，得到情緒的抒發，只是結果卻不一定可以完全契合的預期。尤其當家庭、親子和手足關係方面因事件的揭發受到衝擊，當事人是否能夠得到良好支持能力存在不確定性。或許要隨著生命歷程的經歷和轉換，累積足夠充權和賦能，當事人擁有或發展出新的因應方法，擺脫沉默並重新詮釋事件的意義，待到機會來臨時才可能鼓起勇氣再次面對並放下事件。

第三節 女性生命歷程與原生家庭之關聯性

原生家庭是個體第一個社會化的環境，在家庭這個環境中，個體的行為、觀念、溝通型態、與他人互動模式和生活習慣等，都受到其影響 (謝秀芬, 2016)。親子間的連結通常是最持久且深遠的，女性與原生父母的互動方式，可能會隨著達成階段性發展任務而轉變。

一、從代間連帶理論討論女性與父母親子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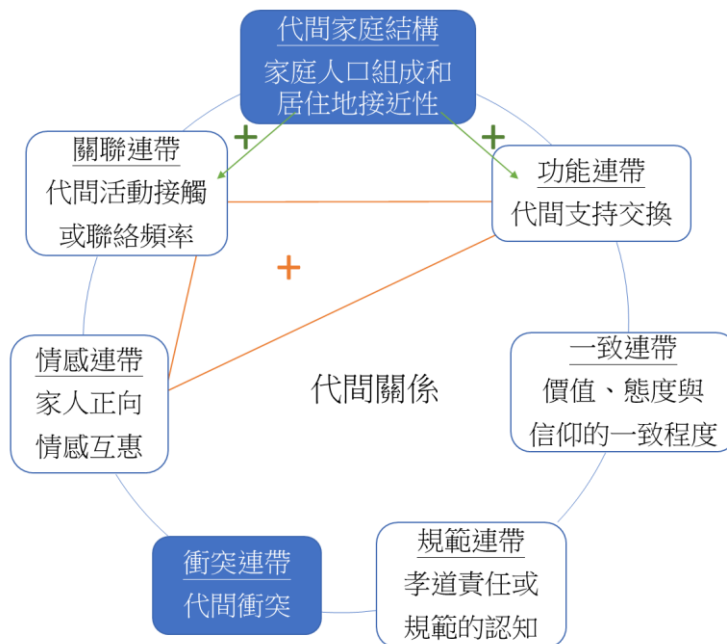
廣義而言，親子關係是指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態度，以及親子間心理交互反應（內政部，2000）。和諧穩定的親子關係則奠基於親子間有適宜的教養態度、充分的情感交流，以及良好溝通的模式。

雙親的性別是否影響親子互動存在爭議。嚴父慈母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華人社會的子女與父親關係較疏遠，和母親的親密感較高（Brown et al., 2007; Kim et al., 2015; 王嵩音，2019）。有些研究發現子女性別不影響親子互動關係（Beckert et al., 2006）；有些研究顯示女兒和父母間的關係總是比起兒子更加依賴而親密（趙梅如，2008）。

Bengtson、Schrader（1982）和 Bengtson（1985）之代間連帶理論（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提出七個連帶面向說明代間關係：代間家庭結構（家庭人口組成和居住地接近性）、關聯連帶（代間活動接觸或聯絡頻率）、功能連帶（代間支持交換）、情感連帶（家人正向情感互惠）、一致連帶（價值、態度與信仰的一致程度）、規範連帶（孝道責任或規範的認知），以及七連帶中唯一負向者衝突連帶（代間衝突）。七種連帶中關聯、功能和情感三種連帶會相互強化，結構連帶影響關連與功能連帶，但結構與衝突連帶不受其他連帶的影響（Hogerbrugge & Komter, 2012），見圖 2-3-1。

圖 2-3-1

代間關係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成年階段女性可能因為外出求學、工作或婚嫁，改變家庭結構連帶。地理上遠離原生家庭將影響代間之接觸、互助及情感交流（Dewit et al., 1988; Kivett & Atkinson, 1984）。一項研究發現，家庭成員之間相隔距離愈遠，面對面溝通機會愈少，將負面影響親子間相互的支持與協助（Bengtson & Robert, 1991）。但是因距離而疏遠的代間溝通和情感交流，透過現代傳播新科技的應用（如：通訊軟體 Line）有了改善可能性（王嵩音，2019）。

大傳統的價值理念會透過小傳統（如：五倫關係或家族主義）的轉化，形塑個體的想法與行為（阮新邦，2008）。大多數華人在成年時會延續、維持傳統奉養父母的規範（伊慶春、章英華，2008）。孝道責任包括：與父母同住、協助家務、頻繁地往來互動，及提供財務或情感支持。受到傳統父權影響和對性別角色的期待，代間支持顯示出性別差異：男性多提供經濟與生活安全的物質性需求；女性負責家務協助、照護和情感交流（林松齡，2000；伊慶春，2014）。有研究發現，女兒無論是否與父母同住，相較於兒子更容易承攬照護及陪伴父母的角色

(Lee & Kin, 2005)。主因在於女性與父母的情感連結和基於利他的心態，成為其照顧父母的動機；男性照顧父母多因遵循傳統的規範，傾向利己態度而非出於情感因素 (Silverstein et al., 1995)。

代間關係常是連結與衝突並存的 (Katz et al., 2005)。接觸頻率的增加，可能意味著矛盾與緊張的增長。溝通為家庭成員傳達、解讀訊息和回應過程 (Satir et al., 1991)。Keating 等人 (2013) 將家庭溝通分成順從取向和會話取向兩個功能向度。前者為順從家庭輩份階級的封閉溝通，較易產生溝通障礙；後者家庭成員間彼此自然開放地雙向溝通，有助於衝突化解。

家人互動方式形塑個體的生命經驗，影響其因應能力和技巧的發展 (Love & Kurpius, 2020)。家人關係也會因家庭成員個體發展狀態，而有所改變 (Elder, 1984)。通常當子女就業、經濟獨立後，父母會給予其更多的自主權和尊重，來自父母的主控權會降低，親子互動從上對下關係趨於平行 (吳嘉瑜, 2003)。現代親子關係因社會型態的轉變，母親有可能取代家庭中父親的角色，而父親亦可能扮演母親的角色，因此關係上更為複雜及多元。即使子女的年齡增長，邁入人生不同的發展歷程，雙方有希望可以如衛星和恆星密不可分但相互獨立。

二、成年階段與原生家庭關係

根據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社會生態觀點，個體核心受到不同系統層層圍繞。從個體出生起即有緊密互動的系統，即是家庭此一微視系統。家人間的交流最直接、頻繁，對其發展和身心健康皆具影響力。

家庭是一個情緒單位、一個分享的人際系統、一個成員和諧並且互賴的關係整體 (Kerr et al., 1988)。與原生家庭的連結佔據重要角色，其不僅是最初社會關係，更奠定親密關係的發展 (Inman-Amos et al., 1994)。親子關係的品質、環境系統的穩定，對於成年子女展現生命韌性之意義值得關注。

(一) 成年早期女性發展任務

從 Levinson (1978, 1996) 的生命四季理論來看，成年期為人生發展歷時最

長的階段。成年早期（17-45 歲）、中成年期（46-60 歲）及成年晚期（61 歲後），各有重要的生命議題。成年早期為重要的人生轉換階段，許多人生重要角色及生命狀態皆建基於此。此時身體狀況處於巔峰，認知及道德判斷能力穩定，並開始對其所處脈絡之棲身處（habitat）做出回饋與貢獻（張慧芝譯，2014）。這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有意義的時期，也是一個重新定義個體定位的時期（Takeda, 2010）。個體從過去對自我的關注，開始轉移至有穩定職業、經濟獨立的需求，尋求親密關係的建立，進而組成家庭和教養下一代。

女性在主觀價值和客觀社會期待下，擁有多重定位（niche），肩負著相對應的任務（Gitterman et al., 2020）。例如：在職場奮鬥者須培養個體關係與能力；為妻者生育、分娩及照顧家庭；為人母者關切孩子的成長和教育；為子女者照料年長及其他家庭成員。只是在時間系統上仍需要考量在不同的時代中會有不同的定位規則。定位規則標準未必代表個體的真正價值或潛能，僅是強調人與環境間互為因果的交流關係。

（二）親子關係發展

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是動態發展的。當子女邁入成年，親子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生活上，從以往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主導與權威，轉為雙方互惠協助（Collins & Steinberg, 2006）。情感上，親子間相互依賴、依附（Wu & Yeh, 2020）。責任上，華人社會強調成年子女應遵從社會期待，承擔對父母親的奉養與回饋（李青松等，2010）。

在華人社會中，父母大多將子女視為自己的延伸，參與子女的生命事件是權利及義務（楊中芳，2001）。大部分的女性進入成年早期，將面臨踏入職場、進入婚姻、組建新家庭，以及懷孕和分娩。父母的想法及態度是影響成年女性生涯選擇的考量之一（Clarke et al., 1999; Sewell & Hauser, 1975）。

（三）婚姻與原生家庭

或許因為原生家庭動態、性別工作機會和家庭角色等因素，使女性在職場地

位追求上顯得較為複雜。在華人家庭結構的研究中，已婚女性面臨的工作與婚姻家庭的衝突較常受到討論(黃俐婷, 2004)。相較於男性主要聚焦在工作和生涯，大部分已婚女性將較多心力放在婚姻家庭(Levinson, 1996)。

李青松等人(2010)的研究顯示，成年子女婚後與原生家庭父母親的互動方式，因離開父母或建立新生活，而與原生家庭關係轉變。對已婚者而言，原生家庭是其婚姻生活和子女教養方面的意見提供者，並扮演協助照護的角色(利翠珊, 1995)。一些女性在婚後仍希望和娘家保持密切接觸，特別是常將母親視為母職角色典範(Fischer, 1981)。母親是當女性在婚姻遭遇困境時最主要的情感支持者(利翠珊, 2000)，也是除了配偶外情感上最親近的人(利翠珊, 1999)。母女間連結的加深，導致雙方情感易出現依附反轉的現象，不僅兩代間相互母職化，在照顧的責任感上也出現消長(吳嘉瑜, 2004)

代間矛盾為華人家庭中的常存在的現象(利翠珊, 2007)。子女在成年之際欲追求獨立自主，亦與雙親的放手與否的心理糾結產生衝突，考驗著親子雙方如何在互動中調整合宜的情感距離(李青松等, 2010)。同樣地，已婚女性與公婆相處時，可能感受到華人文化規範與自己內在情感的不一致，與長輩同住下的依賴與自主、連結與衝突糾結，更是已婚女性的難題(吳嘉瑜, 2004)。

三、向原生家庭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

個體經歷生命事件之際，親子間可能因新的生命經驗或環境脈絡而變化(周玉慧, 2015)。向非施虐原生家庭成員揭露兒時性創傷對於當事人及其原生家庭皆是重大生命事件，在不同成長階段的揭露所隱含的意義可能不盡相同。

(一) 向原生家庭揭露之原因

兒童時期對於揭露過程擁有較低程度的掌控權，且受限於年齡發展，無法完全理解揭露後對特定某人(包含自己、家人或加害者)將會造成何種結果。因此，兒童時期往往是不經意的、非有目的性的、透過行為或間接的言語、因為觸發記憶(Alaggia, 2004)，或由大人意外發現而揭露(Collings et al., 2005)。相對地，

隨著年齡增長，害怕和羞恥的減低，且知悉有法律的保護（Hunter, 2010），揭露的可能性也升高（Collin-Vézina et al., 2015; McElvaney, 2015）。

成人階段的揭露是具有目的性和選擇性的。一些研究探討成年階段揭露兒時性侵害的決定與意義。例如：20 歲左右傾向選擇否認、壓抑或淡化事件的衝擊（O'Leary et al., 2010）。30-40 歲是成年揭露的高峰期，選擇揭露是因長期以來的心理健康問題更加嚴重，且已影響其生活（O'Leary et al., 2010）。40-60 歲揭露主因，源自育兒角色衝突和緊張，以及工作壓力加大（Tener & Murphy, 2015）。

（二）揭露後的影響與關係變化

對受害者而言，向原生家庭揭露兒時遭性侵害屬於人際親密關係中非常重要的自我揭露，原生家庭關係本質之變動應受到重視。

1. 受害者本身

兒童對於他人的初反應高度敏感（Morrison et al., 2018）。當揭露並沒有帶來現況的改變、沒有人相信，受害兒童會經歷背叛感並感到憤怒，可能會導致有些兒童抑制記憶（罹患解離性身分疾患）（Brazelton, 2015; Collin-Vézina et al., 2015）、自責和創傷症狀加劇（Melville et al., 2014）。但也有研究發現，負向回應反而會刺激受害兒童在成年時期再次揭露（Hunter, 2011）。

成年後受害者對於揭露的時間點、對象選擇握有更大的控制權（Hunter, 2011）。研究顯示，成年階段的揭露相較於兒童階段更能獲得正向回應與幫助（Hunter, 2011; Somer & Szwarcberg, 2001; Tener & Marphy, 2015）。

2. 父母

未能及時在事件發生當下為兒童提供保護，常使非施虐父母感到自責（van Toledo & Seymour, 2013）。事件後，照護受害兒童的同時亦要調解自我身心壓力，對父母而言是一件具挑戰性的事情（Rakow et al., 2011）。彼此間的創傷會造成惡性循環，當父母能提供給子女的支持耗損，也相對削減兒童適應創傷的能力（Jobe-Shields et al., 2016）。

一些研究顯示，非施虐父母對揭露性侵害之反應為動態且是支持與矛盾並存的 (Bolen & Lamb, 2007)。有些母親在揭露初期給予正向回應，但後期卻展現負向態度；有些母親一開始感到不知所措，無法給予兒童情感支持，但在接受事實或與兒童一起接受心理治療後，漸漸回應兒童的需求 (McCarthy et al., 2018)。McCarthy 等人 (2018) 將母親提供正向情感支持的策略分為三種類別：一慢慢鋪陳 (elaborating)，鼓勵兒童談論他們在經歷兒時性侵害後的感覺；二撫慰 (soothing)，試圖緩解兒童的痛苦感；三定向 (orienting)，嘗試引導兒童的康復過程。每個策略都發揮特定的情感功能。但是一項研究發現母親的支持影響力有限，例如：無法降低外在化問題與品行不良的發生 (Bolen & Lamb, 2007)。

父親揭露的反應是否與母親有所差異、對當事人的影響效果等，仍需要更多研究檢證。由於世代的改變，家庭中性別和照護角色的變化，導致父親相較於以往更參與子女的日常照料 (Livingston & Parker, 2019)。父親獨特的教養功能，有助於兒童的整體發展，尤其在整體的自我價值感 (Grossmann et al., 2008; Palm, 2014)。Lamb (2010) 發現，在受性侵害兒童成長過程中父親的存在有著正向的影響。同樣有能力採取適當的支持來應對受害兒童的需求，包括：安撫、傾聽，以及隔離加害者和兒童進一步的接觸 (Cyr et al., 2019)，惟父親提供支持的時機和方式與母親有所不同 (Cyr et al., 2014)。

3. 手足

未受性侵害之手足有時是家中最後得知者。困惑、焦慮、經歷孤立與背叛感是常見的反應 (Han & Kim, 2016; Hill, 2003)。當父母過度關注受害兒童，相對忽略其他子女時，可能引發手足間的嫉妒和怨恨感。對父母的不滿情緒，甚至可能轉化成對受害兒童施予攻擊行為 (Plummer & Eastin, 2007)，甚至對父母採取負向行為 (Baker et al., 2001)。

若加害者是親密的家庭成員，手足易有憤怒、受傷、強烈的失落感 (Baker et al., 2001)。成年階段手足甚至會質疑自己對快樂童年的記憶 (Crabtree et al., 2018)。

(三) 影響原生家庭展現正向或負向回應之因素

事件的揭露致使家庭中焦慮、緊張和衝突程度增加，並可能擴及受害者和其
他家庭成員（包含近親和遠親）間的關係（Quadara et al., 2016）。能否得到家庭
支持與接納對受害者是一場賭注。生態系統理論顯示，在有重大生活壓力或痛苦
時，個體與環境的連結性是生態觀點中可貴的資源。若能與支持網絡連結感將是
很重要的支持，可維持生理、情緒及社會功能均衡（Weiss, 1973）。

1. 正向回應之因素

根據系統理論觀點，揭露創傷後的家庭，不少成員的生命經驗會經歷變化
（Turnbull & McFarlane, 1996）。開放而誠實的家庭溝通模式，有助於協因應性侵
害事件的影響（Alaggia, 2010）。一項研究發現，女性受害者與父母間的情感連結、
認為自己是健康的、父母雙方能立即回應，對其日後社會生活適應具正向影響力
（Lovett, 2004）。

受害者若擁有良好家庭連結，如：家庭具支持力和積極正向的教養方式
（Marriott et al., 2014）、得到父母較多支持與信任（Hébert et al., 2009; Stiller &
Hellmannb, 2017），其創傷症狀較少。具凝聚力的家庭可能更加緊密連結，成為
受害者的資源，並能陪伴與滿足受害者的需求（Figley, 1998; Goff & Schwerdtfeger,
2004）。

2. 負向回應之因素

有些家庭在受害者未揭露前，可能已經感受到兒時性侵害的影響力。例如：
受害者對他人的攻擊和敵對、情緒和社交的退縮行為、心理健康問題或衝動行為，
衝擊受害者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互動品質（Quadara et al., 2016）。

儘管當事人敘說的主題已是歷史，在成年揭露仍有其風險性（Alaggia, 2010）。
如：因家庭價值體系的保守與對女性貞節的重視，可能最小化性侵害的影響，並
加深受害女性的羞愧感；單親母親易因缺乏父親角色使女兒面臨風險而生罪惡感，
影響親子間的互動（Quadara et al., 2016）。

封閉的家庭溝通模式易導致負向交流，或使親子雙方經驗背叛感（Alaggia, 2010）。成年女性揭露時恐遭家庭成員的攻擊（如：家暴或辱罵）（Alaggia & Kirshenbaum, 2005）、家庭漠視及否認性侵害事件（Taylor & Norma, 2013）。

缺乏凝聚力的家庭或家庭成員以消極的方式處理，常受害者無法獲得親密感和信任，遂引發後續危機，甚至阻礙復原（Figley, 1998; Goff & Schwerdtfeger, 2004）。然而，其更導致一些受害者在成年階段對原生家庭與父母抱持負向觀點，例如：原生家庭缺乏凝聚力（Cole et al., 1992）、與母親連結度低且負向，以及認為父母管教方式較為控制（Fitzgerald et al., 2005）。

（四）小結

親子關係對父母和成年女性是獨特的社會連結，雙方存在複雜、矛盾且多面向的關係。如同一個流動的光譜，不僅隨著個體生命歷程遞進，親子關係的內涵有所改變，更可能會因家庭生命週期的發展，而使成年女性和雙親的關係產生變化。

現有的實證研究大多數著重於探討揭露後家庭的正向和負向回應對於受害者展現生命韌性之相關性，參見：Domhardt 等人（2015）、Fahrudin 等人（2018）、Stiller 和 Hellmannb（2017）之研究。但是，原生家庭於揭露前後關係的動態發展，目前的實證研究仍付之闕如。向非施虐家庭成員揭露兒時遭性侵害後，與原生家庭是否能維持原有的關係，還是會因而帶來短期或長期的變化，是值得探究的重點。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重視完整的情境脈絡，了解當事人在遭遇兒時性創傷後所面臨的衝擊、矛盾、挑戰與選擇，並探討在當事人的生命歷程中與原生家庭之關係發展扮演何種角色。採用生命史研究，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作為深度訪談的工具，訪談五位成年女性。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

生命史是一種對生命的書寫。可以只關心生命中的某一部份，也可以從生命開始前談起，目的是要說明個體主觀生命經驗的內容和意義，與其所建構的世界（王麗雲，2000）。遭遇兒時性創傷經驗和與原生家庭關係之發展皆是成年女性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當事人的觀點和感受值得探究。生命史研究強調個人在所處情境的主觀知覺和經驗，同時重視脈絡及歷史性（Goodson & Choi, 2008），有助於凸顯成年女性生命故事的內涵與情節發展，並理解其如何從自身之創傷經驗思索和賦予意義。

個體在敘說中建構過去的經驗和行為，並認同其形塑自己之生命。本研究透過成年女性敘說遭遇性兒時性創傷之經驗及其與原生家庭關係變化之生命故事，進行重新的建構與探究。每個講故事的人會選擇自己想如何記憶事件和如何與研究者分享。這些故事沒有絕對或單一的真相，而是敘述性真實（Plummer, 2001）或主觀現實（Atkinson, 2007）。研究者為主角的故事接生同時保持忠實性（Kim, 2018）。在各自獨特脈絡下嘗試瞭解每位受訪者在訪談時於經驗流裡賦予之條理和次序，使她們生命中的事件和行動別具意義。

第二節 研究工具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主要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本身、訪談大綱，以及

錄音設備。

一、研究者

研究者同時兼具傾聽者、資料收集與分析的角色。作為首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須認清自己的潛在偏好、特殊習性和族群適配問題 (Robert, 2015)。事先覺察自己之主觀性、個人價值觀和經驗。對自身和受訪者互動所產生的效應或共鳴應進行省視 (鈕文英, 2020)，並盡可能以客觀態度進行訪談資料之蒐集。

研究者為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曾修習諮商技術專題研究、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專題研究和行為科學研究法之課程。上述修課內容有助於訪談之進行，並能同理與尊重受訪者的創傷經驗。

我，擁有著自己、研究者、女兒、成年女性等多重角色，處在不同位置勢必會有不一致的看法與立場，想法或許會相互拉扯較勁。在進入研究前，告誡自己應時刻反思與自我澄清，減少帶著框架的眼光和思維，避免過度沉浸主觀思路而忽略受訪者當下真實的情緒。

訪談無法避免造成二次傷害的可能性，受訪者的狀態會隨著講述內容而生波動，也許會在是否使用諮商技巧介入慰問，或盡量保持研究者的中立間游移。但是自身並非專業助人者，傾聽、尊重受訪者的任何想法，接納過程中一切感受，應為最適切的方式。

二、訪談大綱與試訪

採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依據研究問題及目的事先規劃訪談之結構 (林淑馨, 2010)，考量每位受訪者的獨特性，彈性調整訪談內容與順序 (Bernard, 2017)。

訪談大綱內容包括：參與者基本資料、與原生家庭關係、兒時性創傷經驗，以及該經驗對原生家庭關係的影響性 (見附錄一)。使用開放性問題，避免預設立場或引導受訪者，給予自由的敘說空間，並著重個人感受的表達。

正式訪談前進行一次試訪。目的在了解依循研究者想法初步研擬之訪談大綱內容，在實際進行訪談的過程中，能否順利獲取研究所欲探究的資料。誠如

Sampson (2004) 所言，提供前影作用 (foreshadowing)，預示研究問題和可能遭遇之困境，凸顯資料蒐集的落差和匱乏。

由於研究議題較為敏感，對象找尋較不易，且每個受訪者的故事都彌足珍貴，故以一位有童年逆境經驗之成年女性為對象，將訪談大綱關於兒時性創傷經驗之部分修改成童年逆境經驗，進行試訪。

試訪後調整訪談大綱內容如下：(1) 在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的部分增加探詢家庭成員的互動與相處方式、量化的問題 (如親密度評分)，並針對已婚之受訪者補充婚後家庭相關問題；(2) 關於兒時性創傷經驗增列回首性創傷的意義，以及探索改變受訪者對事件看法的人、事或物。試訪結果顯示閒聊般的輕鬆氛圍有助於受訪者自我探索、揭露及舒緩緊張情緒，故應適時掌握談話的氣氛。訪談過程宜注意釐清事件脈絡與時間順序，並可嘗試以好奇語氣或問題溫和地挑戰前後不一致或模糊的陳述。

三、錄音筆與實地札記

取得參與者同意後，對訪談過程全程錄音。為避免檔案遺失或其他突發狀況，以二種錄音設備同時進行錄音。研究者除專注口述故事，亦觀察參與者的非口語訊息，並於訪談結束後立即詳實記錄札記，包含：對受訪者的印象與觀察、訪談概要與訪談過程感受，以澄清與銜接第二次次訪談的主題。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參與訪談之必要條件為：(1) 年齡 20-45 歲成年女性；(2) 兒童時期 (12 歲以前) 曾遭熟人或陌生人性侵害 (含性騷擾)。為確保訪談過程的順利，受訪者如有下列任一情況則排除：(1) 目前正接受精神科治療並服用精神藥物者；(2) 仍在接受心理諮商，且訪談過程中可能情緒不穩定或對其經驗之認知仍在變動者；(3) 對過去兒時性創傷經驗記憶模糊者。

有鑑於此研究議題較為隱私且敏感，樣本的取得也不易，故採取立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法。透過向全國各地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寄發公文，以及向從事性侵害被害人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寄送協力研究申請，經該機關或機構協助聯繫，再由研究者寄發邀請函（見附錄二）或親自邀請。徵詢同意後選擇適宜且有意願分享自己故事的成年女性受訪者們，約定時間和地點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篩選後總共有五位符合資格之成年女性接受正式訪談(見表 3-3-1)：透過社福機構引介者有二位，由從事諮商心理師協助推薦之個案有三位。

表 3-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 化名 | 小葵 | 忘憂 | 薔薇 | 鈴蘭 | 天星 |
|-------------|--|---|---|-----------------------------------|---------------------------------|
| 受訪者代碼 | A | B | C | D | E |
| 年齡 | 平均年齡為 27 歲 | | | | |
| 受訪時學歷 | 考取研究所中 | 大學畢業 | 高職畢業 | 高中畢業 | 研究所就讀中 |
| 家庭狀況 | 自認為單親家庭 父母無婚姻關係 | 喪偶家庭 | 父母在成年後 離婚 | 雙親家庭 高風險家庭 | 喪偶家庭 |
| 感情狀態 | 有交往對象 | 無 | 已婚 | 有交往對象 | 有交往對象 |
| 手足 | 2 位哥哥 | 1 位哥哥 | 1 位姊姊 2 位弟弟 | 2 位哥哥 | 1 位哥哥 |
| 加害者 | 大哥 | 母親男友 | 父親 | 大哥、二哥 | 父親 |
| 遭受性侵害期間 | 國小~高一 (約 8 年) | 7-8 歲~ 17-18 歲 (約 10 年) | 3、4 歲~國一 (約 9 年) | 0 歲~15 歲 (約 15 年) | 從小~高中 (約 7 年) |
| 首位揭露對象 | 男朋友 | 網友 | 母親 | 母親 | 表哥 |
| 首次揭露時間 | 高一 | 大學 | 國小 | 國中 | 高中 |
| 直到受訪時曾揭露之對象 | 母親、朋友、 學校輔導老師、 社工、心理師、 督導、研究者 | 大學同學、朋友、 諮商師、老師、 同事、主管、 國小同學、 研究者 | 同學、手足、 先生、司法人 員、社工、心 理師、同事、 研究者 | 學校輔導老師、 社工、心理師、 男朋友、 研究者 | 同學、警察、 哥哥、男朋 友、社工、研 究者 |
| 是否曾進行心理諮商 | 是 | 是 | 是 | 是 | 否 |

註：參與者的化名為研究者根據訪談時對受訪者的印象，找尋相應的花語含意命名之。其中，

受訪者 A 則由其決定以小葵作為化名。本表由研究者自行彙整。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流程

透過深度訪談法蒐集口述資料，經由受訪者的話語捕捉經驗的深層意義 (Robert, 2015)。研究者作為專注的傾聽者，以傾聽及觀察口語和非口語訊息為優先。僅是問一些必要的問題以進一步啟發故事的敘說，而避免過多提問及引導，並盡可能地保持中立 (Adriansen, 2012)。

一、訪談前準備

進行正式訪談前，研究者再次確認受訪者是否符合本研究之條件，並約定較為安靜且不受干擾的地點和時間進行訪談。實際訪談時間和次數視受訪者個別狀況而定。

原則上，每位受訪者至少進行二次訪談。二次訪談間最少間隔 7 天，時間約 60-90 分鐘。每一個生命故事都是獨特且彌足珍貴的，訪談結束後贈與每位受訪者 1000 元禮券以感謝其分享。

二、潛在風險與處理方式

本研究為深度訪談，內容詢問較隱私之問題，可能會引發二次傷害。訪談過程中若因回溯過往經驗而有任何不舒服感受或情緒波動，參與者可於任何時間點向研究者提出暫停或退出研究，研究者將提供相關之輔導及諮商資源，或協助轉介性創傷諮商輔導資源。

訪談中若受訪者情緒失控，研究者須維持自身身心狀態的穩定，並協助受訪者平穩下來，如：帶著受訪者暫時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中，慢慢平靜。待受訪者情緒平緩後，由其決定是否繼續訪談。若無法繼續訪談，就停止該次訪談，並再約訪，若情況允許，下次訪談時將請受訪者談談情緒失控之原因；若受訪者欲退出研究也尊重其意願，並做後續追蹤與關心，如有必要將提供諮商輔導資源。

三、訪談階段

訪談階段原則上分為兩部分：敘說階段（narration phase）和會談階段（conversation phase）。敘說階段邀請受訪者（敘事者）廣泛的敘說其生命經驗和事件，在過程中訪談者將干預減到最小，只以非語言表現出興趣、專注而予以鼓勵；會談階段訪談者須澄清敘說階段中出現的議題，以問題引導受訪者更詳盡描述先前提及的經驗、事件或其生命階段。在訪談過程中兩部分交織應用。

正式開始訪談前說明研究目的與進行方式，確保受訪者的理解與同意後，簽署訪談同意書（見附錄三）。第一次訪談時，首重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與可信賴性會影響資料蒐集的品質（Grinyer & Thomas, 2012）。生命史研究是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合作所建構出的結果（Atkinson, 2004），雙方關係要盡可能地接近平等（Harrison, 2009）。真誠關懷、保持興趣，以及有尊嚴、尊重地對待受訪者，能使其更易自在地談話（Shea, 2000）。

從基本資料作為訪談起點，以開放式問句詢問受訪者以瞭解個人背景資料，接著對其原生家庭做初步了解，如：回想你的成長過程，你會如何描述你印象中的家庭。接著詢問其對於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的看法與理解，以及成年階段與原生家庭關係現況。訪談中研究者保持彈性和開放態度是重要的，不僅可以讓非預期資料得以浮現，更有助於發展良好關係與信任（Kim, 2018）。結束前，約定下次訪談時間和地點，並再次感謝受訪者的參與。結束後，確認錄音效果並寫下實地札記，加深訪談內容和對受訪者的理解。

第二次訪談前，研究者重複聆聽錄音並檢視文本，並記錄有疑問或尚未釐清的主題，以利下次訪談的進行。訪談開始前先簡述前次訪談重點，確認雙方資訊的同步與統一，接著開啟第二次訪談。此次訪談著重在受訪者陳述兒時性創傷經驗。訪談內容依據受訪者回答之脈絡續行，再探討其對該經驗的看法與感受，並說明揭露之歷程與影響。最後請受訪者思索重新檢視兒時性創傷經驗對其之意義，並關注創傷經驗與原生家庭關係之發展的關聯性。

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談資料可分為兩類：(1) 客觀文本：較為客觀的訪談互動紀錄，如訪談錄音、觀察速記、耳聞紀錄；(2) 主觀文本：訪談者主觀的感想心得，如田野筆記。研究以客觀文本為基礎，主觀文本為輔。

一、錄音檔

以訪談日期、對象代碼、訪談的次序作為錄音檔名。例如：20210101_○○_A_01，20210101 為訪談日期，○○為訪談地點，A 為受訪者代碼，01 是指第一次訪談。

二、逐字稿

為便於日後分析資料取用之方便與正確，逐字稿標題同樣註明訪談日期、地點、對象代碼和訪談的次序。右方預留空格以便研究者書寫編碼。錄音內容逐字稿僅由研究者轉謄。繕打過程除務求傾聽的真確外，也力求詳實無漏的逐字稿。盡可能地記錄敘說者的語氣、遲疑、停頓等訊息，並反覆聆聽、核對以確認無誤（羅世宏等譯，2013）。逐字稿完成後，分別寄給各該受訪者確認內容之無誤。若受訪者認為涉及隱私不便公開之部分，予以刪除；若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則尊重並納入逐字稿。

三、資料分析

以主題分析法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包括六個步驟：熟悉資料、編碼、尋求初步主題、修正調整主題、界定主題的目的與意義，以及撰寫報告（吳啟誠、張瓊云，2020）。過程中採用交互模式來分析資料，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以底線標示各文句或段落的意義單元，於右側留白欄位加以編碼。

編碼範例（見表 3-5-1）的左側欄位是受訪者及研究者的對話逐字稿，右側欄位為該段談話的編碼。編碼的內容以一句話（如：與先生在職場上認識）或是短詞語（如：就讀職業學校）呈現，側重反映資料所代表的概念。

在第四章引述的訪談文本時會以「一畢業就結婚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注意，先

有後婚 (CI:134)」呈現。C 為第三位受訪者，I 指第一次訪談，134 為受訪者敘說的第 134 段。

表 3-5-1

編碼範例

| 訪談逐字稿舉例 | 編碼 |
|--|--|
| C134:一畢業就結婚原因哦，就是，因為，因為，沒有注意，先有後婚[笑]。 | <u>與先生</u> |
| R128:[笑]是，同學？ | <u>在職場</u> |
| C135:不是不是，比我大十歲，工作啦，工作。工作，工作的， <u>工作上認識的</u> ，就是打打工啊，我去那個，[停頓 1 秒]就，我，我同學啊，因為 <u>我是念職業學校，那個，美容美髮</u> ，然後我同學就說，誼，我想要去，[音調提高]中山路有開一間，一間新的美髮店我想要去那邊應徵，你陪我去陪我去，我說好啊，就陪你去。然後我就去了，結果呢，我們三個一起去，兩個都離職，好像不到，待不到一個月都給我離職，然後只剩下我，哦我想說算了，因為我也缺錢。 | <u>上認識</u> <u>就讀職</u> <u>業學校</u> |
| R129:嗯[點頭]。 | |
| C136:[笑]我還是要打工，就想說，好，那就打工吧！然後它待遇也不錯，我想說[音調提高]啊算啦，跟我的那個，學的東西也是一樣，那趕快去找一個，找一個， <u>生意比較好，業績比較好的設計師，我要做他的助理。然後就剛好，就是我先生</u> ，然後就在那，在他旁邊學，然後可能，[停頓 3 秒]可能，我心態很好啊，又學的很好，然後都有，有有有，有給那個，設計師，要的那個助理規格，然後他就說，好啊那她就是，她就是跟著我，就被點名，我就想說太棒了，然後就想說我要好好學。後來就可能，日久生情，一年後吧，對我們就那個，[停頓 1 秒]就在一起，然後[語氣拉長 0.5 秒]有了，我懷孕了，然後就結婚。對，先有後婚。 | |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主題歸類（見表 3-5-2）是將相似或一致的編碼做初步歸類。以閱讀過的文獻和訪談大綱為基礎架構，將逐字稿內容主要按照：原生家庭、兒時性創傷事件、揭露性創傷經驗三大向度進行歸檔。研究者在編碼過程保有彈性，若在歸類過程中發現有相似或重疊的非預期性編碼出現，理解其意義與相關性後，進一步概念化形成新主題。例如：於受訪者 C 的訪談內容中新增「個人資料」、「生命歷程」、「婚後家庭」三個主題。

表 3-5-2

主題歸類

| 主題 | 編碼 |
|------|--|
| 個人資料 | 姓名、就讀職業學校 |
| 生命歷程 | 國二趁著去美髮店打工的機會外宿、國中開始半工半讀、因常搬家所以常換學校、國二開始大部分時間都是外宿、是兄弟姊妹中唯二有高中畢業的、高中畢業即結婚生子、現在的我覺得太早生小孩了、沒繼續讀大學是因為害怕被議論懷孕的事情、有想重返校園但有現實因素（如工作、小孩）阻礙、外宿、有收入是能獨立的展現 |
| 婚後家庭 | 與先生在職場上認識、已經買下屬於自己的房子、在撫育孩子一、兩年後，有真的是大人的感覺、因孩子而產生的教養責任及生活習慣的改變、在婆媳問題上能感受到先生的支持與撫慰、不會限制自己小孩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也不隱藏與原生家庭不和的事實 |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主題精緻化（見表 3-5-3）為完成分析的樣貌。主題初步歸納完成後，透過檢視編碼是否能支持主題、檢視訪談的內容是否能支持主題，進行修正、調整並精緻化主題名稱。主題歸類中的三個主題經修正後調整為「生命歷程」、「婚後家庭」兩項主題。主題依據相應之編碼可能衍生次主題，如：丈夫、生活、有小孩後的轉變、與小孩的互動為「婚後家庭」之次主題。

表 3-5-3

主題精緻化

| 主題 | 次主題 | 編碼 |
|------|------|---|
| 生命歷程 | 學經歷 | 就讀職業學校、國二趁著去美髮店打工的機會外宿、因常搬家所以常換學校、是兄弟姊妹中唯二有高中畢業的、沒繼續讀大學是因為害怕被議論懷孕的事情、外宿、有收入是能獨立的展現… |
| | 工作 | 國中開始半工半讀、轉職原因一：從事美容業薪資無法負擔養育小孩的費用… |
| | 結婚 | 高中畢業即結婚生子、現在的我覺得太早生小孩了 |
| | 心靈成長 | …變好是慢慢持續進展的過程、自己願意走出來，是最重要的力量、第二重要是人際網絡的支持、第三是為自己設定生活重心 |
| 婚後家庭 | 丈夫 | 與先生在職場上認識、在婆媳問題上能感受到先生的支持與撫慰 |

(續)

| 主題 | 次主題 | 編碼 |
|------|---------|--|
| 婚後家庭 | 有小孩後的轉變 | 在撫育孩子一、兩年後，有真的是大人的感覺、因孩子而產生的教養責任及生活習慣的改變 |
| | 與小孩的互動 | 不會限制小孩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也不隱藏與原生家庭不和的事實 |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研究者藉由思考每個主題命名之目的、意義與範圍，確保主題彼此間具有區隔性而不相互矛盾，同時確認主題有不少於二個之佐證內容，以具備充分性（見表 3-5-4）。

表 3-5-4

主題目的、意義與範圍

| 主題 | 目的、意義與範圍 |
|------|--|
| 生命歷程 | 生命歷程說明生命事件與個人連續的互動經驗。「學經歷」是受訪者過往的學習歷程；「工作」說明受訪者職業生涯和轉職原因；「結婚」簡要說明步入婚姻的原因；「心靈成長」為受訪者透過多種方式重新省思並自我療癒的過程。 |
| 婚後家庭 | 為受訪者對婚後家庭的生活，並討論生兒育子後自身的變化。 |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為檢視口述資料編碼是否適切或有其他可能之編碼方式，使用同儕檢核(peer audit) (鈕文英，2020)。研究者在分析文本的同時，找一位已完成質性研究的碩士生協助檢核資料的編碼。當雙方對編碼意見分歧時，討論和分享彼此觀點，重新閱讀文本並找出最為適合的呈現方式，以增加資料分析可信度。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申請倫理審查通過，附上通過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證明（見附錄四）。研究探討主題涉及敏感議題，所有受訪者皆為自願參與，簽署訪談同意書並於受訪當天再度詢問以確保其意願。同意書內容詳載研究目的、研究進行方式、匿名與隱私權的保障。待受訪者簽署同意書後，才正式進行訪談。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隨時中斷或退出研究。個別訪談逐字稿完成之際，將

邀請受訪者們檢視各自訪談內容無誤，並有權決定資料的刪除與保留。本研究所獲得之研究資料皆妥善保存，並存放在只有研究者知曉的地方。保存年限為論文完成後五年，到期後將其資料全數銷毀。相關之紙本資料和電子檔案僅供學術論文使用並發表，不做任何其他用途。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五位兒時遭遇性創傷之成年女性口述資料，依人物側寫、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以及揭露兒時性創傷的歷程與影響逐節敘說。

第一節 受訪者的生命故事

五位受訪女性平均年齡為 27 歲，目前一位仍與原生家庭同住，一位同婚後家庭生活，一位照顧祖母的生活起居，另外二位視就學或就業調整居所。考量個人隱私及保持匿名性，以小葵、忘憂、薔薇、鈴蘭和天星為化名。

一、小葵——心若向陽無畏悲傷

「我不希望我的故事只是擁有重量而已，我希望它可以成為力量。」(A1:029)

小葵國中時個性活潑開朗，高中變得內向，消極交友，最近因心境轉變有慢慢恢復並有點喜歡上社交活動。父母為非婚姻關係，由母親單獨撫養長大，高中時父親搬來同住，但小葵始終自己認為是單親家庭的孩子。

小葵認為母親是類似朋友的存在，可以與她談論許多心事與想法，但母親角色仍會帶來些許隔閡。父親對於小葵而言是可有可無的，儘管母親希望小葵可以尊敬、愛護父親，在小葵內心深處對他依然抱有一點芥蒂，也為母親沒有名分的立場感到心疼。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兩位兄長，下有一位出生二個月就夭折的妹妹。偶爾小葵不禁會思索，如果當時是自己代替妹妹離去，是不是就不用承受兒時性創傷經驗的痛苦？

大哥是家中給予小葵最多關心，卻也是令她難以原諒並抗拒的人。大三歲的大哥在小葵國小二年級時，於睡覺時間對她性騷擾，情況因兩人同睡一張床後加劇，演變成長期的性侵害行為。期間嘗試與大哥溝通並威脅大哥要將此事告知母親，然，狀況未有改善。

小葵有一位從國中畢業交往至今的男友。高中時她曾兩度意外懷孕，雖然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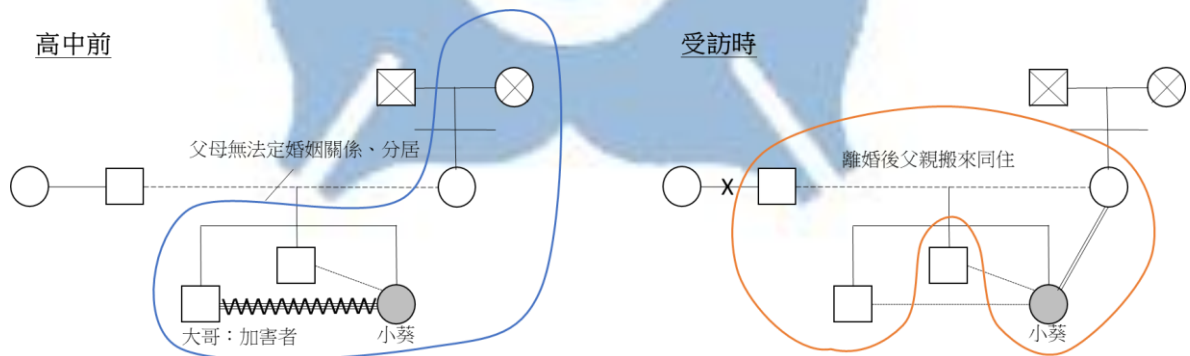
終沒有留下孩子，卻為小葵帶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第一個孩子。小葵形容它是自己的救贖，讓自己正視與大哥的不當關係和身體界線感，也是將事件全盤托出的勇氣泉源。「好像擁有了兩份勇氣」小葵說。

高一時在急需有人傾聽與接納中，身心俱疲的小葵向從國中交往至今的男友吐露事件。為了避免男友氣憤中找大哥對峙，小葵向母親揭露大哥的行為，大哥也在母親要求下向小葵道歉，事件不了了之。母親理性地處理事件的行為讓小葵覺得有「是不是因為母親不愛我才能如此冷靜」的想法。多年未得到舒緩的痛苦情緒，使小葵的睡眠障礙、情緒管理問題反而愈演愈烈，甚至開始出現想傷害他人的念頭，遂尋求校內心理諮商的協助。大三因學校將性創傷經驗通報而與母親發生激烈爭執，最終母女於溝通中相互理解並和解，小葵也更能感受到來自母親的關心。

「看到自己在變好」是支持小葵走下去最主要的力量，而揭露後來自母親、男友和他人的支持與陪伴也彌足珍貴。小葵未來打算繼續升學，並以成為諮商師為目標。

圖 4-1-1

小葵的家系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二、忘憂——淚乾後別錯過群星

「當然苦痛是存在的是事實，可是，你不用一直，抱著它…你要留一些時間給現在的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你喜歡的事情。」(BII:099)

忘憂自陳個性內向保守，但當有人遇到困難時會願意伸出援手。六歲以前住在鄉下傳統大家庭，同住者為奶奶和四位姑姑；六歲後與母親和哥哥一起生活。父親在忘憂兩歲時因病過世，母親需從事多份工作以養家並還欠治病的債務，常常需拜託親戚、朋友或男友照顧小孩。在家庭中多擔任也定位自己為照顧者：曾為陪護外公、外婆而辭去專職工作、為照護奶奶而轉職從事彈性度較高的職業，亦曾在年幼時承擔照顧病時母親的角色。

伴隨忘憂的成長過程有二個議題：一是有時會明顯感受到母親與姑姑們的妯娌衝突，例如：家庭與長輩照護、教養責任，以及財產分配的意見分歧。二是哥哥的暴力相向。因家中重男輕女，所以要求忘憂忍耐哥哥的所作所為；因長兄如父，所以要求忘憂接納哥哥的所有建議。直到雙方接受諮商也長大成人後，兄妹間的互動才有所轉變。

大約七、八歲時，母親男友以「這是我們兩個的秘密」在忘憂洗澡時、上下學接送途中，甚至是母親睡著後進行猥褻。國中更進一步做出侵害行為，並於忘憂抵抗時以「要傷害母親」恐嚇性侵，直到忘憂就讀一間離家很遠的大學，才終止其行為，但創傷帶來的影響仍在生活中如影隨形，如：創傷再現、難以入睡、易怒和憂鬱。大學與就業後開始願意有目的性地向信任的朋友、老師、諮商師或同事揭露事件，但揭露的內容並不完全。約二十六、二十七歲時，哥哥在一次陪伴就診過程中，得知母親男友過往的行為，給予安慰並成為忘憂堅強的後盾，協助周旋忘憂與母親男友間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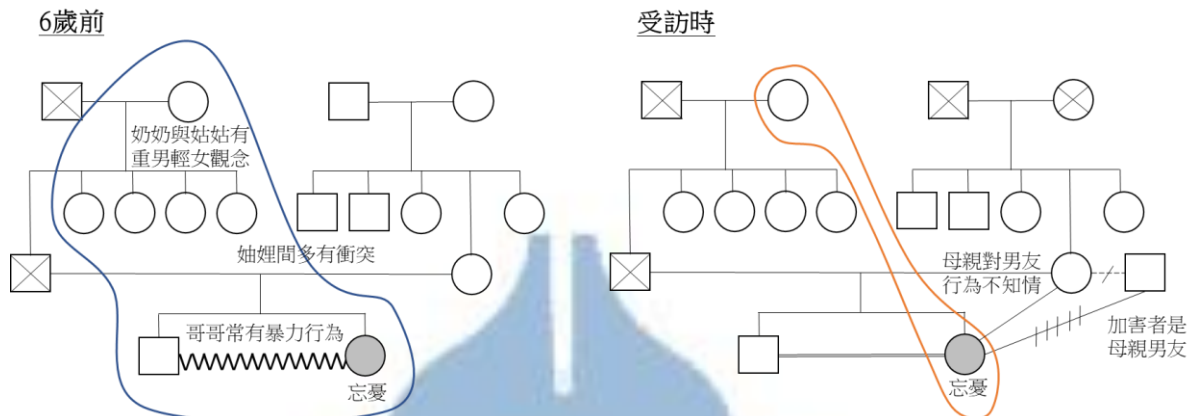
忘憂透過各種自助資源讓自己慢慢地站起來，減少創傷對自己的影響，包含：服用藥物、家庭治療、阿德勒心理學、曼陀羅、敘說與閱讀治療、心靈成長課程、冥想等，也試圖從與自身經驗相呼應的影片中探索事件的發生脈絡，還養了一隻肚子餓時會敲碗的兔子陪伴。對於忘憂而言，每一個嘗試都是在為打開生命中的結做準備。

目前忘憂並不打算向母親揭露這件事情，除了害怕母親受到傷害外，也擔心

母親得知後反應會過於激烈。一路走來忘憂最感謝好友們的支持與陪伴，現階段以照顧好自己和奶奶為生活重心。

圖 4-1-2

忘憂的家系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三、薔薇——烏雲罩頂也要自帶閃光

「我覺得要感謝自己，我沒有放棄自己。」(CII:166)

薔薇無法輕易信任他人，在人前會刻意營造樂觀開朗的形象。家中有四姊弟，排行第二。四姊弟間自就有自掃門前雪的默契，沒有太多互動，在薔薇揭露事件時也給出「那是妳自己的事情」的冷漠回應。

父母工作和經濟不穩定，小時候沒有固定住所，需要不斷地搬家。父親來自深山部落的農村家庭，在薔薇印象中是非常不稱職的父親。領薪水後的第一件事為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在遭外婆責罵忽略家中嗷嗷待哺的孩童後，才匆匆買泡麵交差。母親在父親失業和負債後從事酒店公關，但卻因工作與新邂逅缺席薔薇四姊弟的成長過程，僅是給錢了事。薔薇回憶，連自己的發育期也是在遭男同學取笑後才意識到要穿著內衣這件事。雙親在家中孩童皆成年後離婚，薔薇認為家人間關係疏離，如同住在同一屋簷下的陌生人，希望日後生活能與原生家庭切割。

最初事件大概發生於三、四歲時，父親會在休息時間撫摸薔薇的身體，但因那時年紀尚小，認為其乃父愛的展現。隨著年齡增長，父親變本加厲，洗澡時、

單獨相處時、父親深夜返家時，都成為猥褻的機會。夜半的哭泣、課間的走神，以及極端回應他人無意的言行，成為小薔薇保護自我的方法。只是有時她也不免會想，是不是自己真的是不自愛的女孩，才會遇到這種事情？

當時曾有一位老師對於薔薇的「逃家」行為多加置喙，質問她為何有家不回常往外跑？想要求救卻又害怕別人發現自己隱藏秘密的薔薇矛盾不已，只是沉默以對。雖然是因自己未能坦白而遭師長誤解，薔薇仍為此感到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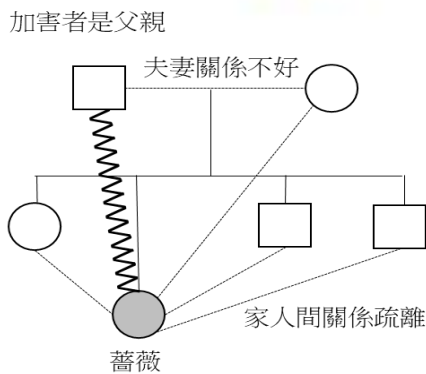
國小時曾向求助母親，母親並未正視；曾打電話報警，警察認為是小朋友在開玩笑。後來的薔薇用盡各種方式躲避父親，把握每次在同學家過夜的可能性，趁著國二去美髮店打工並外宿的機會，成功脫離父親的魔掌。高中時因懷孕而與相識於美髮店的丈夫在畢業後完婚，婚後家庭美滿。然而，兒時性創傷經驗漸漸影響薔薇的情緒及婚後家庭。感受到內心的掙扎，在丈夫的傾聽與包容下慢慢打開心房薔薇，在快三十歲時決定報案。雖然最終父親的行為在法律上判定為猥褻，但薔薇認為自己十足是遭遇性侵害。

薔薇認為，最重要的力量是自己願意走出來，其次是人際網絡的支持，最後是找尋生活的重心——對她來說，追求並達成理想中家庭模樣就是奮鬥的目標。未來希望撰寫自傳，或成為助人者，分享並幫助自身經驗予有相同遭遇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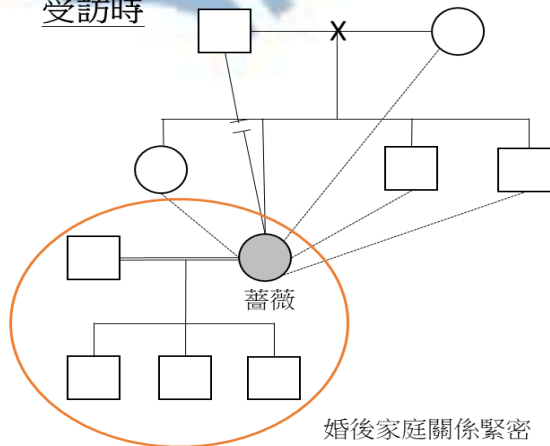
圖 4-1-3

薔薇的家系圖

原生家庭



受訪時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四、鈴蘭——愛笑的人運氣不會差

「如果今天我不做這件事，我不講這件事，這個社會、現況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觀念還是舊的，那，我講出來會不會比較好？」（DII:119）

鈴蘭個性外向大方，認為自己是九型人格中的第三型（好勝心強、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給別人），但也接納內在的自己其實容易焦慮，會在意他人眼光。鈴蘭的求學歷程坎坷，國中開始出現拒學症，高中曾因學習與精神狀況不佳而休學一年，直到受到母親考到證照的鼓勵，以及交到知己始對學校生出歸屬感。鈴蘭有去教會的習慣，她說，以前去是為了交朋友，後來逐漸變成自身的信仰，也在傳道人的教導中學習愛人與被愛的方式。

因為高風險家庭，鈴蘭幼時為寄養兒童。母親是身障人士，兩位哥哥有過動症傾向，作為家中唯一的「正常小孩」，從小被期待要成為改變家庭狀況的救星。原生家庭對鈴蘭來說是很無奈的所在，她不會主動向別人提起，也曾不敢完全告知另一半真實的家庭狀況。但是當有人恣意議論時，鈴蘭會毫不猶豫挺身保護對抗。

和哥哥們一起打鬧玩耍是小時候鈴蘭的日常，可是過程中二位哥哥的一些行為始終讓她覺得困惑。小五、小六時，大哥和二哥先後以「買東西給妳」、「知道妳和大哥的事情」誘惑並威脅鈴蘭和他們發生關係。在羞愧、不知道如何開口，以及哥哥們威脅要再將她送到寄養家庭等情況下，鈴蘭一直小心保護著這個秘密。直到十五歲，母親目擊了大哥的性侵害過程，才第一次吐露。只是在父親想保護大哥的意願下，鈴蘭作了偽證：從不知道事件是怎麼發生到是她自願的行為——現在的她很後悔當初沒有說出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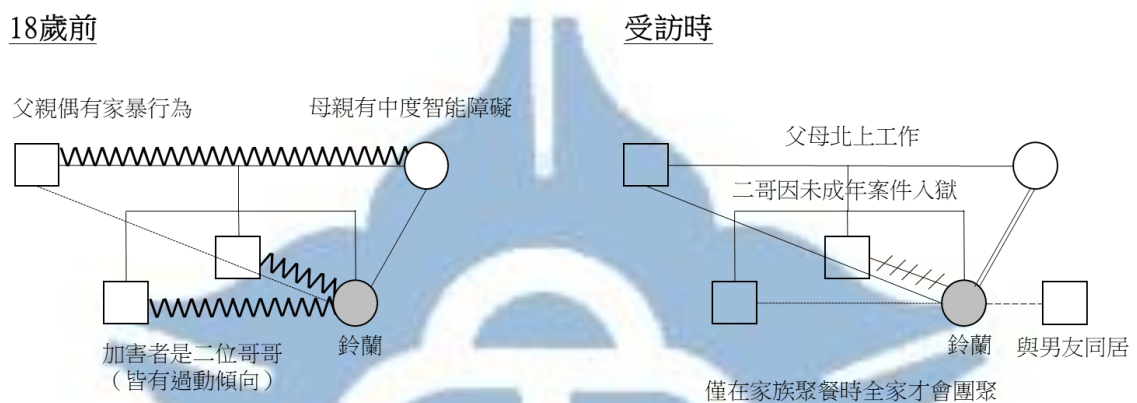
揭露後家庭衝突不斷，母親遂攜鈴蘭與二哥搬離家中生活。可是因與二哥的相處未有改善，以輪流借住同學家躲避其侵犯。待父親要北上工作時，仨人返回家居住。十七歲，二哥以接送為由要求發生性關係成為最後一根稻草，鈴蘭向學校通報二哥的事件。未親眼目睹的雙親不願相信，家庭四分五裂。後來的鈴蘭分

享，最近因二哥的劣跡斑斑，她發覺父母親的態度似有所軟化。

性創傷經驗對鈴蘭來說就像上了鎖的盒子，只要回想都感到害怕與羞恥，所幸生命中得到一些貴人的相助，好好地長大了。現在的鈴蘭不會再要求自己一定要成為改變家庭的救星，因為破碎的原生家庭，正以它自己的步調慢慢修復、前進中。

圖 4-1-4

鈴蘭的家系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五、天星——浪漫地活成喜歡的模樣

「感覺我已經盡力去處理…對於他的傷害，我有去做出一些反擊，然後讓大家知道，我沒有受到委屈，那，我覺得，我就已經可以放下了。」(EII:149)

天星脾氣很好，喜歡獨處，認為自己在朋友眼中可能是善良、好相處，但有點懶惰的形象。母親在天星十歲時生病過世，大部分由大五歲的哥哥照顧。天星說，哥哥是她的榜樣，也是能談心、放心依賴的對象。

「整個家族都討厭他」天星如此形容父親。父親早年沒有盡到撫養責任，晚年更成為伸手牌長輩。伴隨著父親毒打和精神暴力的成長歷程，使兄妹都曾有過與其讓失職的父親養育，還不如被送養或自己出去生活，說不定一切會更好的想法。

母親過世始終是天星心中的遺憾。她提到，自己從小到大都覺得母親只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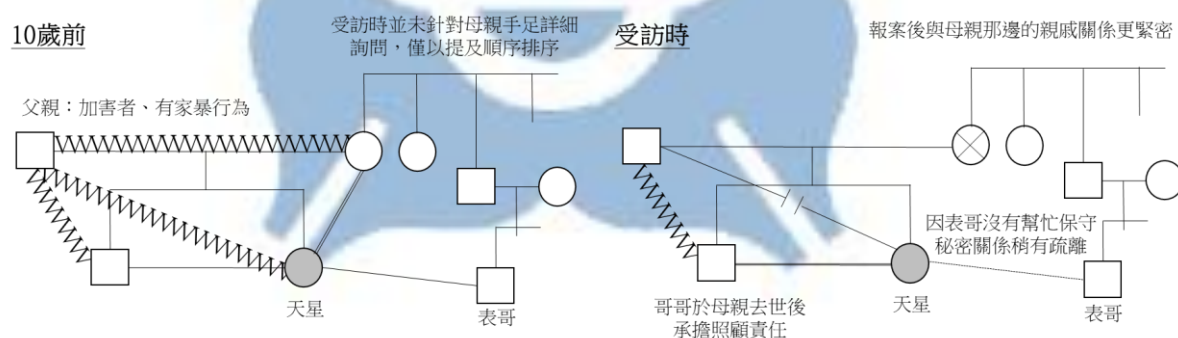
了某個地方，在不知道的時刻仍照顧著自己，直到最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仍無法接受母親去世的事實，好像一不這麼想的話，會失去好好長大與生活的能力。

自天星有印象以來，父親會在只有父女單獨在家的週末，進到她的房間，躺在熟睡的天星旁邊進行性猥褻。小時候的天星不知道父親在做什麼，雖然覺得不舒服，但因懼怕會家暴的父親而不敢反抗。國中從課本及老師教授中，意識到父親的行為是不對的，便嘗試以鎖房間門遏止其事。高中因相信表哥會幫忙保守秘密，曾稍微跟表哥透露父親的行徑，然而，在表哥轉頭就告知舅媽的背叛下，天星不願再向他人揭露。直到就讀研究所，在一位有相同遭遇的朋友鼓勵下，將童年創傷經驗報案。儘管哥哥一開始的無法諒解讓她感到崩潰挫敗，最終哥哥選擇理解與尊重。

報案之後，天星不再主動與父親聯繫。判決結果雖不盡人意，天星自述內心的壓抑感有所減輕，也在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完成後，有放下過去往前邁進的感覺。未來會繼續保持把握當下的人生觀，努力活出自己。

圖 4-1-5

天星的家系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六、小結

大部分受訪者的原生家庭功能失調，家庭關係疏離、父母缺乏監護功能，且有婚姻及家庭暴力之行為。在五位受訪者的兒時性創傷經驗裡，父親、母親男友為加害者共有三位，其原生家庭親子關係情感連結薄弱；兄長為加害者有二位，

其與原生家庭關係於揭露前後呈動態發展，多由負向互動轉為正向支持。

隨著生命歷程遞進，受訪女性在與各層次系統互動中展現出正向之適應能力。尋求發展穩定親密關係或期待經營新的家庭，為多數受訪女性們的嚮往。

第二節 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說明受訪者對於原生家庭和家庭成員的印象與描述，並探討原生家庭對個體的影響，以及其與原生家庭親子關係發展動態。

一、我的家沒有家的感覺

原生家庭使受訪女性們滿身傷痕。在那裡，沒有細細呵護他們成長的人，沒有溫暖向陽且安全的棲所，他們需要展現超齡的獨立和堅強，讓自己快快長大。

(一) 像刺蝟的家庭

剛出生的小刺蝟身上只有軟軟細毛，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硬刺爬滿身。面對危險時，便豎起尖刺保護自己。未擁有安全感，不曉得如何保持適當的陪伴距離，使得大小刺蝟在靠近時互愛互傷。

1. 雪上更加霜

從鈴蘭的描述可以發現，她和某些家人們的關係不是那麼融洽，家庭成員像孤島般生活，還有幾道未癒合的傷痕影響著家庭和諧。這是大多數受訪者家庭的模樣。

「我們沒有住在一起，我們不算真正意義的家，我們指是家庭成員；…第二個是我們家有破裂…我們不會去講裂痕這件事，但這件事情存在；…不是每個家庭成員的關係都跟我很好。」(DI:045)

由於低社經地位，導致家庭問題惡性循環或無法解決。例如：囿於經濟因素薔薇居無定所、鈴蘭的家人工作不穩定、忘憂母親分身乏術。

「我們從小一直都是沒有固定的住所的，就是一直搬家。」(CI:021)

「爸爸媽媽是我到高中才開始有工作，可是最近這兩、三年沒有。哥哥他們

出社會之後，工作也是斷斷續續。」(DI:042)

「我覺得她也顧不來，因為我媽那時候的工作有時候其實是半夜才回家。」
(BI:056)

2. 君情妾意東西流

受訪者回憶幼時父母關係多為疏離。薔薇說父母就如同陌生人；小葵的父母無法定婚姻關係，在父親後來離婚搬來同住後，父母間摩擦也日漸增加。

「他們像陌生人一樣但是住在同一個屋子…小孩子長大之後有離婚的那個法律的那個關係，然後才分開。」(CI:024-25)

「我爸爸跟媽媽是沒有結婚的。那，我爸爸（之前）其實在外面還有另外一個家庭。」(AI:065)、「我媽或許有比較開心，但是困擾的事情也變多了呵…他的一些生活習慣對於我媽來說也很無法去容忍。」(AI:109-110)

在緊張的夫妻關係中，孩童有時候需要成為父母溝通的橋樑，但是孩童也可能是夫妻雙方家庭爭執的導火線。

「媽媽可能要錢的時候，就會叫我出去，因為跟爸爸要爸爸就會給我。」
(DI:050)

「我們家兩個兄妹都有一點點像，就是妳會覺得好像是連接這兩個家庭的人，可是又是這兩個家庭的衝突點。」(BI:048)

3. 煮豆燃豆萁

在多子家庭中，薔薇與手足們互不關心，也會出現爭相吃醋的情況；小葵家也有相同的困擾。

「每個小朋友好像就是有默契，就是都就是自己解決，…每個人都只專心做自己的事，也沒有太多的互動。」(CI:031)、「妳只是睡覺而已妳也沒跟她幹麻，然後她就會拿一些什麼屑屑啊、橡皮擦，或者是髒東西、舊東西往妳的耳朵丟。」(CI:052)

「他（二哥）小時候非常喜歡故意找我麻煩，可能經過我身邊他就要踹我一

下，或是撞我一下。」(AI:087)

4. 暴力的繁衍

家庭暴力常見於受訪者原生家庭，父母之間、親子之間、手足之間。鈴蘭提及對父親持刀抵住母親的畫面印象深刻；天星認為父親帶給她極大的精神壓力；忘憂記憶中的哥哥情緒起伏大。

「爸爸家暴時間蠻長的…長大的過程裡面，爸爸媽媽只要發生衝突，爸爸就會很嚴重地、用力地去，打媽媽，或者拿刀子抵著媽媽說，還要在講這種話。」(DII:098)

「精神上就是常常會覺得壓力很大，然後也有幾次是動手這樣…也是有發生過幾次，他怒吼我的情況。」(EI:109)

「有好幾次啦。比較嚴重的一次是，他曾經用毛巾勒過我…甚至他也曾經拿剪刀捅我。就是他如果不爽，他就會動手。」(BI:073-74)

(二) 親職化兒童

大多數受訪者父母在其幼時並未盡到撫養責任，也有照顧者頻繁更替的現象。從小需要獨立生活，甚至反過來照顧父母，家庭動力失衡。

1. 生我不鞠我

大部分兒少疏忽的原因是雙親忙於維持家庭經濟。如：忘憂母親為了養家活口而無法兼顧親職。

「一早出門，半夜才回家…我們兩個互相照顧…一下是我媽媽的朋友，一下是我們年紀大的堂姊，然後一下是我媽的男朋友。」(BI:057)

從小葵、鈴蘭和薔薇的訪談中發現，有些父母未盡親職是因本身缺乏管束與教養能力、身心狀態不良或有情緒管理問題。

「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他在下午 5 點、6 點的時候就必須離開這個家。」(AI:063)

「就很像放逐的小孩，很像放養在養的，你知道嗎，自己隨意生長。」(DI:220)

「給妳那個零用錢，然後妳就自己去想辦法妳的三餐。」(CI:031)、「像我連

發育期，我那個要買胸罩，她沒有跟我講，是我被同學取笑。」(CI:046)

「他只要一領錢，他不是先買晚餐回來…先自己去外面吃一頓，然後喝個酒，然後回來，兩手空空。」(CI:091)

當失職父親要求受訪者在成年後肩負贍養責任時，天星表示自己常很難無法諒解。

「他前陣子一直催我趕快畢業，趕快出去工作，要賺錢養他。」(EI:079)

2. 小大人當家

身為家中除了母親外唯一的女性，一些受訪者在年幼時就有承擔家中照顧者角色的情況。例如：鈴蘭需照護母親的身心疾患、當母親生病時忘憂學習照顧、家中最小的小葵需學會如何安撫空巢期父母。

「媽媽其實是個性上很需要人家照顧的人。媽媽的膀胱比較沒有力氣，就是如果她今天想尿尿，一定要馬上讓她去廁所，她可能真的就是給你尿下去了。」

(DI:140)

「一旦她生病就變成是，我們要變成了一個大人去照顧她。」(BI:058)

「父母的情緒波動比較大，就是常常要照顧他們的情緒這樣。」(AII:019)

二、家庭好像變成一種原罪

隨著年齡增長與心境變化，受訪者對於原生家庭似出現認知轉變。那些如原罪般的記憶與傷痛，好的與壞的，皆慢慢轉化為生命的力量。

(一) 對原生家庭的看法

大部分受訪者願意接受並重新建構過往經歷，少數受訪者維持或強化對原生家庭的負面印象。

1. 欺人亦自欺

受訪者極少主動向他人提及不完美的原生家庭經驗。有時因怕丟臉而迴避話題，如鈴蘭；有人刻意營造家庭幸福美滿的假象，如薔薇。

「我小時候其實，非常非常不喜歡跟別人講說我們家。…因為在意別人的眼

光…我就覺得丟臉，然後就更不想講。」(DI:035)

「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我的家人帶我去，去北投泡溫泉，然後根本就沒有這回事。」(CI:124)

2. 回首向來蕭瑟處

儘管存有複雜且矛盾的感受，大多受訪者能同理原生家庭的缺憾。鈴蘭對於原生家庭有滿滿無奈感，但她選擇去包容；忘憂將原生家庭視為生而為人的功課。少數受訪者仍對原生家庭抱持負面看法，並希望最好不要再聯絡。

「我就是有家庭，我才會變成有我這個人，這樣的個性。」(DI:034)

「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生而為人的一个功課。那，我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功課，怎麼去寫這樣的功課，就其實是看我怎麼做這樣子。」(BI:194)

「一家都是瘋子，連我也是。還好我這個瘋子，有先提早出來。」(CII:108)、

「真的是可以斷了的。能盡量不跟他們有連結，就盡量不要。」(CII:011)

(二) 原生家庭的影響

家庭是個體的所從出處，所與款狎，熏漬陶染。從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價值觀、人際互動模式，以及親密關係經營，都能感受到原生家庭影子的存在。

1.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與家庭氛圍，塑造了受訪者的言行舉止。心理狀態層面例如：當鈴蘭沒有達到自身要求時易感焦慮、忘憂透過摔東西發洩壓抑情緒。

「我們家給我的期待又很大，別人給我的期待也很大，我就會擔心自己會不會做不好。…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很高。」(DI:126-127)

「(家裡面要我)把情緒壓下來…有時候情緒上來的時候，真的壓不住的時候，我會摔東西。」(BI:100)

行為展現層面如：因為在家中比較弱勢，鈴蘭喜歡擔任領導者、忘憂善於照顧他人。

「因為我們家兩個哥哥比較強勢，所以，我在人際關係中就會希望自己可以

當比較，就是主要領導的人。」(DI:089)

「我在照顧的部分是比較有成就感的…從小到大在照顧的角色上我是比較多被支持跟稱讚的。」(BII:040-41)

2. 得不到所以向外求

當原生家庭無法滿足受訪者在物質或情感面的需求時，如：鈴蘭常需要向同學或朋友借東西、小葵希望並主動找尋愛她的人。

「爸爸媽媽不能讓我買東西，所以有時候學校課業上需要的東西，我不一定有，妳就要厚著臉皮跟同學借。」(DI:089)

「我很急迫性的，甚至我還可以主動去追人家…那時候我跟我母親，跟整個家庭的關係都不大好，對。所以，我好像很急需，找到一個給我愛的人。」(AI:221-222)

3. 解構、重構、再建構

關於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幾位受訪者有一套去蕪存菁的機制：將家庭成員的負面人格特質視為反指標，避免近朱者赤，並以正面的特質作為仿效榜樣。

「我也告訴自己我不可以像他們那樣。嗯就是我的原生家庭。」(CII:161)

「就是他可能做過什麼事情，哦不要做這個事情；或者是他沒做，那我就會知道，噢，那以後我要做什麼事情。」(EI:176)

「一個我想要成為的人的一個樣子。影響我，做很多決定的時候，…對別人好一點啊，或者是善良一點啊，不要發脾氣啊等等的。」(EI:194)

多數受訪者表示在選擇親密伴侶或如何與雙方相處，似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天星的擇偶條件之一為不能有同於父親的負面特質；鈴蘭認為父母夫妻關係影響她與男友的互動，並反思原生家庭教養方式對其之影響；忘憂也提到原生家庭愛得含蓄，使她不善於表達。

「我會想要找一個，跟我爸完全不一樣的人吧。只要我爸有的，他就不能有；我爸沒有的，他有，這樣。就是一個相反的角色這樣。」(EI:171)

「跟我男朋友交往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有時候會很像我爸媽…可能跟模仿有關係。」(DI:090-091)、「我甚至還會跟他分析我們兩個為什麼會吵架，因為他們家的家庭跟我們家的家庭，教養方式完全不同。」(DI:217)

「因為家庭給我那種愛是不講出來的。然後妳只要把事情做好，就是表達對對方的愛…他好像沒有感受到那個獨占性，然後我又不講，然後他就會覺得更不安。」(BI:198)

幾乎所有受訪者皆對於未來婚姻與家庭充滿想像。例如：天星嚮往幸福美滿的家庭、小葵渴望建立一個比原生家庭更好的新家庭。薔薇則在受訪時笑容洋溢地說現在的（婚後）家庭就是自己理想中的模樣。

「常常會想結婚之後，然後住在哪裡啊，怎麼樣生活啊，小孩怎麼樣啊等等的。就是會蠻希望自己有一個很好的家庭關係。」(EI:166)

「會有渴望想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可以更自由開放的家庭是我渴望的。」(AI:227-228)

「現在家庭是，美好、美滿、快樂，然後滿滿的愛這樣子。」(CI:149)

4. 因為它，所以我

對於許多受訪者而言，原生家庭有諸多不堪。然而，他們皆認同自己因其成長。比如：忘憂能夠更同理他人、天星的抗壓性及情緒調解能力佳、鈴蘭有良好的風險因應能力。

「每一個人跟每一個家庭，其實有自己的苦處跟困難，那我覺得其實也會讓我更能夠體諒別人。」(BI:192)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些的話，我就不會是現在的我了，我就不這麼獨立自己去做任何事情，我可以承受壓力的那個也比較高，然後也比較可以承受別人的一些負面的情緒吧。」(EII:153)

「我好像比別人又加分，因為我比別人還要成熟，以同年紀的來說。也比較看得開，…比較能應對家裡有風暴的時候。」(DI:213)

三、在親子關係的發展長河中

親子關係隨著時光流逝顯示出動態變化，有些由負向轉為正向互動，例如：情感連結增強、轉變為較開放的溝通模式，以及衝突因應能力增加；有些維持負向互動，或許需要同時考量影響親子互動的諸多因素。

(一) 言及父與母

親子間的互動也許需考量性別差異，雙親性別與子輩性別的不同，皆造就不一樣的親子經驗和感受。

1. 椿萱印象

現今對於男女社會角色和性別刻板印象逐漸改觀，然在一些受訪者的印象裡，仍可見傳統社會下嚴父的特質，如鈴蘭的父親有大男人主義。有時候子輩會察覺與父親的疏離，如小葵認為父親是可有可無的人。

「他就是，痾，他不想講就是不想講，他想講就想講，他就是要別人聽他的…然後爸爸很重面子，他不能在外面丟臉，他不能接受。」(DI:048-051)

「我不會因為他的存在而有太多的，開心的或是興奮的情緒。他不在也不會給我帶來傷害或是怎麼樣。」(AI:043)

對於多數受訪者而言，母親像可以分享心事的朋友；極少數認為母親是糟糕的。

「她是有點類似像朋友的存在吧，就是我可以她談論很多我的心情，或是我的想法之類的。」(AI:056)

「(雖然)她的一生很可憐，(但是)她也沒有做好她(母親)的角色。」(CI:048)

從所有受訪者的描述中可以發現，母親常是家庭中犧牲自我的角色。在天星家，主要由母親負擔的生活費用；因父親的失業與負債，薔薇母親為維持家庭生計去當酒店小姐；小葵母親為了照顧小孩，放棄事業早早退休；忘憂的母親在父親病逝後養家還債，還要面對難解的妯娌問題。

「我媽在的時候就只有我媽在工作，然後他是說，他跟我媽一起去找客戶，

但是他其實是沒有工作的。」(EI:071)

「可能要養很多人，很多張嘴，所以她去找一個算酒店誼，酒店小姐。」
(CI:043)

「她就很不放心啊，那時候我阿嬤又過世了…後來她就決定說…就退休，回來照顧我們三個小孩這樣子。」(AI:147-148)

「她只能追著錢跑然後，她沒有錢，她能夠做的工作都去做」(BI:062)、「雖然我姑姑對我們還算不錯，可是很明顯就是感受到好像對我媽媽不是那麼地友善。」(BI:045)

2. 性相近，習相遠

雙親的教養行為可能受到多元因素的交互影響。受訪者普遍都感受到家中因孩童性別而產生的差別對待、男主外女主內、重男輕女，甚至是過度保護女孩的現象。

「爸爸，媽媽甚至為了哥哥的事情，可以很常跑學校，啊為什麼為了我的事情就不會來學校？」(DI:205)

「媽媽都比較疼哥哥，家事都要女生來做。」(AI:232)

「就是一定要帶著我哥，才能跟我的朋友出去玩。」(AI:179)

對於長子、長孫，家庭總是賦予期待。小葵的父母期許大哥成材；忘憂感受到家中長輩對哥哥寄予厚望，並要求忘憂忍受哥哥的暴力相向。

「就是會被賦予一種期許，應該要是噁（家裡的棟梁）。」(AI:136)

「有什麼好的都是留給我哥，然後我是沒有的…對於家裡唯一男性的那種期待。」(BI:072)、「面對這件事情（哥哥的暴力行為），他們其實不會去處罰他或幹麻，他們只會叫我要忍耐。他是哥哥，妳要尊重他，妳要忍耐。」

(BI:074)

父母的教育程度與願意為之付出的心力，是影響教養行為的因素之一。薔薇的父親因僅接受低等教育，無法指導孩童課業；為了鼓勵有拒學症的鈴蘭，有中

度智能障礙的母親成功考取證照；小葵母親非常重視家中孩童的教育。

「因為他是國小程度，啊他也沒辦法去跟小朋友有課業互動。」(CI:089)

「希望我可以看她好好努力讀書，所以她有考到證照。」(DI:224)

「不管在撫養我們長大上，或在努力給我們教育，我覺得都是無庸置疑是很好的。」(AI:042)

有時家庭內會出現不一致的教養行為，如天星母親展現支持與鼓勵，父親則非常獨斷。

「媽媽一直以來都蠻支持我跟我哥的，就是我們想要做什麼她就會說好，然後給我們一些建議，支持我們去做這樣；然後我爸的話就是，很堅持他自己覺得對的事情，就算我們不要，他也會要求我們去做。如果我們想做他不要的，他就是不要。」(EI:115)

3. 似近似遠的距離

幾乎所有受訪者皆認為與母親關係是最為親近的，如忘憂表示與母親互動良好。只是母親畢竟還是「母親」，仍有無法互相分享與坦誠的界限，像是小葵會避免與母親提到「男朋友」話題。

「我跟她（媽媽）的關係應該是很緊密。」(BI:089)

「有一些事情我是不太會跟媽媽講…比如說，我明天可能要跟我男朋友出去過夜。」(AI:057-058)

父女間多以較為內斂的方式交流。比起言語表達，受訪者的父親們更多是以稍顯笨拙地方法展現父愛。

「在我自己的某一些零碎的片段裡面，我還是會覺得爸爸很疼我…只要我跟他講我肚子餓，他就會帶我出去。」(DI:048)

「我本身不喜歡吃棉花糖，我只是隨口戲裡面的棉花糖很漂亮這樣子，然後我爸就自顧自地買回來。」(AI:097)

4. 棍棒下出孝子？

衝突發生時，所有受訪者家庭的因應方式都是打罵威脅。比如：小葵憶起父親教訓二哥、鈴蘭回憶父親激烈的口吻、天星在父親家暴中長大、薔薇的父親沒來由地打小孩。

「我二哥又非常討厭我，所以他常常會去打或罵二哥。」(AI:123)

「爸爸在情緒下的處理就是，他會選擇用比較激烈的方式，一些『莫佢我拚(中譯：不要跟我拚)』、『逼我去搶劫(中譯：逼我去搶劫)』、『逼我劊妳(中譯：逼迫我殺妳)』等等之類的。」(DII:099)

「我印象就是他，還是會打我跟我哥。」(EI:111)

「只要稍微吵一下下，不到一分鐘吧，他就會瞪妳，然後就會開始打小孩，沒有原因。」(CI:088)

在耳濡目染間，孩童有複製並延續打罵行為的可能性。忘憂提到當與哥哥吵架時，哥哥模仿母親的打罵模式；鈴蘭也提到哥哥的有樣學樣。

「她(媽媽)很忙沒耐性，她對我哥的管教就是打罵，所以當我哥覺得好像我不受他的控制，他的模式也是打罵。」(BI:076)

「哥哥只要跟我吵架，他就會拿爸爸的那句話『妳擱講？妳擱講一擺？妳上好擱大聲(中譯：妳再講？妳再講一次？妳再大聲試試看)！』。」(DII:099)

(二) 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

個體的發展狀態、居住地接近性、聯絡的頻率，以及正負向的情感互惠之交互作用，皆是影響親子關係發展的因素之一。

1. 成年

受訪者大多以十八歲作為生理上成年與否的分界點。成年後的天星希望父親不再把自己當小孩；在長兄如父的家庭下成長的忘憂，向哥哥徵求自主權。

「就覺得，他應該要用一個對待成年人的方式對待我，而不是把我當成一個需要教訓的小朋友。」(EI:122)

「我已經不再是那個小孩子的時候，我也不想要被你掌控。」(BI:164)

在心理層面，受訪者對於自己是否已經長大成人有不同的看法。如：忘憂認為一部份自己從未長大、鈴蘭對於自己是否為成熟大人的認知存有變動性；小葵在處理懷孕議題時深有感觸、薔薇分享她是在育兒後才有轉大人的感覺。

「行為上是個成人，可是內在我，沒有覺得自己長大過。」(BI:148)

「如果你問我現在，我會覺得我自己還在長大，我還不是大人；但是你問我國中，我國中就會回答你我已經是大人了。」(DI:096)

「都沒留下來，但是對我來講那算是一夜之間長大吧。就是有一個負擔，在妳身上兩個生命這樣子。」(AI:154)

「小孩不是說剛出生就認為，可能養他一、兩年後才認為，哦，真的是大人了。」(CII:022)

子女邁入成年之際，情感及責任上也相對應有所調整。鈴蘭成為父母的傾聽者；在家庭中，忘憂定位自己是照顧者並期許也成為經濟支柱之一，而當感到疲憊時，母親是忘憂的支持力量。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在家裡面扮演的角色，算是媽媽，跟爸爸的傾聽者。」(DII:033)

「我在家庭中的角色應該有點像照顧者吧…做醬油的那塊因為其實剛開始做，生意沒有那麼穩定啦。」(BI:195)、「當個照顧者沒有那麼容易的時候，她會變成一個支持的力量。」(BI:115)

2. 心靈成長

某一刻的領悟、或某事件的發生，以及受訪者的意願，在三者交織下心理層面的轉變，影響後續行為的展現。小葵主動向母親爭取改變親子溝通的模式；忘憂接受阿德勒心理學的思想，改善了家庭互動關係；當鈴蘭願意站到父母的立場去思考，親子互動有了變化，也能以合適的方法跟父親交流；天星放下對父親的成見。

「(一直以來家裡的溝通方式都是大人做決定就是定案,小孩僅是被告知)…
用比較柔和的方式跟我媽爭取,從那之後我們的溝通就變得比較柔和。」

(AII:103)

「把那個界線劃分清楚的時候…我們相處就會再好一點。」(BI:167)

「我有跟他們提醒過說我不想要這樣子,我想要再多一點,我就會比較不要臉地講,然後他們才願意再給我多一點、好一點的鼓勵。」(DI:204)、「為小時候可能比較不會講話,然後也比較不會懂得ㄟㄟㄟ(中譯:撒嬌),所以長大比較會ㄟㄟㄟ之後,讓我覺得嗯,這就是我爸爸,還是疼我的那個。」(DI:048)

「就沒有,沒有像以前那麼,討厭他、抱怨他,但是,我也不會跟他聯絡。」

(EII:151)

3. 穩定的工作

工作的穩定程度會影響父母對子輩的看法,尚未有合適工作的子輩父母可能會因憂心而責備催促。

「(大哥)他是做那種娃娃機台主,然後又常常熬夜,所以熬夜的話就會被我爸唸…(二哥)他領的薪水是比較正規啦,也比較比較穩定…在我爸的眼裡看起來可能就可愛了那麼一點。」(AI:126-128)

4. 居住地的遠近

忘憂說與祖母因為同住而有更多交流機會;小葵則提到同住會為親子間帶來更多摩擦。

「她不會期待我對她有多親密,可是她會跟我講一些東西,嘿。」(BI:115)

「住在家裡就是最可憐的。就是做什麼都感覺會被管,然後看久了又不順眼,所以就常常會被唸…搬出去住見的面少了,所以每次回來好像都覺得,誼這個孩子好像更可愛了。」(AI:125-126)

5. 社群軟體的功能

一些受訪者傾向透過通訊軟體與父母聯繫，如：鈴蘭、小葵。根據受訪者回應，由於 Line 的便利性，親子間的情感交流不因距離而受限，惟大部分是與本就較為親近的母親聯繫，較難和父親有話題。

「我通常就只會跟，爸爸媽媽講電話、打字，因為他們不在高雄，他們在外地工作。」(DI:046)

「用 Line 的話就是有時候會問候一下，看看今天在做什麼啊，怎麼樣。」(AII:030)

6. 親密伴侶與婚後家庭

親密伴侶的建議與陪伴有時能改善膠著的親子關係，或成為親子衝突時的支持力量。薔薇在接受先生的建議後發覺來自原生家庭壓力的減輕；天星肯定男友的無聲陪伴。

「他就說啊不然妳就不要跟妳的家人有任何的接觸這樣子…的確是沒有再跟他們接觸，還蠻平穩的，愉快，這樣在過生活。」(CII:121)

「默默地支持我吧…那時候他就陪我去報警啊什麼的，就也沒有做出太多的阻止啊或者是質問啊等等的反應…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回應。」(EII:120)

薔薇雖排斥與原生家庭，但她願意讓自己小孩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或許婚後家庭生活或成為母職角色，能改善成年女性與原生家庭親子關係。

「我不會主動帶他們去找她，但我的生母會主動來看他們…我覺得站在奶奶的角色，都是喜歡把玩孫子，疼愛孫子，然後我也不能剝奪我的小孩享受那個奶奶或外婆的相處…可是，我完全不會跟我的，生母有互動。就坐在那邊，也都不跟她講話。」(CII:154-155)

四、小結

回溯成長過程，受訪者以各自的方式省視幼時經驗和其對自我之衝擊。受訪

者普遍對於母親有高於父親的評價，或許是因在教養孩童方面，母親仍是付出較多心力的一方，情感上亦與受訪者較為貼近。成年後反芻義務的承擔與雙親是否為稱職的父母有所關連。縱使為骨肉至親，仍在舔舐童年遺留傷口的受訪者，不一定願意贍養未盡親職的父母。然而，前述情形似於女兒成為母親時，存有轉圜餘地。

在親子互動中，因那些增益其所不能與生命歷程的探索，受訪者有能力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改善失衡狀態的主導方。從他們的言談中可以發現，愈來愈能雲淡風輕地提起這些人事物，接受其為構成現在的自己的一部分時，戒慎恐懼的童年不再是薛西弗斯的石頭。將受訪者的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情形，整理如圖 4-2-1。

圖 4-2-1

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第三節 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

探究受訪者對於加害者之觀點、其對個體的衝擊與知覺性創傷事件的完整脈絡。

一、始於暗夜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女孩家中躲著一頭怪物。披著家人熟悉的面容，卻在無人知曉的時刻，蠱惑女孩同他進行新奇而怪異的冒險——一場如脫不掉的紅舞鞋的冒險。

(一) 暗流湧動的日常

事件發生初期，年齡尚小的受訪者對於加害者的行為無辨別能力。懵懂無知的受訪者，反而以為那只是在玩耍，或是展現父愛的一種方式。

「我們兩個玩遊戲玩一玩他突然就做了這個舉動，其實那當下我就覺得他是在跟我玩遊戲，我並沒有覺得說，他是在對我做不好的事情。」(AII:042)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一直都是覺得哥哥是在跟我玩。」(DII:038)

「那時候我會認為是父愛的撫摸，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怪怪的。」(CII:068)

加害者常以誘騙、威脅的方式騷擾並猥褻受訪者。例如：母親男友對小志憂的拐騙、鈴蘭提起大哥的誘惑及二哥的脅迫、天星懼怕會家暴的父親。

「給一些甜頭，就有點像哄騙吧，他就會說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祕密妳不可以跟別人講。」(BII:052)

「大哥哥是用一種誘惑的方式說『妹妹我跟你說，哥哥給你機會，妳要不要試？妳想要什麼，哥哥我買給你。』」(DII:041)、「他過去都會拿大哥哥的事情威脅我…妳不跟我做，我就跟別人說。」(DII:108)

「小時候就很怕我爸，所以我也不敢反抗他。」(EII:070)

當發現無人知曉自己的侵害行為時，加害者行為會越發大膽，受訪者的受害嚴重程度也在短時間加劇。

「他們越玩越過火。他們會跟我說『誒那妳要不要脫褲子？那妳要不要脫內褲？妳要不要讓我摸、讓我看？』」(DII:039)

「他就開始很大膽地射精…撫摸妳到他覺得滿足的時候，他就開始拉著妳的

手去摸他。」(CII:085)

「一開始其實只有摸私密處，後來漸漸地越來越大膽…可能一、二個月嗎，就有做這件事情（性侵）。」(AII:043)

(二) 察覺異樣的輕顫

所有受訪者皆提及，學校性教育相關課程有助於得知自我保護觀念，並啟發危機意識。他們多亦是經此察覺性侵害行為的不正確性。

「到國小五、六年級開始，有接觸過性教育，才了解這是不對的事情」(AI:224)。

「等到妳小五、小六，其實學校就會教一些有關於自我保護的觀念的時候，就覺得那個行為好像是不太對的」(BII:053)。

「六年級的時候吧，可能有什麼性教育之類的，我才驚覺原來那個是射精，太噁心了」(CII:095)。

「開始上性教育的課之類的…課本裡面就會寫說要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身體，別人不應該隨便摸你的身體等等的」(EII:072)。

情境會影響加害者的行為頻率增加或減少。導致行為增加的情況如：小葵在與哥哥同睡一張床後受害頻率提高、忘憂提到加害者對於「合適機會」的虎視眈眈；致使加害者減少行為的狀況如：天星的嘗試鎖門、忘憂的激烈反抗。

「睡在一起的時候，頻率變更高，不管是性騷擾還是性侵這件事情」。(AII:039)

「他沒有直接把我帶回家，他會找一個地方停了車，在車上對我進行猥褻…我跟我媽還有他三個人一起在床上的時候，他可能也會在床上對我進行猥褻。」(BII:053-054)

「我第一次鎖門的時候他很憤怒…後來我有再鎖幾次門，我爸週末進來的次數就比較少了。」(EII:087)

「我高中的時候有比較強烈的抗拒的時候，次數就會降低…可是他還是會一

直試圖想要對妳做一些很不想發生的事情。」(BII:057)

(三) 我該怎麼做才好？

當認知到性侵害是負面的行為時，受訪者當下是手足無措的，內心感到煎熬、壓抑，並陷入膠著狀態。

「我會覺得不舒服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去跟別人講或是，怎麼求助。」

(AII:044)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不太對，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去跟誰講，能夠找誰講，就把這件事壓在自己的心裡。」(BII:054)

「我真的很害怕他們發現我的秘密，但是又想求救，很矛盾。」(CI:126)

有些受訪者曾以迴避的方式掩飾事件發生的真實性。如：忘憂否認以淡化傷害、薔薇自我催眠，並營造假象。

「脫離那個環境的時候，我就會有一個想法說，會不會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或許那件事沒有真的發生，可能是我作夢夢到的。」(BII:059)

「我會把它說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CI:122)、「我會做一些隱藏，讓人家不要發現我的秘密。」(CI:125)

在長期受到性侵害的過程中，受訪者曾試圖嚇阻或反抗，可惜大多成效不彰。哥哥並沒有因為小葵的好言相勸而停止，威嚇的效力也不持久；忘憂感受到母親男友語帶威脅。

「我先跟他談過了，我跟他說我不喜歡做這件事情，也希望他停止。但是他並沒有因為我去跟他談過這樣子他就停止他的行為。」(AII:044)、「久而久之他發現我沒有那個膽量去講…一開始他可能會會停止做這樣的事情，可是過一段時間他又開始了。」(AII:048)

「我比較抗拒的時候…一樣會有糖果，可是他又會有點恐嚇『如果我沒有跟妳發生這些事情，我就會去跟妳媽媽發生！』」(BII:054)

一些受訪者因長期反抗無果逐感麻木，開始合理化行為的正當性，藉此減少

自身的羞恥感，並貶低自我價值。

「其實我當下都會反抗，但是可能因為太多年了…反抗沒用，我好像就變成接受了。」(CII:086)

「因為爸爸媽媽沒辦法買給我，那我就跟哥哥講，哥哥有錢他可以給我，我就要用身體換。」(DII:067)

多數受訪者們都經歷一段自我懷疑的時期。比如：小葵說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在用性交換哥哥的關心、忘憂描述自己像在出賣身體、薔薇因此陷入角色混亂危機；鈴蘭將與哥哥的交換行為視作一種愛的獲得。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在用我們之間，這樣子的性關係然後去換得他對我的關心…好像我不這樣做，他就不會再關心我了。」(AII:050-051)

「我覺得那個時間我自己很像妓女，我就是用身體換錢。」(BII:066)

「我好像有很多身分，伴侶、女兒…到三年級他會開始拿他的薪水給我。」(CII:089)

「我會覺得那是一種愛，我得到一種「被愛」的感覺…『跟哥哥換，我就會得到愛。』、『我得到我想要的東西就是一種愛。』」(DII:103)

二、世界變得可怕

性創傷經驗就如同潛藏在神經叢裡的單純性皰疹，當免疫力不好時它就會出來搗蛋。受訪者所能做的，是察覺並用所有得到的技能、工具，減輕它帶來的痛苦，並靜待它癒合的那天。

(一) 創傷症狀

創傷記憶從未真正消失，而是隱藏在最深處，一旦觸發、一旦回想，仍是一如往昔般鑽心刻骨，全新且劇痛。創傷後壓力症（PTSD）是所有受訪者需長期抗衡和共處的症狀。

1. 創傷再現

兒時性創傷經驗就像是潛藏在日常生活的噩夢，總是在不經意的時刻來勢洶

洵，摧毀受訪者穩定的身心狀態。

「這件事情無時無刻都可能在不同時候回到妳的腦袋裡。可能妳就只是看個新聞，或是看到一些比較不經意的字眼，妳都可以馬上去聯想到。」(AI:189)

「那個惡夢突然再度地出現的時候，我整個像力氣被抽掉，整個人被擊倒。」
(BI:106)

「同學可能在討論一個新聞還是什麼，他就說『啊伊予強姦啦（中譯：她被強姦）！』…我就覺得我應該也是被強姦。」(CII:094)

性侵害議題就如同一個無法碰觸的詛咒。鈴蘭說她至今還是不敢閱讀《房思琪的私房樂園》；小葵和忘憂在接觸性侵害相關議題後，落入創傷迴圈，並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

「那本書我不敢看，因為我害怕我看了之後，哥哥的對我的那種，發生的事情的經過會讓我湧上心頭。」(DII:101)

「那個學期我做了很多關於性侵害的文獻回顧與報告，所以可能讓我自己有點陷入創傷的循環裡面。有點爬不出來。」(AII:129)

「可能有去接觸到那個議題的情況之下，我有一年的情況是我連生活自理都有點困難，我會忘記我有沒有吃飯，我也沒有辦法去感覺到我有沒有吃飯。」
(BI:169)

小葵和忘憂提到，當處在類似當時的受害情境時，會引發生理反應或心理苦痛。

「跟我大哥待在同一個情境下，就是我曾經事件發生的情境，如果重合的話，我會非常的焦躁…非常即刻地想要去逃離那個情境。」(AI:225-226)

「老師會帶冥想…一旦試圖去接觸內心的時候…我就會衝到廁所抱著廁所，抱著馬桶乾嘔。」(BI:150-151)

2. 傷人傾向

一些受訪者提到，偶而會無法克制出現一些偏激念頭與想要傷害他人的想法。

當受到驚嚇或因他人無意的觸碰，會展現攻擊性，或以較為極端的方式反應。

「我都已經遭受那麼多痛苦跟這麼多年的壓迫了，那為什麼我沒有一個理由，去做一些傷害人的事情。」(AII:102)

「有人走我後面…不管對方是誰(突然被嚇到)我是會攻擊對方的…很害怕我有一天壓抑不住自己我就去殺人(母親男友)，可是我沒有想要殺人。」(BII:068)

「只要一個人家不小心弄到妳或是什麼，我就會很極端地去回應，就跟他打架。」(CI:108)

3. 心理症狀

薔薇和忘憂說明自己有一些憂鬱反應，如：在夜晚自動哭泣、出現輕生念頭。

「晚上的時候，我會開始自己自動哭，哭很久，開始想說，啊怎麼會是我？」(CI:102)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都希望今天出門被車子撞…可以讓我脫離那些不開心的事情。」(BII:056)

一些受訪者表示在待人處事時會過於自我保護。例如：天星非常防備中年男性的靠近、薔薇易從負面的角度解讀他人行為、忘憂形容好像要掌控所有東西才會感到安心。

「我會特別地警戒年紀比較大的男生…在路上盯著我，或者是如果比較靠近，我就會後退，會想要保持一點距離。」(EII:122)

「幻想他對我有惡意…很想要拿刀子插他…連老師講了一句好像『誼，怎麼那麼晚進來？』，我也都很想要用手掐死他。」(CII:158)

「我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抓得緊緊的，要所有東西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要不然我就會覺得很不安、很焦慮。」(BII:104)

受訪者持續保持過度警覺的狀態，包含：睡眠障礙、容易驚醒、有情緒管理及情緒調解困難的問題、注意力不集中、易受驚嚇。

「我真的很難進入深層的睡眠…可能一點點小聲音我都可以馬上醒。」
(AII:063)

「有一段時間我很容易易怒。」(AII:066)

「他(朋友)說,有啊,妳國中的時候情緒非常地高低起伏。」(CII:114)

「我以前其實很容易暴走、暴怒,妳知道不對但妳就是沒辦法控制。」(BI:156)

「老師她就說『那個○○很不專心哦。上課時間會突然走心或走神。』…其實我在想可怕的事情。」(CI:107)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沒有辦法睡覺的…可能一點點小事都會驚嚇跳起來。」
(BII:068)

(二) 創傷影響

創傷影響從來沒有因性侵事件的結束而終止,它仍蔓延在受訪女性的每個生命週期中。小葵提及性創傷經驗對於受害者的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應該說他們輕忽了這件事情的傷害性是多深刻或是多長久的…內心深處留下來的傷痕,是多難以修復的」(AI:192-193)。

1. 生理層面的短期障礙

在遭遇性侵害期間,受害兒童常有一些異常行為出現。例如:小葵生活作息遭打亂、薔薇出現退化行為。

「被他鬧到我都一定要到一、兩點才能睡著,然後我隔天早上五、六點就要起床…很疲憊,不能好好獲得晚上休息的時間。」(AII:052-053)

「身體的反應就是我常常會尿褲子。」(CII:080)

2. 出現防衛機制

多數受訪者易感焦慮,認為惡意遍布生活之中,像是有些受訪者會出現受害者心態,強化負向思考的惡性循環。她們有時需仰賴外在的力量或物品獲取安全感。

「沒有我可以去的一個保護我的地方。」(CI:104)

「我就會覺得別人都應該要同情我，都應該要安慰我，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DI:092)

「我從小就會想要穿內衣睡覺。我大一的時候交了一個男朋友，他就有問我為什麼睡覺的時候要穿內衣？那個時候我什麼都沒有跟他說。」(EII:095)

「我會有一種固著是我去蓋我小時候那條大棉被，不管春夏秋冬…我身體要完全地覆蓋在棉被底下，我才有那種安心感。」(BI:150)

3. 人際界線適應困難

有些受訪者展現出討好行為，如：小葵習慣迎合、薔薇包裝自我；有些對於他人異常防備，如：忘憂無法輕易付出信任、鈴蘭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

「像我很難拒絕他一樣，這件事情擺到人際交往上也同樣，常常別人要我做什麼，即使我不想要我也很難去拒絕。」(AII:065)

「我很害怕人家會討厭我，會疏遠我，所以有點在包裝自己。人家需要什麼，我可以接受我都會說 yes…新的地方會趕快展現我親切的一面給他們看。」
(CII:178-179)

「我的生命歷程讓我直接跳入不信任與界線模糊，因此我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像是小孩子一樣，重新學習界線、情緒。」(BII:085)

「她（宿舍老師）講話就是讓妳覺得說，她已經先斷定妳就是有問題的，所以才不回家。」(DI:076)

4. 積極發展親密關係

一些受訪者在進入交往關係會有所顧慮，也會因事件的發生而自責，認為愧對另一半。但是多數受訪者仍然會主動並積極尋求發展親密關係，並渴望擁有自己的家庭。

「我曾經很害怕我未來的男朋友或者是我未來的另一半，沒有辦法接受我們家有這樣的狀況。」(DI:073)

「心裡就會覺得很對不起當時候，那時候的男朋友。」(AII:054)

「我蠻早就有交男朋友。」(EII:051)

「可能在某部分覺得自己有缺損，所以我一定要找個人補我。我就是缺了那一角，就是要等一角來補我，我們不可以分開。」(DI:124)

「我很渴求有一個穩定在一起的人…甚至你可以講，我渴望逃離這個家。」(AI:213)

「一年後吧，我們就在一起，然後我懷孕了就結婚。對，先有後婚。」(CI:136)

與伴侶發生性行為對鈴蘭和小葵而言，有著找到親密關係中的安全感、藉此洗刷性創傷經驗的意涵。在前述影響下，她們也面臨著未成年懷孕的風險。

「我對於這個次數的要求會不會太高？對於性這件事情的次數要求會不會太高是不是因為哥哥的關係？」(DII:071)

「我很渴望可以跟我喜歡的這個人…進入到性關係。」(AI:216-217)

「中間那一個（男朋友）的時候，有發生過我有懷孕的狀況。」(DI:106)

「在高中交往的時候…我兩次意外懷孕，但是就是都沒留下來。」(AI:154)

三、飛越荊棘的青鳥

即使偶爾還是會跌入悲傷情緒和負向思考的漩渦，但是慢慢地，受訪女性們學習接納自己所有好的與壞的狀態，找尋與傷口和平共存的方式。

(一) 隱藏在家中的雙面怪物

據說怪物有著善惡兩副面孔，他並不總是那麼殘暴而令人討厭，但女孩由衷期盼怪物不再出現那天的到來。儘管後來怪物遭繩之以法，每個在暗夜中晃動的陰影仍令女孩草木皆兵。

1. 傳說中的怪物

在受訪過程中可以發現，五位女性皆以含有負面意象的詞語描述加害者。鈴蘭對於哥哥的言行與觀念灌輸感到厭惡；父親「第二個老婆」的發言令薔薇反感；母親男友的存在使忘憂倍感壓迫；天星認為父親是壓力源，並有他不在一切可能會更好的想法；小葵對大哥抱持又愛又恨的複雜情感。

「覺得他（大哥）是一個很討人厭的傢伙，會對我毛手毛腳…灌輸說妳是妹妹，所以妳一定要聽我的讓我幹麻或幹麻。」（DI:055）

「他說『嘿呀，甘那袂輸家已諗第二個某咧（中譯：對啊，她就像自己的第二個老婆）！』…我聽了很噁心，覺得他很恐怖。」（CII:138）

「那個人還是一直在我家出現，一定會有壓力。」（BI:109）

「我一直覺得他對於我跟我哥來說是一負面的壓力…如果他不在的話，會更好。」（EI:136）

「就是可以很親密，但是又很令我也從根本地很抗拒的一個角色吧。」（AI:080）

一些受訪者曾探究加害者行為的原因：小葵認為哥哥施虐的原因很無理、忘憂無法理解母親男友的想法。

「我曾經問過他說，為什麼我們兩個要做這件事情…他給我的原因很離譜。他說，因為妳是家裡唯一的女生。」（AII:044-45）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他以前對我做的那些事情，他覺得好像做得不對，可是他又覺得他很想跟我發生關係。」（BII:060）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希望加害者可以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懲罰。當得知哥哥未受懲罰時，鈴蘭感到不公；小葵希望懲罰哥哥卻又有點猶豫；天星希望父親能面對過錯；薔薇想讓父親嘗嘗自食惡果的滋味。

「哥哥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接受。」（DII:060）

「我很想要他受到什麼處罰，但是我不希望他真的被關到牢裡面。」（AII:100）

「我是沒有一定要讓他接受懲罰，我只是覺得他需要承認自己有做錯，去接受他自己有做錯這件事情，這樣就已經夠了。」（EI:083）

「他要去承受我以前身心的恐懼、害怕…他還要很孤獨、很孤老，就是我要把這些丟還給他，讓他也嚐嚐看。」（CII:145）

2. 當怪物出現時

許是為了自我安全感，受訪者會與加害者會保持一定的空間界線。像是：小葵避免與哥哥肢體接觸、忘憂對母親男友的警戒、鈴蘭避開單獨相處。

「(跟哥哥)坐在一起我都覺得很尷尬…比較恢復到以前的關係，但是對於身體上的碰觸我還是會抗拒。」(AII:178)

「我跟他的接觸只會在大家都在的時間。保持基本的社交，就是基本的禮儀而已，其他不會接觸。」(BII:089)

「當舊家只剩他，我就會堅持我自己一定要再多一個人陪我回去，因為我不想跟他單獨，就算是二哥哥也一樣。」(DI:064)

除了物理空間外，受訪者對加害者存在心理距離。當與哥哥共處太久，鈴蘭會感到不自在；忘憂不願意和母親男友有聯繫。天星則是已和父親斷絕聯繫。

「我接受他這個人暫時出現在這裡…太久我就會覺得不舒服。」(DI:063)

「我媽那時候有想要把我的手機給他，我其實很排斥…目前他完全沒有我的聯繫方式。」(BII:057)

「就斷絕關係，就沒有再跟他聯絡了。」(EI:072)

因為加害者為親人，受訪者對其的情感呈現矛盾性，有時也會有所退讓。小葵對大哥有恨也有愛；鈴蘭為了家庭和諧而短暫妥協；天星希望各自安好。

「因為他還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也無法去對他有很多的怨恨。就真的要我講的話我還是很愛他。」(AI:081)

「有的時候如果媽媽要我們約吃飯，我就會回家跟他們一起吃飯。」(DI:045)

「沒有像以前那麼討厭他、抱怨他，但是我也不會跟他聯絡。」(EII:151)

(二) 柳暗花明

1. 重釋人生風景

對於所有受訪女性來說，性創傷經驗是一場持續已久，彷彿永遠不會醒的惡夢。

「從小到高中吧…從我有印象開始，但我不確定是幾歲。」(EII:067)

「從國小的時候，然後一直到高中，高一下學期的時候才被我揭露這樣子。」

(AII:036)

「這件事是慢慢慢慢循環然後長時間，應該是三、四歲到我國一。」(CI:040)

「可能從我七、八歲到我最後可能十七、八歲，大概十年吧。」(BII:059)

「零歲到我十五歲這段時間，都是成長過程中可能當中有我性侵的經驗。」

(DI:184)

遠離加害者的聯繫似乎是避免再次受到性侵害最有效的方法。例如：薔薇常借住同學家、忘憂很少回家、鈴蘭離家生活、天星斷絕聯繫。

「只要那個同學願意說『好啊，妳來我家住！』我就都一定不會放過那個機會。」(CI:037)

「大學後來我填了一間很遠的學校…我也很少回家。」(BII:057)

「我高中的時候搬出來。」(DI:068)

「做到不連絡吧！就是不要讓他（爸爸）影響到我。」(EI:078)

現階段的受訪者以正向的態度重新詮釋兒時性創傷事件。小葵和薔薇將其化為成長動力與助力；忘憂從自怨自艾到放下接受；鈴蘭和天星認為是過去種種使自己變得堅韌且獨立。

「影子是光線必須要的存在…對於我來說，這件事情就是像在平面圖上面的影子，因為有影子才會有光的存在。」(AII:167)

「那時候是不甘願，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接受它就是發生在，已經造成傷害了，我怎麼樣去減少這些事情對我的傷害。」(BII:061)

「我的遭遇變成我的助力。」(CI:151)

「自己的個性跟同學比起來好像比較可以接受有一些壓力，會願意接受挑戰…我的這些經驗反而讓我覺得比較好。」(DI:101)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這些的話，我就不會是現在的我了，我就不會這麼獨立，

自己去做任何事情。」(EII:153)

多年後，受訪者們以各自的方法面對過往的傷害。忘憂認為自己尚無處理創傷事件的能力，以維持自己狀態穩定為優先；鈴蘭和天星選擇放下並慢慢接受自己的變動狀態；小葵和薔薇堅定地踏上復原之路，即使知道每次都要面對再次撕開傷口的痛苦，也不想原地踏步。

「內在小孩就好像現在坐在懸崖邊，他很危險，需要有人去支持，可是我自己的能力又還不夠，沒有那個自信去抓著他把他拉上來…就算我還沒有準備好我，我也不會讓現在的我被過去的我影響。」(BI:189)

「我決定要跟過去的事情說再見之後，我的情況就越來越好。」(EII:155)

「以前沒有辦法接受改變（自己開始從不同角度和立場去看待創傷事件），可是現在是默默默默地接受。」(DI:138)

「我覺得自己還是主要，我要自己去改變、去走出來，沒有人可以幫我，只有我自己，所以我把自己是排第一」(CII:163)。

「我知道沒有人可以去救我，能幫我的只有我自己…就算它真的很痛苦，很長久…不想是好了才繼續走。應該是，往前走才會好。」(AI:195-196)

2. 關於原諒與寬恕

對於絕大部分的受訪者來說，原諒加害者是困難且遙遙無期的。許是因味覺的加害者尚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內心亦對其行為還無法釋懷。

「有些事情也不是我想忘記，或想原諒，就能盡力做到的。」(AI:081)

「很多很多人跟我說，哥哥已經在監獄服刑過了，或者是哥哥已經為了他的未來償還過了，他已經在他的人生當中留下汙點，但我還是不能夠接受。」(DI:059)

「我不會原諒他…蔡依林有一首歌我覺得非常地貼切寫著我的報復心——你也有今天。」(CII:167)

忘憂和鈴蘭提到自己從未得到道歉，也感受不到加害者的歉意。來自於加害

者反躬自省的真誠歉意也許是受訪者原諒加害者的重要條件之一。

「他可能在講那些事情的時候他有一些歉意吧？可是他沒有認真地道歉過這件事情。」(BII:093)

「我沒有辦法原諒他們的點是，他們對我做出這些傷害卻沒有給我一句對不起。一個道歉都沒有！他們就當作這件事情都沒有發生。」(DII:093)

尚無法原諒對方時，可以先試著放過自己。小葵在察覺哥哥了解自己經歷的痛苦時，寬恕了自己；儘管忘憂能感受到母親男友的改變，目前她更希望專注於減少傷害的影響。

「他真真切切地了解了我的痛苦，那一刻我彷彿解脫了，也原諒了自己。」(AII:163)

「他後來去接觸了宗教之後…個性有慢慢改變，也把酒戒掉了…他會想要買東西給我，我覺得也有一種補償心態啦。」(BII:089)、「我覺得原諒不原諒對我來說已經不是重點，我要怎麼把自己的生活過好才是重要的…能好好呼吸就已經是感謝天地自己了。」(BII:093-094)

(三) 世界以痛吻我，我報之以善

薔薇和鈴蘭基於自身的經歷，提出預防兒時性侵害的做法，如：性教育提前、教導孩童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會覺得是要提早，我才可以勇敢說不…因為我的那些知識非常地不足…我沒有方向，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做，不知道要去求助。」(CII:124)

「與其叫他要保護好自己，我覺得要讓他能夠去辨別這事情的對跟錯。保護好自己是一大要點，但是真正的是她能夠去辨認事情的對跟錯。」(DII:107)

在每一個受傷的心靈裡，仍然藏有許多對世界的溫柔。忘憂祈願不再有兒童受到相同的傷害；薔薇期許未來能成為助人者；小葵想告訴每一位受傷的人兒：「不是你的錯」。

「如果可以我希望這件事情不要發生。在任何一個女生，或任何一個小孩身上。」(BII:079)

「我以後退休我要成為類似這樣子社工，幫幫跟我一樣地遭遇的人。」
(CII:187)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這樣的人能好好的揭露吧！最重要的：『不是你的錯，所以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感到羞恥。』」(AII:180)

四、小結

受訪者對於性創傷經驗和加害者之看法及感受，可能因物換星移，或者加害者的行為改變而有轉變。她們不一定能諒解某人、某事所遭致的因果，但開始練習著寬恕自我，從歷經無數淬鍊的內心中長出茁壯的力量，去克服生活中的種種艱難。

對於受訪者來說，性創傷經驗並不是想忘記就能完全遺忘的，似乎只能蟄伏等待，將一切交給時間，直到對遭遇的苦痛有新的感悟，察覺與他人有更深的連結，感受到負向情緒的減輕，從而賦予生命新的意義。他們無法選擇出身，但能夠決定自己往後的人生。將受訪者所知覺的性創傷經驗整理如圖 4-3-1。

圖 4-3-1

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第四節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與影響

描繪受訪者於揭露過程的掙扎與抉擇，以及在揭露後受訪者的個體、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三個層面的交織情況。

一、我應該保守秘密嗎？

孩童時期的揭露大部分是希望可以停止事件的發生；成年時期的揭露則是一有目的並經過理性權衡的過程。

(一) 內心的拔河賽

推力與阻力的斡旋影響受訪者是否揭露性創傷事件。在作出選擇時，受訪者需有承擔相應後果的心理準備。

1. 那些勇氣的源頭

在個體層面，受訪者的身心狀態與揭露事件息息相關。例如：小葵意識到身體界線、薔薇情緒未得到舒緩、鈴蘭發覺不再需要隱瞞。

「我真的意識到我自己身體界線…有小孩的時候我真正地去正視我自己的內心就是，知道我就是不想要這樣子的關係。我必須要去把這關係做一個阻斷。」(AI:154-155)

「沒辦法正常生活，因為妳會被那件事情影響到情緒…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小孩、我的丈夫，可能都會有一點關聯性的一些影響到。」(CII:037)

「媽媽是親眼看見哥哥正在對我做性侵的動作。」(DI:072)

對於加害者的期許與加害者在事件後展現的行為，是影響受訪者是否揭露的原因之一。小葵希望大哥能夠理解他的行為帶來多麼大的痛苦；鈴蘭和天星因為加害者沒有受到懲罰、怙惡不悛，且不曾認為自己行為是錯誤的，而感到心灰意冷，欲透過揭露讓大家了解事件真相；薔薇則欲免除扶養義務，不願意在往後承擔贍養加害者的義務。

「我希望讓我哥哥知道我有多痛苦，至少…我也不是想要他去坐牢。」
(AII:123-125)

「哥哥沒有受到懲罰，我就更覺得這件事情更應該要講。」(DII:085)、「自己生了小孩然後不管…他換過很多個女朋友，甚至發生過對方要告他性侵的狀況。」(DI:061-062)

「他(爸爸)並不覺得他自己有錯，就算他自己有錯，他也不會承認…大家只會看到他想要告訴大家的，但是這些行為並不是事實，所以我才決定要告訴大家我到底都經歷了什麼。」(EI:082)

「我一定要提告他對我做過這樣的事情，法律才可以認同我以後就不需要去養他們。」(CII:035)

忘憂表示自己會選擇向預期能夠以正向態度回應的對象揭露事件。薔薇和鈴蘭發現，向他人傾訴就如同有人願意和自己分攤秘密的重量，一切好像都在慢慢變好，而且真的講出口後也沒有帶來預期中的負向結果。

「我會選擇給我正向回覆的人揭露。」(BII:105)

「有跟比較好的同學說我有發生這樣的經驗…就像那種許願精靈…釋放出來再把它埋好，然後踩一踩，能不記住就不要記住。」(CII:097)

「我發現講了這件事情的結果並沒有像我預期的那麼糟…同學跟老師們的關心下，我覺得講這件事情沒有關係。」(DII:086)

面對有相同遭遇的受害者，多數受訪者更願意坦承彼此的創傷。可能是因為情感上可以相互理解，理性上也認為向該對象揭露比較安全，再次受傷的風險較小。

「跟那個網友揭露這件事情其實是因為那個網友跟我有類似的經驗。」(BII:074)

「家庭狀況也很相似…所以當我有精神狀況或者是當她有精神狀況的時候，我們可以互相理解。」(DI:169)

「一個高中跟我蠻好的同學…他自己也有被家裡性創傷的事情，他有問我就我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遭遇，所以我才跟他說。」(EII:093)

小葵與鈴蘭在諮商後覺察到自己的變化，像是發現揭露阻力減輕，以及比起過去更願意開口訴說。

「還沒接受諮商之前的我來說，阻力是大於助力的。」(AII:145)

「他（心理師）就說妳這樣蓋著，傷口在底下會潰爛，它有一天會變得比妳現在看到的情況更糟…我也開始覺得這件事情整個下來都不是正確的。」

(DII:052)

小葵從#Metoo 運動中獲得力量；薔薇感受到社會對於女性的賦權。其顯示社會的轉變有時候也能促使受訪女性勇敢說出過往傷害。

「#Metoo 運動對我來說有滿大的影響，帶來了很大的勇氣。」(AII:147)

「我以前聽到的是覺得說，要接受這是不合理的，就好像沒有女權、沒有自主權。這五年接觸的社會，讓我比較有感覺到女權的感覺。」(CII:036)

2. 那些難以擺脫的枷鎖

害怕是阻礙受訪者揭露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小葵和鈴蘭深怕再次受到重傷、忘憂和鈴蘭擔心傷害非施虐家人或他人，或是導致家庭破裂、天星忌憚事件遭大肆宣揚。

「我很害怕我講出來之後會受到更嚴重的傷害。」(AII:071)

「我從不會去把這件事情掛在嘴上，因為我擔心，別人會不會拿這件事情成為我的傷口。」(DII:082)

「當我講出這件事情是會傷害到別人的時候，比如說我媽或我家人的時候，我就會盡可能的不要讓他們知道。」(BII:081)

「我講了爸爸媽媽會覺得我不好，家裡面會破裂都是因為我的關係，這種壓力我不想要承擔，我就不講了。」(DII:048)

「我會不敢說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怕別人知道。」(EII:081)

不論是出於自身意願或是經由妥協，一些受訪者展現保護加害者行為，並有維護加害者形象的想法。

「我選擇裝傻，人家問我我就說我不知道，我當時後睡著了，那時候我沒有什麼感覺。」(DII:041)

「我感覺自己受制於加害人給予身邊的人的形象，我很害怕自己會破壞他在其他人心裡的形象以及關係。」(AII:147)

外在的威脅亦為造成未能及時將事件說出口的原因之一。鈴蘭因哥哥們的威脅而不敢揭發事件；薔薇說當時師長對於性侵害事件的發生未具備敏銳觀察力。

「小時候並沒有講是因為他跟我說，妳看看妳小時候去寄養家庭，妳以後也會離開家裡，然後我就不敢講。」(DI:055)

「他很多誤解我，他都把我貼了太多標籤。因為他都會說我是個不自愛的女生。」(CI:120)

多數受訪者感受到來自社會傳統價值觀的箝制，包含：羞愧感、遭到質疑、家醜不外揚觀念、性別角色印象。

「我覺得我講出來很丟臉。」(DII:070)

「標籤化的部分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阻力。如果只是提及性侵害這件事情還好，但如果我說出這件事情發生了有七、八年之久，總是會有質疑的聲音出現，像是那時候的媽媽及男友，這讓我很受傷。」(AII:148)

「我覺得那個時期沒有包容家裡醜事的那種心態…連老師都是封閉的。給我的印象就是家醜不要外揚。」(CI:112)

「還是會有人會說妳這件事情妳不要跟別人說，真的很丟臉，你們家發生這種事，家醜不可外揚…會讓我覺得說我是不是不要講？」(DII:104)

「我都有想過要講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難被異性接受。」(AII:070)

幼年時期未揭露事件多數乃因不知道應該要說、不敢講、不曉得怎麼開口，或是未能即時求助。

「因為我媽在睡覺，她也沒有發覺，我也不敢講。」(BII:054)

「他(老師)那個時候問，其實我想跟他說是什麼原因，但是我沒有勇氣。」

(CI:110)

「我覺得我不知道怎麼開口講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沒有人教我怎麼講。」(DII:041)

「以前的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應該要講出來。」(EI:149)

當他人不知情時，受訪者可能遭到誤會，也可能致使家庭衝突增加。如：忘憂憶及與母親的爭執、薔薇因師長的質問感到難過，並將事件的發生歸咎於自身。

「我媽覺得他跟我很疏離…我不知道怎麼開口講那個經歷，我也不是以前小時候一直聽她話的小孩。」(BI:105-106)

「老師質問我說為什麼都要往外面跑…我可能不信任他…我沒有很敞開心胸地跟他說，他不了解，但是那個當下就是心情很難過。」(CI:039-040)、

「我是不是真的不自愛？我應該是不自愛的女孩，因為不自愛，才遇到這些事情。」(CI:121)

成年的揭露經過理性考量。尤其在選擇是否像非施虐家人揭露時，更易顧忌負向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例如：小葵預期父親的負面反應、忘憂擔心揭露性創傷事件帶來的傷害及母親的偏激反應、鈴蘭還在等待可以和母親談論性創傷事件的時機到來。

「我哥會被打吧，甚至還會被趕出去。」(AII:143)

「以前不敢講是因為怕傷害到我媽，現在不敢講是因為怕我媽去傷害別人。可是我媽會去傷害別人是因為她受傷…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對她來講，應該會更受傷。」(BII:088)

「真的就是個性真的比較親，跟媽媽有很多話題可以聊…可是…她不能接受我講哥哥（二哥）的事。」(DI:053)

(二) 終於做了這個決定

根據不同的情境、時間點和傾訴對象，受訪者在揭露過程中會有在深度、廣度以及內容的差異性。

1. 對象

有關第一位揭露對象的選擇，向母親揭露者有兩位，另外三位分別向表哥、男朋友，及有相同經歷的網友訴說。

小葵認為男友是可依靠的；鈴蘭相信對方會守口如瓶、薔薇對同學的信賴；表哥是天星當時合適的傾訴人選，且認為他會幫忙保守秘密。前述說明顯示，信任感似乎是受訪者選擇揭露對象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也確定說，我男朋友他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就離開我。」(AII:071)

「可能覺得說他不會把這件事情輕易地說出去，所以我就會選擇，跟對方開口說這件事。」(DII:087)

「同班有五年以上了，所以很信任，就跟她分享。」(CII:103)

「妳是可以信任這個人的…他也不會跟我爸會有太深的羈絆。」(EII:076-077)

2. 方法

受訪者可能採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透露性創傷經驗。少數是直接講述，如薔薇：「我痛哭到都講不出話來…『我被爸爸強暴』…哭了四十幾分鐘，才吐出完整五個字[受訪者口誤，應為六個字]」(CII:099)。

大多數受訪者是採間接的方式揭露事件。如忘憂的哥哥，從陪伴就診中推測出原因並詢問，又如小葵以 Line 向男友訴說、以匿名文章向母親吐露。

「我哥聽到後有陪我聊，他有猜到原因。」(BI:107)

「不是當面講是用，Line 上。」(AII:096)、「我是用匿名網站，在上面發了一篇文章。因為我媽有我的臉書帳號，她常常會用…讓她去看到我的通知，然後再點進去文章裡面。」(AII:091)

在揭露初期，以口述的方式說明性創傷事件常使受訪者倍感艱難，故多以筆代口的方式。

「她就跟我說，妳講不出口的話那妳用寫的也沒關係，所以我那時候是用寫的。」(AII:092)

「那時候要把事實的經過描述的時候，我其實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用講的，我真的是用寫的…講出來好難，可是寫出來反而很容易。」(DII:096)

3. 廣度

首次揭露得到的正向回應能為往後的再次揭露提供正面效果。幾乎所有受訪者在得到正向回應後，逐步打開心房，並在一次次的完整或部分揭露中，爬梳事件的脈絡和自己的需求。

「他一直跟我說他要去找我哥哥談，但是我覺得不行，因為他們一定會打起來…我就承諾說我會去跟我媽講這件事情。」(AII:094)

「在我進新學校的第二天，我就馬上跟自己的班導師說我的經過。我跟他說大哥哥要出獄了…二哥哥也會，我希望學校可以保護我。」(DII:061)

「真的是要有一個願意跟妳先傾聽的人…開始有自己願意跨出一步，然後去找別的方式，像打求救電話、113，後來就會有一連串的一些讓我走出來的方式。」(CII:199)

「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應該至少有四、五次。」(BII:070)

反之，首次揭露得到負向回應的受訪者（如：表哥說出天星的秘密、薔薇母親未正視她的求助），要在很久很久之後才願意再次開口敘說。

「我不想再跟別人主動提起這件事情，會希望別人盡量不要知道，或者是不不要再提起這件事情。」(EII:093)

「我超級超級超級傷心的原來我跟我的親人求助，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原來這種事情是不應該去再去跟人家講，不應該再去求助，因為也沒人會去正視，去幫我解決…求助的意識（變得）非常微弱。」(CII:099)

有些受訪者在心境轉變後發覺向他人揭露兒時性創傷的阻力減輕。例如：小葵在督導詢問時能坦然以對；薔薇和天星在報案後突破心防，開始願意向同事和他人透露。

「在我進入○○（實習）之前就找我談過…想要親自跟我確認我是不是有這

樣的經驗。」(AII:133)

「報案一定會講，後來就慢慢釋懷了…那時候大家在聊誰比我更糟的那種比賽…我沒有那種很直接地那樣跟他（同事）說，他們就這樣猜。」(CII:109-110)

「我就會開始跟別人說，我去報警的時候就會有人就知道，就會問我發生什麼事情…我就會直接說出來。」(EII:102)

4. 持續時間

一些受訪者曾在性侵害行為發生時求助。天星在高中時嘗試向表哥吐露；薔薇在國小時告知母親；高中時的小葵不願再忍讓大哥的行為而向男友傾訴；鈴蘭在分別在國中和高中時講述。

「高中才跟我的表哥說過。第一次跟別人說。」(EII:073)

「我有透露給我的生母知道…但是她給我的答案是說，狼父就說可能是妳小時候尿床他才會碰到。」(CII:098)

「六、日我哥會回來…還要忍受他的騷擾。那時候我就有點忍無可忍。」(AII:070)

「我十五歲是第一次開口講自己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在我十七歲的時候第二次講，可是講的對象不一樣。」(DI:184-185)

部分受訪者在侵害行為終止時揭露。忘憂大部分是在遠離加害者的大學時期揭露；鈴蘭是在諮商後與母親進行深度會談；薔薇在婚前向先生坦誠。

「我跟他（網友）揭露過，接下來就是我那個同學…大部分都是在大學的時期。」(BII:074-075)

「跟媽媽進行一次很深的會談…在（國中）畢業前把（大哥）這件事情過程告訴媽媽。我說我知道哥哥以後一定會發生，二哥哥他也不會比哥哥還要來地輕。」(DII:087)

「我是結婚前跟他說的…認識一年後才跟他分享。」(CII:119-121)

部分受訪者在侵害行為終止數年後揭露。天星在與朋友談心時卸下心防在次揭露；薔薇感受到事件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而選擇報案；小葵與母親因事件爆發爭吵，其反倒成為平復傷痛的機會。

「問我小時候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情？可以去報警之類的，所以才跟他（朋友）說。」(EII:100)

「真的很不甘願，人家就說啊妳就時間到了就好，但我不甘願，我拖到二快三十才報案。」(CII:034)

「後來上大學談的那一次就有好好講過…有彼此好好地真的去理解對方說，她的難處跟我的難處。」(AII:127)

5. 深度

當揭露對象為家人時，受訪者傾向採取不完全揭露。其原因為：想要避免非施虐家人與加害者受到傷害，或將其作為往後是否可以再次揭露的試金石。

「我都只有講到性騷擾的階段…所以我把這件事情講得很雲淡風輕。」(AI:185-186)

「高中的時候有跟我的表哥說過，但是…就只是很點到而已，只有說一點點。」(EI:150)

清楚完整地描述事件經過的能力與受訪者的年齡及身心狀況有所相關。例如：鈴蘭因害怕口不擇言、薔薇因泣不成聲而失去揭露的機會。

「那個時候的我並沒有想清楚應該要怎麼跟大人做尋求…我當下就是很害怕，所以我就只有說我不知道，導致說後面的狀況越來越難處理。」(DI:072)

「他（老師）又問『啊爸爸嘞？』可能他誤會我了給他的訊息，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他也沒有繼續問下去。」(CI:119)

忘憂分享，此次受訪是她第一次完整地揭露兒時性創傷事件，而距離事件開始發生至今過了約近三十年的時光。

「你說我跟你講這些事情嗎？完整的揭露應該是第一次。」(BII:070)

二、揭露後的改變

一些受訪者提到，揭露事件可能會經歷一段烏煙瘴氣的時期，需要花很多時間做好準備，亦有其條件限制。如同一場博弈，揭露勢必伴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但也是釋放身上苦澀負擔的轉機。所有獲致的善意與惡意，都會成為面對往後人生的能量。

「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我才肯講我性侵的過程。」(DI:055)

「家裡整個都很混亂，因為那時候除了要解決我意外懷孕這件事情、我跟我男朋友的關係、我男朋友跟我媽的關係，還有我跟我哥的關係…每天都在哭吧那時候。」(AI:174-175)

「對這些人是可以信任的…有一個部分有一個目的…有一個部分可能是我跟我朋友在聊天，他就跟我揭露，那我也會跟他一起去揭露。」(BII:102)

(一) 長期溺水的人

揭露對象的負向回應就如一顆顆綁在身上的巨石，拖累嘗試浮出水面的溺水者。疲憊的身軀不斷下沉，靜謐且無聲。

1. 責備被害人

很多人在知悉事件後下意識的回應，像是一句無心的話語，常使受訪者有遭到指責的感受，因而再次受到重創。一些受訪者也確實體悟到悲喜自渡，他人難悟。

「很多人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常常第一個問題就是問『為什麼不求助？』…我甚至有時候會覺得這是在指責我。指責我說我默許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我身上。」(AII:150)

「『…妳怎麼都沒有動作？』…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是妳的問題！』」(CII:112)

「好像在指責我沒有說出來的感覺…『哦妳當下怎麼沒有跟我說啊？』、『妳當下怎麼沒有去找輔導室老師？』，或者是『妳怎麼沒有去找別人求救？』

類似的，我有遇過的對我來說比較不好的反應。」(EII:115)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他犯錯妳就原諒就好了，又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事情過了就過了，往前走會更好…但對於受害者來講，其實妳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AI:192)

2. 最親的傷最深

許多受訪者在揭露時，經歷家人的負面回應。小葵認為母親是因為不愛自己才能夠理性處理事件；家庭成員們的漠視，使薔薇負向情緒增加；鈴蘭感受到母親的逃避，並對父親的袒護哥哥的行為感到失望。

「如果她是很生氣地去指責，當著我的面指責我哥，哭啊不管怎麼樣…偏偏她就是很理性很理性地去解決這件事情，讓我覺得說她沒有替我感到心疼。」

(AII:126)

「我的兄弟姊妹都知道我的遭遇，但是他們都無感…認為那是我自己的問題。」(CI:079)、「我當下沒有反駁她，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反駁她，但是我內心無助感更高，想要去撞牆、去死掉，開始會埋怨他們、憤怒，很討厭他們。」(CII:102)

「她不能接受我講哥哥(性侵我)的事，可是她可以接受我講工作上的事。」

(DI:053)、「爸爸就用一句話回堵我說『哥哥也有未來啊，哥哥不重要嗎？』…我就選擇說，你們既然覺得哥哥的未來比較重要那我就成全你們。」

(DII:115)

3. 婚後家庭的挑戰

薔薇提到揭露事件對於婚後生活的衝擊，表示婆媳關係因此受損。

「只要講都不只有影響到原生家庭，只要有婚姻，也會影響到你的婚姻，會擔心對方在不在意，對方的家庭等等。」(CII:191)

「她完全不能接受…痛哭地說『如果我知道這件事，我堅決反對(你們的婚姻)！』…她就覺得是我的問題去誘發這些事情發生。」(CII:125-128)

4. 來自正式社會資源的未盡事宜

小葵表示校內的諮商經驗幫助較少；薔薇認為單一諮商的效果有限。其顯示出諮商資源似有其侷限性。

「學校的諮商資源它可能幫助沒有那麼地大…比較難去處理這類的創傷經驗…幫我進入到校外的，就是家防中心它們給的這個性侵害的諮商資源。」

(AII:130)

「單純諮商一段時間會讓妳舒暢，因為有人傾聽…但那個保鮮期過了，妳還是會低潮。」(CII:062)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談到依循通報程序進入司法體系過程的不愉快經驗。包含：警政人員的輕忽、社工忽略被害人意願、測謊過程出現不適宜的問題、重複陳述的多重創傷、囿於追溯期而無法判刑的犯行，以及司法系統對於受害者的被動。

「我有一次打電話給警察…他就認為說『齁，又是小孩。莫夠鬧啊啦（不要鬧了）！』…我姊姊說她有幫我打電話報警，但是警察不相信，連來都不來。」

(CII:122)

「我的負責社工一直告訴我，我必須去警察機關做筆錄或一些紀錄，這讓我壓力非常大，畢竟我沒有想要把我哥哥送進監獄。」(AII:109)

「問一些讓妳覺得不是很舒服的話，比如說『那個當下妳是很舒服的嗎？』」

(CII:048)

「現今的法律雖然是想要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但是在這過程中卻可能讓被害人受到二或三次的傷害，畢竟要一直一直揭露自己受到侵害的過程，我本人的經驗也不是很好，內容問得非常細節，令我非常不舒服。」(AII:110)

「我喪失了我前面十年的他的那個罪刑…最近的可能國小六年級或五年級，其餘的就沒有了，都不認同。我太晚去求助了。」(CII:143-144)

「我並不覺得台灣的法律有辦法讓我爭取到什麼。」(EI:147)

5. 與傳統價值觀的互斥

多數長輩將受訪者報案行為貼上不孝的標籤。

「長輩會把我帶入到我是個不孝女。」(CII:129)

「阿嬤在電話裏面罵我，就說『妳怎麼這樣做啊，很不孝啊』…對我來說是很受傷的。」(EII:116)

薔薇發覺有時候女性相較男性有更深化的刻板印象，忘憂則認為社會仍有進步的空間。

「女生大部分給我的感覺就是…雖然妳的父親是不好的，但是妳的問題比較多，妳很誇張，妳那時候一堆求助（方法）妳怎麼不求助。」(CII:122)

「因為還是一堆人用噁心的名詞形容女生欠幹活該、自己也有爽、破麻、鮑鮑換包包、女權自助餐之類的，我一點都沒有覺得環境有改變，很多人只是想看笑話。」(BII:108)

(二) 裂縫裡的光

小葵在受訪時提到揭露的正向效果：「對於我來說性侵害事件的揭露是有助於修復家庭關係以及自我修復的」(AII:180)。或許揭露是踏上療癒或復原之路的起點，也意味著生命韌性的展現。

受訪女性從自我心靈成長，未施虐家庭成員、親密伴侶或朋友所提供之正向支持，社工機構的協助，以及外在社會環境的改變中，得到抗衡過往經驗和創傷影響的力量。當受訪者以各自的步調和節奏步履蹣跚，無論是成功或失敗，那些過程終將成為成長的佐料，成就更好的自己。

1. 藥物和諮商的協助

忘憂曾依賴藥物維持狀態穩定；天星主要仰賴藥物治療。

「定期的服藥其實狀況有比較穩定下來。」(BI:106)

「藥物治療…本來勵○那邊有要安排諮商，但因為我要出國可能會衝到療程，所以後來就沒有。」(EII:123)

從訪談過程中發現，有時受訪者的就醫原因非是兒時性創傷事件。例如：忘憂一開始因憂鬱症狀就醫、小葵因與母親的負向關係去身心科、天星主訴為人際壓力。

「一開始只有吃憂鬱的藥，後來醫生確定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BI:107)

「身心科是高中的時候有，不是因為他（大哥）的事情，是因為我跟我媽吵架的事情。」(AII:067)

「因為那個同學所以感覺人際不是很好，跟別人相處就感覺被排擠。當時狀況一直很不好，就決定去看醫生。」(EII:127)

諮商是一個循序漸進、理解自我的過程。幾位受訪者是這樣說的：小葵認為諮商是有幫助的；忘憂藉此釐清自我角色；雖然會出現負面情緒，薔薇覺得諮商有助於探索自我。

「就是諮商之後。…也是心境上有一些轉變吧。」(AII:161)

「他會引導我自己去分析我自己的狀態，也有用一些包含像歐卡(OH cards)的工具…讓我去釐清在那件事情裡面的一個角色。」(BI:174)

「可能嘴巴妳是說這個答案，但是妳的內心不是這樣子的答案，會更認識自己…但是我這段時間是非常地浮躁、不開心。」(CII:057)

受訪女性嘗試各種方法重新省視並撫平內心的缺口。小葵認為揭露有益於自助；忘憂慢慢長大成有力量的狀態。

「可能我更有辦法去找到更多資源幫助我自己。」(AII:157)

「家族排列…心靈成長課程…曼陀羅的方式…敘說治療…做閱讀的那一塊…透過很多種不同的方式之後，去慢慢地讓我站起來，不再受到這些事情的影響。」(BI:175-178)

2. 自我調適與成長

在揭露事件後，受訪者對於自己身心狀況的掌控力有所改善，並能重新梳理事件並釐清責任歸因。

「成年的狀態之後，妳會比較清楚去感受到這些情緒…也會有一些方法去改善憤怒的狀態。」(BI:161)

「讓我再重新整理，不管是家暴，或者是性創傷的這些事情的一個轉轉機。」(EII:094)

「覺得自己很糟糕，是不是就是因為我所以這件事情才會發生…漸漸地比較有自信去接受說，我是有立場可以好好把這件事情告訴其他人的，因為這不是我的錯。」(AII:158-159)

也能以較放鬆的狀態去面對人際關係與生活。比如：小葵不再排斥人際交往，對於人事物皆能更加包容、忘憂將不好的過往轉化為溫暖關懷、天星放下過去並有往前邁進的感覺。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啊，關心啊，都是我蠻喜歡的。但以前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覺得很負擔」(AII:160)。「對自己及他人更加的寬容，以前我很容易因為一點事情不順心就發脾氣，或是埋怨沒有人懂得我的處境。」(AII:162)

「讓我變成溫暖關懷的人，有同理心，可以理解別人痛苦的人，它就是我的一段經歷。它當然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BII:095)

「不太會去回想說小時候發生了哪些哪些事情，然後嗯，我的人生怎麼這樣啊之類的，變得比較真的會放下過去，然後更往前面去邁向的感覺。」(EII:149)

3. 有人會接住我

對於受訪者而言，情感支持像有人陪你一起提重物，如：小葵接收到許多善念、忘憂不再需要獨自承受；物質支持像大熱天吹拂的涼風，如鈴蘭前男友的家人們為其提供安全居所。

「在我揭露之後，我接受到非常多的話就是『不要一個人擔著，一個人太辛苦了。』每每想起這句話，我還是會熱淚盈眶，因為真的一個人承擔太久了。」(AII:155)

「對我個人的改變是，至少有一個喘息的空間…感覺這個祕密快把自己逼瘋，

當有一些狀況的時候，有人可以講。」(BII:083)

「他們在我人生、求學當中，給了我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避風港，他們不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不會讓我覺得他們接受不了我們家。」(DI:081)

(1) 家人

小葵能從母親身上獲得支持，並會主動擁抱母親；忘憂說哥哥是她強力的後盾；天星與母親那邊的親戚聯繫變多。

「在大三和解之後，能明顯感受到媽媽的支持是正向的，她每周都會打電話關心我的狀態，也更加了解我的處境，對於我來說是有意義的支持。」

(AII:154)、「以前我可能很少對她有一些比較親密的肢體接觸，但是現在我可以很主動地去擁抱她。」(AII:173)

「在我哥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他會去避免掉我們兩個之間的一些接觸。」(BI:111)

「媽媽那邊的親戚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比較支持我…也開始比較慢慢有聯絡。」(EII:144)

(2) 朋友

朋友是忘憂的重要支持力量，並能給予包容；鈴蘭有位互相陪伴的朋友。

「我覺得支撐自己的力量是有的，支持自己走下去我真的覺得，很感謝我身邊的朋友。」(BI:204)、「朋友…一直在我身邊…站在一個合理的距離，去關心妳的狀態，給妳支持，然後給妳一些建議。」(BI:180)

「當我有精神狀況或者是當她有精神狀況的時候，我們可以互相理解，我們，會去勸對方說妳要想開一點，我們屬於那種比較陪伴式的。」(DI:170)

(3) 親密伴侶

男友更加關心小葵的安全與狀態；薔薇從丈夫身上得到慰藉。

「他可能希望我不要不要住在這個家裡…常常會關心我的安全，害怕我被騷擾，後來有保證如果再遇到同樣的事情我會第一時間求助，他就比較安心一

點。」(AII:081-082)

「他也沒有說什麼，他就安慰妳，抱抱妳…給妳心靈上的一些安慰。」(CII:118)

(4) 無為的力量

沒有表現出額外的同情，也並未自作聰明地出言安慰，聲稱理解一切，只是完全包容並接受受訪者。一些受訪者從這種「不作為」中感受到正向的支持。

「那些比較沉重的部分，我都可以很平緩地跟他講。雖然他不會有什麼反應，就是靜靜地聽，但是我覺得那就夠了。」(AII:175)

「他就陪我去報警啊什麼的，也沒有做出太多的阻止或者是質問…我覺得不指責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好的反應。」(EII:120)

三、家內性侵害的多重難題

家內性侵害的複雜性與矛盾點，在於受訪者難以從自我保護與保護家人、家庭間找到兩全之法。家人間相依耗損又修補著，每個人都可能是加害者，每個人都是事件的受害者。

(一) 個體層面

1. 為什麼沒有人發現？

一些受訪者偶爾會疑惑並埋怨當時非施虐照顧者為何未能發現異樣；薔薇則認為母親是刻意避而不談。

「『妳在這三、四個年頭裡面，從來沒有一個晚上看過哥哥上來嗎？』…媽媽竟然跟我說沒有。我也是覺得蠻困惑的。」(DII:111)

「常常會怪罪媽媽為甚麼沒辦法察覺異樣。」(AII:056)

「她應該有察覺，只是轉移話題，『我們不要再聊這件事了』對，給我的感覺是這樣子。」(CII:111)

2. 我感覺很矛盾

因加害者是親密家人或家庭經濟來源之一，受訪者對於該如何與其相處倍感為難。如：小葵在三角關係中的掙扎、忘憂感念母親男友的付出。

「我要恨我的媽媽也不是，然後要原諒我的哥哥也不是，在任何的角度上這都是很艱難也很矛盾的。」(AI:193)

「我雖然沒有很喜歡他，可是他其實真的還蠻照顧我媽的…他雖然對我做那些事情，可是他確實也是照顧了我們家人、家庭。」(BII:064-065)

清官難斷家務事，更何況是發生在家庭內的性侵害事件，不僅揭露更顯得艱難，想要斷絕關係也非易事。

「熟人性侵害的部分，是很難跟身邊的人揭露的，除非你跟當事人關係真的很不好、或他本來就是一個糟糕的人。」(AII:147)

「別人都跟我說『啊妳就斷絕關係嘛』，就講得那麼簡單，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容易。」(DII:092)

3. 膽顫心驚的揭露過程

揭露後的未知結果，導致小葵與鈴蘭六神無主、忐忑不安：

「我只記得我很害怕，連手都在發抖…我不知道我講了之後我媽會怎麼對我跟我哥…但是我又很害怕這件事情沒有被處理，就是我講出來結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AII:093)

「我那時候真的很緊張，想說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或是哥哥會不會被帶走？爸爸媽媽會怎麼樣看我？」(DI:116)

(二) 家庭層面

1. 沒有人站在我這邊

否認，常是非施虐家人的第一反應。鈴蘭的母親抵觸真相，父親甚至希望鈴蘭作偽證；哥哥曾對天星報案的動機抱持懷疑。

「大哥哥的事件裡面她是堅持大哥哥就是有做這件事，可是因為二哥哥的事件她沒有看到。」(DII:117)、「爸爸甚至有跟我說，能不能讓哥哥減刑，所以我在法官面前講謊話，不要讓哥哥判那麼重。」(DI:072)

「我哥就是有在質疑我說，是不是我其實只是想要跟我爸要錢，或者是想要

免除撫養義務，反正就是因為錢的關係所以我才去報案的。」(EII:116)

家中所有人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勸喻並期望受訪者原諒加害者。

「我奶奶那時候的話就是，他們都已經為了這些事情獻上他們的行為，我就是原諒他們，能夠笑著談這件事是比較好的。」(DII:093)

「我能知道她要我去隨著時間慢慢淡化這件事情，是做為一個母親希望我的兒子可以得到原諒。但是對於一個受害者來講，我會覺得是天方夜譚。」

(AI:189)

薔薇覺得母親的安慰很荒謬，也反感母親想要促進她與父親親近的作法；鈴蘭家人們各持己見，家庭面臨分崩離析。

「她的哥哥有一次可能性需求，就把她抓過來，晚上的時候跟她磨蹭…她想要讓我忘記，用這個來去安慰我。」(CI:049)、「她都會無時無刻打電話給我『誼，妳要不要跟妳爸爸講話啊？』我要跟他說什麼？我就覺得很厭惡。」

(CI:095)

「我們起了非常多的衝突。這些衝突導致生活在那個家裡面非常地無法喘息。」(DII:013)

2. 我依然守著秘密

因預期向非施虐家人揭露會得到糟糕的反應、不願其傷心難過，或因為性別致使的難以啟齒，一些受訪者決定僅向部分家庭成員揭露事件。

「我跟我媽都一致認為說，這件事情講告訴我爸的話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AII:142)

「她（媽媽）只要別人一句話都可以傷到她，可能別人覺得我很內向，她都會覺得很受傷，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對她來講，應該會更受傷。」(BII:088)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敢開口跟他們講那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只有我媽媽。只有我媽媽我們很清楚地講，爸爸我並沒有，因為他是男生。」(DI:116)

3. 難以癒合的傷口

數年後，受訪者能設身處地理解當年非施虐父母的為難與選擇。

「我覺得對她來說她也是蠻困難的，就是受害者跟加害者都是自己的小孩呵。」(AI:042)

「爸爸可能會覺得說手心手背都是肉，沒有辦法看著哥哥有前科。」(DII:059)
非施虐家人或許也能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度。起初哥哥無法理解天星的選擇，直到後來有所轉變；小葵與母親感情變好，轉為正向互動。

「他沒有辦法理解我為什麼要提告，把關係搞得這麼差…後來我們聊之後，他就沒有再說什麼。」(EI:186-189)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跟我媽的感情有比較好一點。就是沒有像以前那麼緊張。」(AI:181)

一家人默契地不再提起那些齟齬，可是有些裂痕存在過無法徹底消彌，如同鈴蘭所述：

「我現在過得不錯，爸爸媽媽對我真的很好，也很照顧我跟我現在的男朋友。我們現在的關係是越來越好，但是沒有到說可以完全修復這個裂痕。沒有人有勇氣，會吵架，感覺還是會。」(DI:109)

四、小結

揭露兒時性創傷是一段經反覆試探，重複感受希望與失望，並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梳理和向他人敘說中，慢慢完整故事的漸進過程。揭露或不揭露，都可以是性侵害受害者的選擇。

揭露兒時性創傷事件後，家人之間因角色和立場的不同而相互碰撞。衝突興許加深了家人間的隔閡，卻也不失為自我和解、重整事件的契機，而後以更加成熟而對等的態度相互理解，包容彼此。將受訪者的揭露歷程整理如圖 4-4-1。

圖 4-4-1

揭露的發展軸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第五章 研究討論與建議

針對此研究之重要發現，與國內外理論或實證研究對照探究，並說明研究限制與個人反思，提供理論面、實務面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以 Bronfenbrenner 和 Morris (2006) 的「近側歷程—個人特徵—環境脈絡—時間」(PPCT) 模式作為主要理論探究兒時性創傷經驗。近側歷程為受訪者與微觀系統中的人、客體和符號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尤說明與原生家庭之關聯性。個人特徵包括受訪者年齡、生心理性別、身心健康。環境脈絡包含微視、中介、外部和鉅視系統。微觀時間探討兒時性創傷的完整脈絡；中介時間討論生心理、人際關係和日常生活因性侵害事件遭遇的短期和長期衝擊；鉅視時間著重說明揭露的歷程，受訪者選擇揭露或不揭露是諸多阻力和推力，及是否具備合適對象和情境的抗衡結果。

成年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經歷是一動態的歷程，以下從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以及創傷與揭露後的影響等三面向，與過去文獻做深入分析論述。

一、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一) 家庭結構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幼時的原生家庭都存在家庭功能失調的因子，如：因單親、貧窮或不具備適宜的教養能力，雙親缺乏監護功能、家庭成員疏離，親子關係困頓，家人間互不關心也缺乏互動、父母關係緊張，易有言語或精神上的家暴行為出現。此發現與先前研究相符，家庭功能失調是增加兒童性侵害發生風險的情境脈絡之一 (Cabbigat & Kangas, 2018; Ramirez et al., 2011; Testa et al., 2011)。

大多數受訪者父母的身心狀態不佳、情緒管理不善，或者為養家活口而忽略

兒少。父母的未盡親職使受訪者們成為早熟的小大人，忽視自己，承擔父母的角色並滿足父母或家庭的需求，呈現照顧者反轉的現象。侯季吟、蔡麗芳（2013）發現女性擔任親職化兒童的比男性高，且排行老大者整體親職化情況高於中間子女、老么與獨生子女。但在此研究中，受訪者有四位排行最小，其他手足皆為男性、一位排行老二，手足男女皆有，似乎尚需考量性別、出生序及個體本身能力的交互作用。

（二）原生家庭的影響

謝秀芬（2016）和蔡春美（2021）認為原生家庭會影響個體的言行、價值觀，以及自我價值感建立。大多數受訪者回想生命歷程確有此發現，分別以三種不同的樣態顯現：（1）繼承價值觀與互動模式；（2）捨棄相似的特質和行為；（3）渴求未獲取的形物。說明個體對於原生家庭的餽贈是具備淘選能力的。

本研究的發現與 Inman-Amos 等人（1994）相似，原生家庭奠定往後親密關係的發展。例如：受訪女性避免選擇與父親有相同負面人格特質或行為的人作為交往對象、延續原生家庭的溝通模式至親密關係中、在與伴侶相處過程展現近似於父母夫妻間的互動特徵。

受訪女性多數呈現逃避型或焦慮型的依附關係，此發現與 Ungerc 和 De Luca（2014）的研究雷同：遭受身體虐待之兒童多呈現逃避型依附，少數為焦慮行依附。然而，在感受到伴侶心理與情緒之可近性、自我自主性提升時，似有轉變為安全依附的可能性。

（三）親子關係發展

本研究與過去文獻（如：Brown et al, 2007; Kim et al., 2015）有相同的發現：多數受訪者表示與母親關係較親密，與父親關係較疏遠。僅有一位與雙親關係皆疏離，究其原因為父母本身身心狀況不穩定、親子間權力不對等與教養責任議題所造成之差異。

或許是因性別相同，身為女兒的受訪者相較於家中男性手足能更明顯感知母

親於夫妻、婆媳或妯娌間的衝突，以及在家中的角色與困境。母女關係似展現一種特殊的共生狀態，受訪者透過母親定位自己的女性特質與在婚後家庭的角色。但是相對於 Fischer (1981) 所述：女性視母親為母職角色的典範，本研究發現一些受訪者認為母親是負面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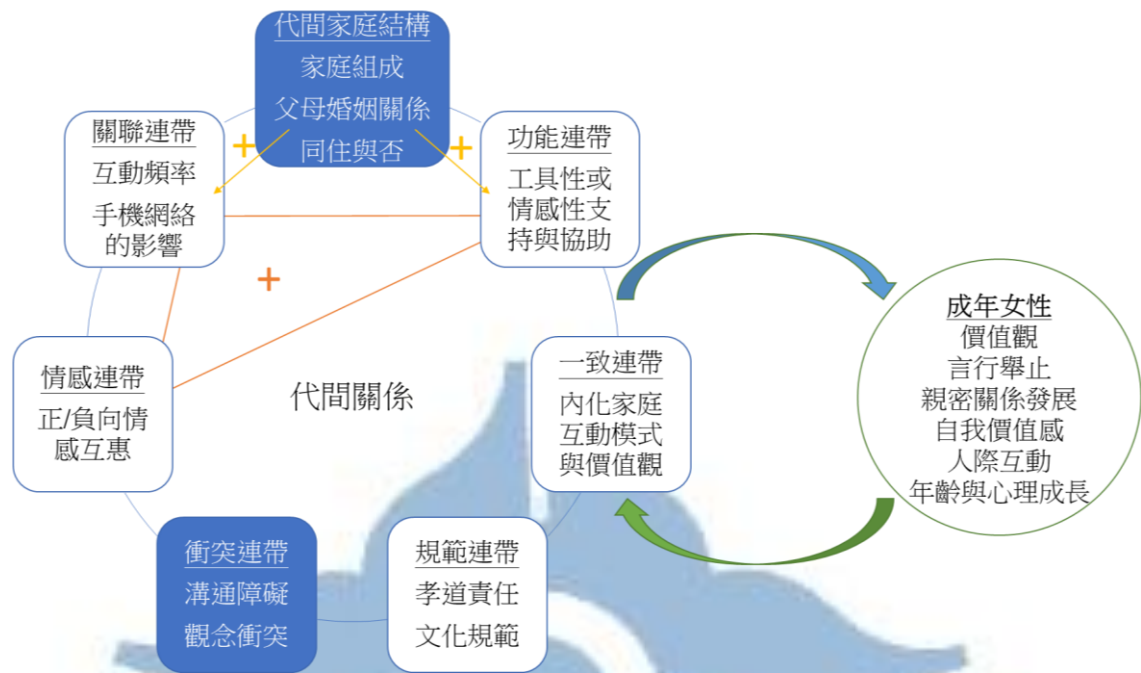
許多受訪者提到母親通常犧牲自我以奉獻家庭，不僅展現在照顧年老者和幼童，也有一肩扛起全家生計的一面，突破以往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印象。前述發現與 Levinson (1996) 的研究類似：大部分已婚女性會將較多心力放在婚姻家庭。

本研究發現與李彥臻 (2017)、王嵩音 (2019) 一致，受訪者和雙親間呈現不同的互動方式。父女間多以較為內斂的方式交流，或是提供工具性支持；母女間有較為親近的肢體接觸，能互相談心，只是還是有一些話題界線，像是不會深入談到自己與伴侶的交往狀況，或是涉及家庭內難以梳理的結之主題。

子女與父母的互動模式非是千篇一律，從受訪者的闡述中可以發現親子關係受到七個代間連帶的影響：(1) 代間家庭結構：受訪女性因求學或就業沒有與家人同住、見面時間較少，會降低親子間摩擦；(2) 關聯連帶：藉由手機跟網路受訪女性能即時與雙親交談，了解彼此近況，只是多數主要仍以家中較為親近者——母親為聯繫對象；(3) 功能連帶：一些受訪者會透過不同的管道和父母保持聯繫，維持工具性與情感性的支持交換；(4) 情感連帶：受訪者在成長後，能夠主動改變與父母的溝通及互動模式，轉為正向的情感互惠；(5) 一致連帶：與父母的互動方式和所接受的教養模式，會在親密關係互動中顯現；(6) 規範連帶：子女在邁入成年後會因內化的孝道責任或文化規範，期許自己成為家中經濟支柱，或擔任父母的傾聽者；(7) 衝突連帶：親密伴侶的支持與陪伴能成為受訪者面對代間衝突的力量。將受訪者與原生家庭的代間連帶關係整理如圖 5-1-1。

圖 5-1-1

成年女性與原生家庭關係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與原生家庭的相處深受華人文化脈絡之影響，但在受訪女性發展成熟之際，有能力改寫或捨棄封閉的互動模式。多數受訪者面對原生家庭的諸多無可奈何，漸漸學習著接受與包容，將其轉化為正向的成長力量，也願意在成年後繼承照護與支持功能；少數因家人的毫無悔改而決心斷絕關係或不再聯繫，但有時在父母年邁、身體抱恙時，會順從父母或其他親屬的請求前往探視。或許部分如瞿海源（2018）所述，孝道在當代華人的生活中仍有重要意義與作用。

二、知覺兒時性創傷經驗

（一）兒時性創傷事件脈絡

本研究發現與早先的研究（如：Lahtinen et al., 2018; Mcguire & London, 2019）相似，受訪者在年幼時缺乏辨別的能力，沒有意識或不理解性侵害行為，視其為父愛的展現或一種手足間的遊戲。一如 Bussey 和 Grimbeek（1995）的發現，本研究的受訪者皆表示是直到青少年發育階段或從學校學習到性知識課程，才恍然

大悟加害者行為的不當。

面對長期遭遇性侵害的狀況，受訪者展現多種因應策略。當理解性侵害事件是不對的行為時，多數受訪者的反應是不喜歡但不知道怎麼辦，更不曉得該如何或向誰求助。Everson（1997）的研究顯示有些受害兒童認為經歷的事件僅是幻想或作夢。然而，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其實能夠分辨性侵害事件的真實性，只是希望透過視為自己的胡思亂想或一場惡夢，否認受到的傷害並遺忘之。

一些受訪者在受害期間試圖反抗，但反抗的成效不彰，加害者更以誘騙、恐嚇威脅或這是我們的秘密之手段掌握話語權，導致受訪者最終好像只能麻木接受。此研究結果呼應 Cooky（2012）的發現，受害兒童與加害者間有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不少受訪者都經歷自我價值困惑及物化的階段，認為自己出賣身體換取金錢與關心，如同 Talmon 和 Ginzburg（2017）提到：性侵害受害者易因羞恥感將自我身體物化。本研究也有受訪者曾把性侵害關係當作一種愛，似乎只要催眠自己與加害者是互相喜歡，就不會再有受傷或破碎感。

（二）性創傷經驗的衝擊

本研究發現與許多研究（如：Chang et al., 2018; Diniz et al., 2019; Ensink et al., 2016; Fergusson et al., 2013; Kamiya et al., 2016; Mansbach-Kleinfeld et al., 2015; Palo & Gilbert, 2015; Sawyerr & Bagley, 2017）相符，兒時性創傷的影響長久且深遠。受訪女性在事件發生後長期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其表現為創傷再現、自傷或傷人傾向、焦慮、憂鬱，以及保持過度警覺的狀態，例如：睡眠障礙、易怒、易受驚嚇、注意力不集中。

本研究與 Ensink 等人（2020）有一致發現：性侵害會破壞人際間的信任感。幾乎所有受訪者在同輩朋友的人際界線上適應困難，但是其並非等同於無社交能力。本研究受訪者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過度疏離，其通常難以輕易信任他人，在不會讓自己受傷的舒適圈維持人際互動關係；一種是傾向討好，因為擔心

遭到排擠，習慣迎合，不太會拒絕他人的請求。

McGregor (2008)、McTavish 等人 (2019) 的研究顯示受害者難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但是本研究發現儘管創傷經驗導致大部分受訪者在交往前會有所顧慮，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對於發展親密關係的渴望及期待。受訪女性以可以包容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境遇，並排除與加害者有相似形象或特質的人作為選擇伴侶的條件。多數受訪者在親密關係互動中缺乏安全感，雖然少數曾經歷不安全或混亂的依附關係，然大多數都盼望建立並維持安全的親密依附關係，前項發現與 Ensink 等人 (2020) 的研究略有差異。

如同 Draucker 和 Mazurczyk (2013)、Homma 等人 (2012) 的研究，本研究顯示一些受訪者在青少年階段出現高風險性行為和懷孕的情況。探索其原因有二：希望透過發生性行為洗刷過往的性創傷經驗，或是藉由性行為維持他還愛我的安全感。意外懷孕對於受訪者具有重大的意義，有的受訪者在該時期感受到來自非施虐父母的支持，成為親子關係轉變的契機之一；有的受訪者形容其為救贖，幫助自己找到與加害者的界線感，亦是面對性創傷事件的勇氣泉源。

在任何時刻，一個不經意的詞彙或場景都是打開上鎖記憶的鑰匙。對加害者的矛盾，對非施虐家庭成員的失望與不諒解，創傷造成生心理、人際交往的阻礙，各種錯綜複雜的情緒與衝突纏繞成一團難解的結，在所有事件相關人身上烙下枷鎖。

(三) 對加害者的看法

受訪者對於加害者的看法與感受非為一成不變。從厭惡恐懼，保持距離以免再度受害，到現階段的不理不睬、保持戒備、刻意疏遠或切割關係。加害者是血緣至親，受訪者對其抱持複雜又矛盾的情感，有時會在家人的勸慰下忍讓一二，更多是現在的自己有足夠的能量，依自身的意願選擇以何種方式與傷害自己至深之人相處。

不獨處、不主動聯繫、不近距離肢體碰觸，是目前受訪者面對加害者的三不。

受訪者會劃定一個警戒圈，只要加害者一有超過身體、心理上界線的舉止就會展現防衛行為。

Herman (2005) 的研究顯示，受害者並不關心加害者是否受到報復或懲罰。但在本研究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希望藉由來自司法判決、大眾或社會輿論的懲罰或批判，使加害者能認知自身行為的錯誤，並體會受害者長期所承受的身心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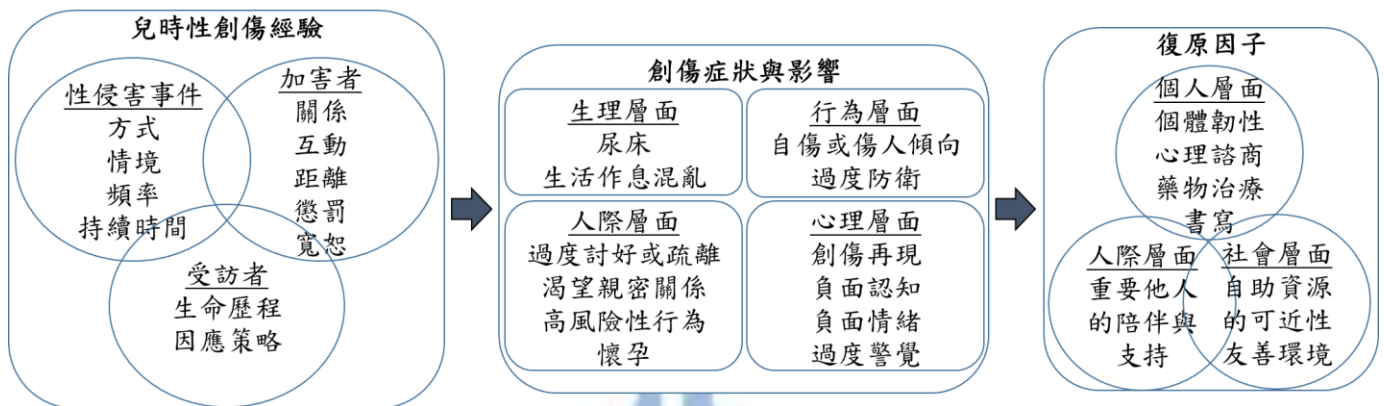
在寬恕與原諒的議題上，本研究發現處於現階段的受訪者呈現三種不同觀點。一些受訪女性認為原諒遙不可及，但是加害人發自內心的理解和道歉也許能帶來一絲希望，如陳慧女、盧鴻文 (2013) 的研究指出加害者要在真心悔改的情況下道歉。本研究部分受訪者不關注原諒與否，著重在自我寬恕與和解，減輕傷害的影響並過好現在的生活，本發現與 Herman (2005)、陳慧女 (2020) 的研究結果相近。另外的受訪者則認為自己永遠不會原諒，並希望能與加害者切割。

(四) 創傷後成長

遭遇長時間的性侵害留下的傷疤難以輕易撫平。在成長歷程中，受訪女性嘗試不同的方法探索兒時性創傷經驗，如 Baker 和 Schneiderman (2015) 的發現：遭受兒時不當對待者常有找尋歸因的行為。探尋的過程並非一蹴可幾，受訪者歷經認知、辨別與建構，重新詮釋並賦予兒時性創傷事件新的意義，學習與創傷影響共存的同時轉化其為動力，為個人發展帶來正向成長與改變，此發現對應 Rogers 所指：個體福祉與他們在何種脈絡下詮釋事件有所關聯(張紉等譯, 2019)。將成年女性知覺兒時性創傷事件的完整脈絡與衝擊整理如圖 5-1-2。

圖 5-1-2

兒時性創傷經驗與創傷影響概念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三、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與影響

(一) 揭露的歷程

1. 推力與阻力

受訪者在推力與阻力的此消彼漲中做出揭露或不揭露的決定。本研究發現同於先前的研究（如：Fontes & Plummer, 2010; Jensen et al., 2005; Kennedy, 2011; Morrison et al., 2018），影響受訪者揭露推力有：（1）個人因素：意識到身體界線、希望改善自己的身心狀態、諮商後激發權能；（2）人際因素：加害者屢教不改、信任對方、親朋好友的支持與鼓勵、預期能得到正向回應；（3）社會因素：女權意識的提升、#MeToo 運動帶來的力量。不同於 Hunter (2010) 的研究，本研究顯示知悉有法律的保護對於受訪者揭露的意願無顯著相關。

受訪者面臨的揭露阻力同樣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在個人因素方面與早先文獻（如：Alaggia et al., 2019; Collin-Ve'zina et al., 2015; Hamilton et al., 2016; McElvaney & Culhane, 2015）相同，包括：年幼而缺乏辨識能力、感到羞恥、害怕遭帶離家庭、擔心揭露後受到家人及他人的指責。人際困境與一些研究（如：Collin-Ve'zina et al., 2015; Fontes & Plummer, 2010; Malloy et al., 2011; McElvaney et al., 2014）相似，包含：擔心傷害他人、害怕家庭破裂、忌憚事件散播、受到加

害者的嚇阻。所遭遇的社會阻礙與先前研究（如：Alaggia, 2010; Fontes & Plummer, 2010; Han & Kim, 2016）相符，例如：時代封閉、社會化標籤、性別汙名化、周遭的親友師長對於性侵害事件欠缺敏銳度。

本研究發現阻止受訪者揭露的因素與 Collin-Vézina 等人（2015）的「阻礙揭露兒時性侵害三層級」大致相同，惟有二處差異：一為大部分受訪者是在揭露後得到他人的負向回應時才會萌生內化責備受害者的想法；二為受訪者較少提及大眾媒體帶來的阻力。

2. 對象

關於初次揭露的對象和時間點受訪者們有不同的選擇：一位在國小階段向非施虐母親訴說、一位在國三時因非施虐母親目擊而吐露、兩位在高中時分別向表哥、男友透露、一位在大學時期與網友互相揭露。前揭研究結果與之前的研究一致：非施虐父母普遍是年幼兒童揭露的人選（London et al., 2007; Lippert et al., 2009）；青少年大部分向同齡人傾訴（Lahtinen et al., 2018）。

3. 目的

本研究發現與 Alaggia（2004）的論點相異，年幼時的揭露不一定是不經意的。兒童大部分的揭露行為隱含目的性，例如：希望有人可以察覺、相信自己正遭遇性侵害事件、協助停止受害，此發現同於過往的文獻（如：Hunter, 2011; Pratt & Tolliday, 2018; Stiller & Hellmann, 2017）。不同於 Roesler 和 Wind（1994）的研究，本研究發現避免其他兒童成為受害者並非是兒童時期揭露的目的之一，但是其為成年後受訪者們的共同期望。

與一些研究（如：Morrison et al., 2018; Schaeffer et al., 2011; Collings et al., 2005）相異，本研究顯示因兒童的異常反應，或是由大人意外發現致使事件浮上檯面的案例非常少，可能是因為受訪者的家人或周遭師長對於性侵害與創傷認知的缺乏。

與 Hunter（2011）、Tener 和 Murphy（2015）的發現大致相同，本研究之受

訪者通常能在成年後的揭露行為中得到比起兒童時期更正向的回應與幫助。成年時期的揭露通常經三思而行，受訪者握有敘說事件的主動權，揭露的主要目的是為減輕長期負向影響、釋放壓抑情緒、爭取重要他人支持，以及踏上自我復原之路，該發現符合過去的研究（如：洪素珍、王玥好，2004；Draucker & Marsolf, 2008; van Toledo & Seymour, 2013）。一些受訪者提到揭露對於自我復原的正向效果，正如 Easton (2019a) 所言：揭露是邁向復原的第一步。

4. 方式

根據 British Columbia (n.d.) 的定義，兒童揭露性侵害有二種類型：直接揭露與間接揭露。本研究發現其同樣適用於成年時期的揭露。受訪者極少直接揭發事件；大部分是以間接的方式揭露，例如：暗示、回應他人詢問，或其他非口述的方式（如：寫下自己的受害經歷、借助傳訊軟體）為之。

5. 持續時間/時間點

受訪者們在生命歷程中不只一次向他人揭露。其顯示出揭露可能發生在任何時刻 (London et al., 2005)，是一次又一次講述故事般的過程 (Alaggia, 2004; Draucker & Marsolf, 2008)。有些受訪者在性侵害發生的時期求助；有些在事件終止時鼓起勇氣面對；有些在事件結束多年後才慢慢開始表露。通常僅是部分揭露，直到身心成熟並有足夠對抗創傷影響的能力時，受訪者才會考慮揭露兒時性創傷事件的完整脈絡。

6. 廣度

與 Easton (2014)、Gagnier 和 Collin-Vézina (2016) 的研究相符，本研究發現首次揭露兒時性侵害所得到的回應，與未來再次揭露的意願有所關聯。未能在性侵害事件發生後立即獲得援助，或是揭露後得到負面回應，會導致受訪者在短期或長期內不再揭露。Hunter (2011) 認為童年得到的負向回應會刺激受害者在成年時期再次揭露。或許是因受限於訪談人數，該論點在本研究中並無發現。

7. 不揭露及其影響

同於先前的研究（如：Alaggia et al., 2019; London et al., 2005; London et al., 2008）發現：兒童延遲揭露或選擇不揭露性侵害事件是常見的。本研究之受訪者皆未於事件發生時向他人吐露。

Tener 和 Marphy（2015）的研究發現：受害者可能是暫時的不揭露，直到遇見對的人才進行開口；也可能終其一生閉口不談。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所謂對的人應係受訪者所信任之人，而三緘其口的對象通常是非施虐父母或手足，究其原因多是為了維持家庭和諧，彰顯華人社會重視家庭的觀念。

一些受訪者提到，不揭露雖然能保護好家庭，讓家人們不受到替代性傷害，但是卻為自己帶來長遠的負面衝擊。如同 Brazelton（2015）的發現，本研究之受訪者可能需獨自背負性侵害的烙印，承受他人的誤解，忍受身心的痛苦直至成年時期甚至一生。

（二）揭露的影響

揭露兒時性創傷事件後，知覺對方的正向或負向回應會對於受訪者與各系統產生長期的交互改變，影響個體與環境的適配程度。

1. 近側歷程

有別於 Han 和 Kim（2016）、Hill（2003）的研究，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未必願意向未受性侵害之手足揭露性侵害事件。有的手足得知事件後並無困惑、焦慮、經歷背叛感的表現，反而與施虐父親保持更甚以往的親密互動。造成此差異的原因也許是在受訪者失功能的原生家庭中，手足間關係本就疏離且互不關心，故以個人責任去看待事件。

在得到正向回應或協助時，受訪者個人情緒管理和身心狀況的掌控能力獲得提升，也能以較正向的態度面對人際交往。本研究的發現或許可補充先前研究僅提到時間流逝與個體成長對於減輕兒時性侵害負向影響（如：Easton et al., 2019; Rapsey et al., 2018）。

與陳慧女、盧鴻文（2013）的研究有類似的發現，本研究之受訪者在好友的傾聽和鼓勵、親密伴侶的支持、家人的陪伴、心理諮商，以及生命中遇見的許多善意中自我療癒。

本研究發現有些受訪者認為「不作為」是一種正向的支持力量，例如：陪同報案的過程中不會主動詢問，而是等到受訪者自己想要訴說、接納受訪者的負面情緒，不否定也不鼓勵，僅是默默陪伴。

大多數受訪者提到最重要的力量是自己的努力。儘管知道復原過程會有許多艱難，偶爾還是會有卡住的感覺，可是慢慢地一步、兩步，感受到自己在變好，就是最令人感謝而振奮的事情。

2. 中介系統—個體

與Walsh等人（2018）的論點相近，本研究發現學校教導性侵害相關課程時確實增加受訪者對身體與性侵害的認識，但是其並未能有效地避免潛在的危險，或許應考慮調整我國施行性侵害認知教育課程的對象與時間點。此外，少數受訪者提到與家人共同參與教會是提供支持的力量之一。

3. 外部系統—個體

有關正式與非正式機構的未盡事宜，一些受訪者提到學校諮商中心通常是處理近期內的身心困擾，對於兒時的創傷經驗較無幫助，以及諮商療程效果有保存期限，但她們都認同諮商有助於身心調解。許多受訪者分享通報過程和司法流程中的不愉快經驗，如警察漠視報案、忽略受害者意願、測謊過程有偏頗的問題、不斷重複陳述的創傷，以及受限於法律追溯期而喪失的罪刑，導致受訪者身心狀況受到影響。

4. 鉅視系統—微視系統—個體

本研究發現與先前研究（如：Alaggia & Kirshenbaum, 2005; Xiao & Smith-Prince, 2015; Taylor & Norma, 2013）雷同，華人社會的家庭講究和諧，要顧及他人評價，更要保持顏面，通常他們會逃避、忽略或漠視受訪者的求助舉動，息事

寧人，或展現不支持的行為（如：負向情緒、言語攻擊或否認）。

5. 鉅視系統—中介系統—微視系統—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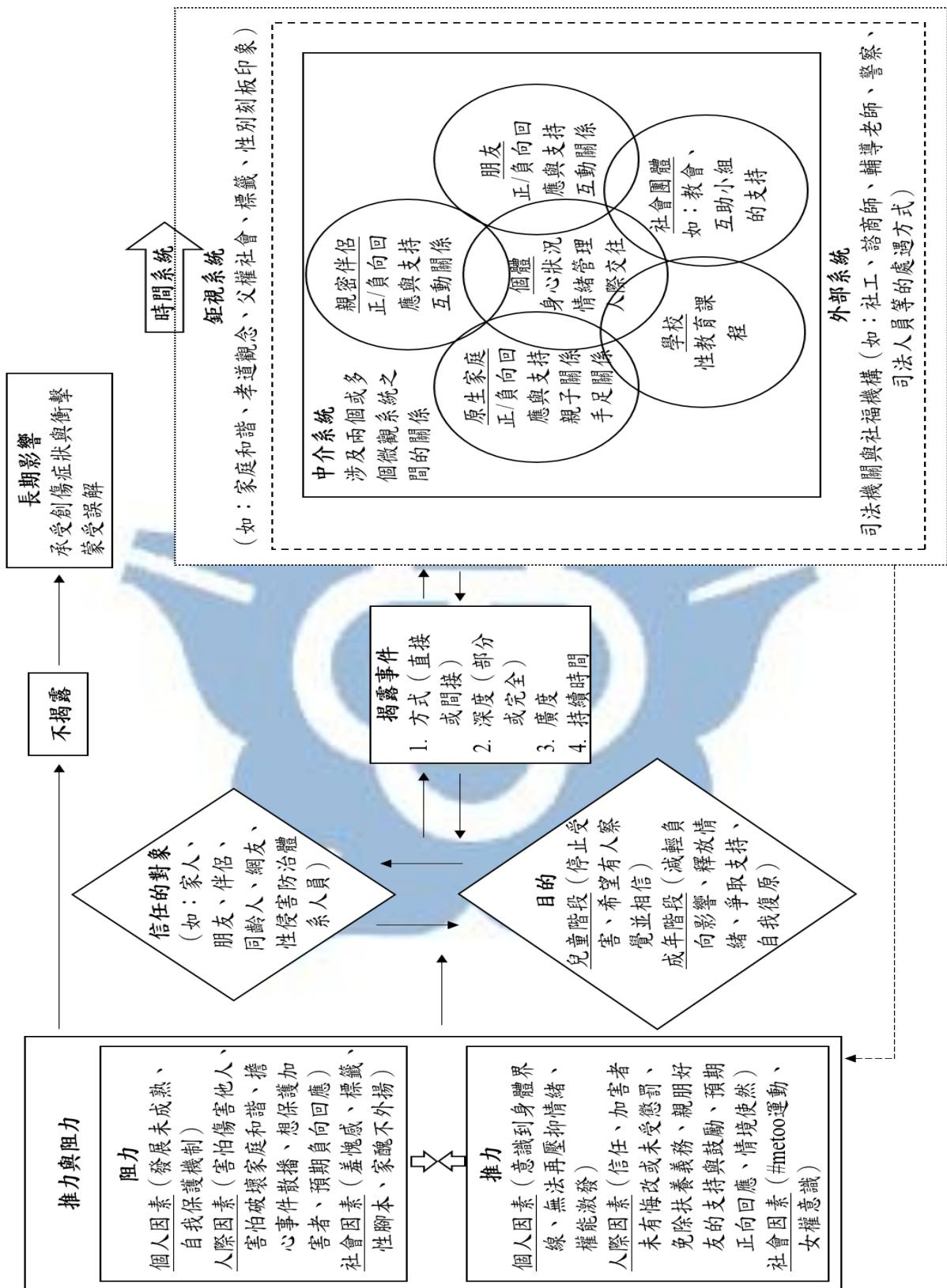
與 Jeremiah 等人（2017）的研究相似，本研究顯示常見的負面回應為責備受害者，其乃是儒家孝道思想、父權制與男女刻板印象下的產物，不僅對受害者帶來二次甚至多次傷害，受訪者的原生家庭、婚後家庭，或伴侶的原生家庭皆因而受到衝擊，破壞原先良好鍵結。

綜合上述的發現與討論，將揭露兒時性創傷經驗之歷程，以及揭露後各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整理如圖 5-1-3。



圖 5-1-3

揭露兒時性創傷之歷程與影響



註：研究皆自行繪製。

四、揭露後與原生家庭關係

(一) 家庭的兩難

有些受訪者偶會覺得困惑，明明是發生在家裡的事件，為什麼完全沒有人察覺；大部分受訪者感受到家中對於事件的禁言，好像只要有談論的苗頭，話題就會遭到轉移。

受訪者們能夠理解家庭成員的為難與困境，卻也因他們的負向反應深感痛苦，有時會埋怨非施虐父母的選擇，有時不禁深陷是不是什麼都不說才是最好的情緒中無法自拔，此發現與之前文獻（如：尚曉媛等，2019；Bolen & Lamb, 2007；Courtois & Ford, 2013）一致：非施虐父母的負向回應會嚴重衝擊親子關係，受害者遭遇二度創傷，增加無助和孤立感，進而沉默。

與一些文獻相同（如：Figley, 1998；Goff & Schwerdtfeger, 2004），本研究發現缺乏凝聚力的家庭或家人的消極處理，常使受害者感到挫敗，有引發後續危機甚至阻礙復原的風險。例如：有的非施虐母親本身擁有性創傷經驗卻無法同理受訪者的感受，反倒希望受訪者學習自己採取「過去就將它忘記」的因應方法。

原本互動關係良好的家庭亦不一定能在揭露事件的最開始就展現受訪者所需要的回應，尤其當加害者為自己的伴侶或孩子。有的非施虐父母否認並指責其說謊，並出現輕女重男的情況，如為保護加害者唆使受訪者做假口供；極少數非施虐家庭在揭發後即與受訪者站在同一陣線。

(二) 非線性的立場與態度

本研究與 McCarthy 等人（2018）有同樣的發現：受訪者知覺大部分非施虐父母的態度有轉變的可能性。有的非施虐母親在揭露初期給予正向回應，但在揭露另一性侵害事件時卻不願相信受訪者，後來在加害者執迷不悟的情況下，受訪者察覺到母親態度有所軟化；有的非施虐母親理性而公平的處理事件，卻忽略受訪者壓抑的情緒，而在一次母女爭執間互相理解，使親子間關係變得更加親近；有的非施虐父親表達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想法，以他當時認為最合適卻讓受訪者深感偏心的方法處理事件，直到近期受訪者感受到父親似有不同的立場與理解。

手足面對性創傷事件的立場亦會有所變化。一位受訪者幼時曾受到哥哥家暴，但哥哥在知悉事件後反而成為她堅強的後盾；一位受訪者哥哥在其報案時展現懷疑與不支持的態度，而後於雙方訴說想法間轉為正向的支持力量。

根據上述論述，本研究有二項發現：(1) 非施虐家庭成員的因應態度具有彈性；(2) 影響非施虐家人因應策略轉換之因素，包含：加害者不知悔改、家庭間開放的溝通模式、非施虐家人本身的風險因應能力和對於性侵害事件的認知、受訪者與非施虐家人雙方身心狀態的成熟與穩定、時間的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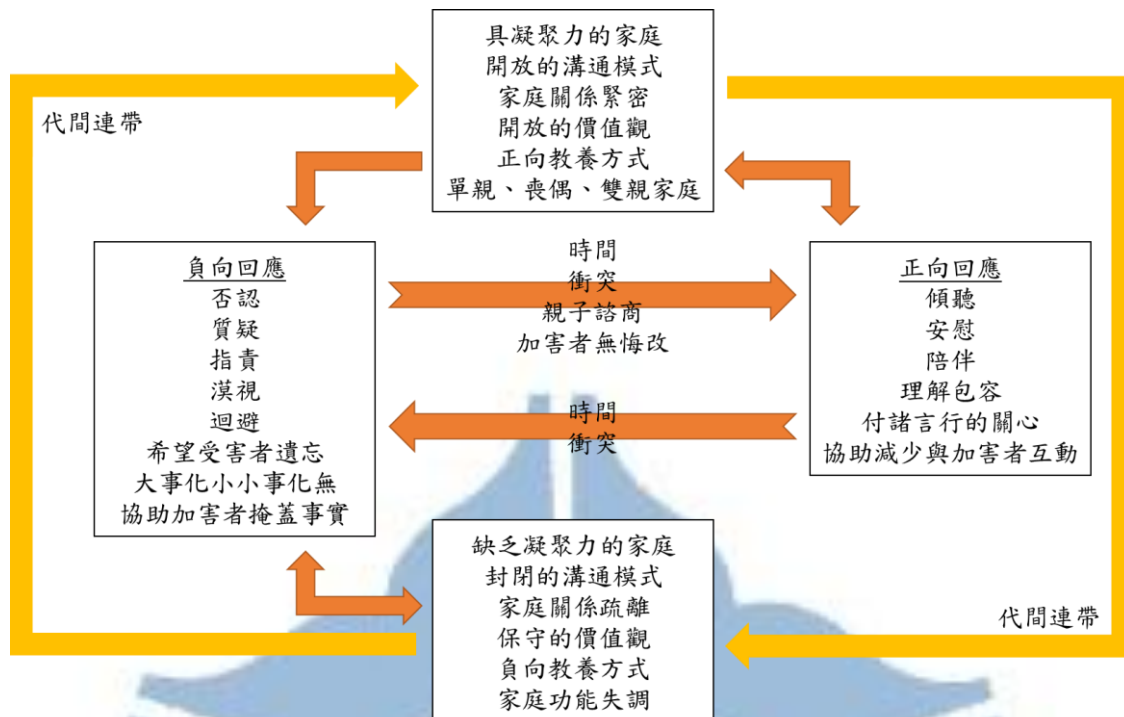
(三) 小結

家內性侵害的矛盾與複雜在於家庭對於性侵害事件意見的分歧對立，儘管後來家庭內默契地少提起那一道傷痕，但它仍時不時在每一個人的內心隱隱作痛。留下的疤痕永遠不會消失，它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每個人、彼此的關係則在負重前行間緩慢地縫補。

向他人揭露事件隱含二次創傷的風險，卻也是打破困境的機會，如涅槃重生。關係疏離的家庭在事件揭發後的負向回應，讓受訪女性堅定斷絕往來的決心，將重心放在努力經營現在的生活；擁有良好鍵結的家庭不一定能在一開始成為正向力量，但隨著彼此互相理解、和解，時間給予的沉澱與爬梳，非施虐親人的支持和陪伴會化作面對日後坎坷的堅韌鎧甲。詳見圖 5-1-4。

圖 5-1-4

揭露後原生家庭關係之變化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根據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對理論、實務、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並說明研究過程中的個人反思。

一、建議

(一) 理論建構層面

此研究以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層次系統和 PPCT 模式為理論基礎，瞭解成年女性遭遇兒時性創傷的影響，以及原生家庭關係與揭露事件的關聯性。在受訪女性揭露兒時性創傷經驗後，知覺揭露對象的正向或負向回應受到五個層次的交互影響。哪一層次為主要或重要的影響力，無法以當前的理論說明。

有些受訪女性在個人發展成熟時，會選擇與原生家庭斷絕關係或往來，降低其對自身的負面影響。說明個體的一生雖與各層次系統相依互動，但是個體對於

環境具備擇優汰劣的能力，顯示在微視系統中與受訪者有直接互動的人、事、物可能存在變動性。

生態層次強調成長來自個體與環境的適配情況，但在面對兒時性創傷事件此一壓力時，周遭系統的正向支持雖為改善個體身心狀態的力量，然幾乎所有受訪者皆認為最重要的力量是「自己願意改變」，似乎在理論建構上尚需考量個體的韌性。

(二) 實務工作層面

根據受訪者的分享和負面經驗，對於性侵害防治系統（如：教育、警政、司法、社工、心理師）、家長、受害者及其親友提供建議。所有協助處理性侵害事件之相關人員皆應具備基礎專業知識或持續在職訓練。以協助受害者為中心，保持同理和客觀的態度，共同建立一個對於受害者更加友善而安全的環境。

1. 教育體系

受訪者回憶大多是在國小五、六年級接受學校性教育課程時才知悉性侵害的危害性，如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定：於國小高年級學習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但是受訪者的受害時間遠早於該教學時間，建議應提早進行相關認知教育，例如：於幼兒園即應實施性教育、性別教育、自我保護與身體自主權課程；針對低年級兒童和家長開設普及性的性議題課程或講座，提升雙方對於兒童的保護意識。

學校應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定，針對教職員工舉辦性別平等教育、性侵害防治的在職教育講座，鼓勵教職員工進修性別平等及性侵害防治課程，提升性別暴力防治及兒童少年保護的通報知能，增進校園防護網以減少學生的受害風險。對於學生則應落實每學年至少四小時的性別暴力防治課程，增進學生對性別暴力防治的意識與求助管道。

2. 警政與司法體系

警政及檢察體系偵查人員應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精神，尊重兒童的表意權，

當兒童主動揭露或通報，應了解其揭露的原因脈絡，不因受害者的年齡與性別忽略、漠視或有差別待遇。並應具備對性侵害被害者的司法訊問程序的技巧，避免不適宜的引導及誘導的詢問。司法程序應落實減述規定，避免受害者承受多次陳述的創傷。

3. 助人工作者

協助報案的社工人員及輔導人員，除了遵照制式化流程，應更重視受害者本身的意願。當受害者不願意報案時，應多予溝通、瞭解原由，並給予情緒支持緩解當事人的不安與焦慮。

不少受訪女性經由轉介或主動尋求心理諮商資源的協助，多數藉此改善身心狀態，但仍有受訪者認為諮商的效果有其限制。心理師或社工人員應適時追蹤個案輔導的狀況，傾聽其反饋，協助個案找到較為適合之療程。在處理性創傷議題時，併同考量受訪者與原生家庭關係，以及華人傳統價值觀之影響性。

4. 家長

受到父權框架和傳統文化規則的潛移默化，大部分華人社會家長甚少主動教導或與兒童討論性議題。家庭對於性侵害的認知不足、性侵害迷思的影響，以及主要照顧者與加害者關係的制約，皆增加兒童遭遇性侵害而無法求助的危險性。

或許家長可以透過學校、各縣市衛生局、社福機構及網絡媒體的宣傳與活動，主動了解並學習正確的性侵害與兒少保護相關知識。當家長注意到兒童的異常反應時，能夠加以詢問，降低年幼兒童的受害嚴重程度，也有助於事件揭露。

5. 受害者的親友

性侵害受害者會選擇向其給予一定信任之對象揭露，而該對象的回應亦會對受害者的身心狀態帶來影響。當遇到受害者揭露時，應儘量不帶批判地傾聽對方的創傷故事，相信、理解、陪伴，尊重受害者的自主性，並接納不同受害者的復原速度會有所差異。此外，陪伴者也需要陪伴者，可以運用一些方法（如：向他人傾訴、給自己調適的空間與時間）舒緩自身的壓力。當感受到替代性創傷時，

亦須為自己尋求資源與幫助。

6. 致 所有受傷的人

事件發生後，或許妳/你會感到混亂，各種負面、複雜的情緒像一波波浪潮席捲而來。想要做些什麼，卻好像什麼都做不到，懷疑著，迷惘著，受著傷，卡在原地，哪裡都去不了。

沒關係的，每個人有各自的步調和節奏，給自己一些時間。

沒事的，妳/你可以自己做選擇：回首、停留或向前。敘說或不敘說，放下或不放下，原諒或不原諒，和解或不和解，都可以。

請記得好好照顧自己。只要好好的就夠了。

(三) 未來研究方向

研究僅有一位已婚受訪者，當受害女性進入婚姻或養育子女時，其與原生家庭或加害者間的情感與互動改變，以及性創傷經驗衝擊婚後家庭或伴侶的原生家庭關係之議題，可做為研究方向。

此為橫斷性研究，所有受訪女性皆處於成年早期階段，兒時性創傷經驗在女性不同人生發展階段與原生家庭關係難以全面性探索，或許可從事縱貫性研究，或邀請非施虐家庭成員與受害者配對受訪，進一步討論差異與變化。

二、限制

研究僅邀請五位成年女性，訪談資料豐富性受到侷限。考量個體差異，研究結果無法完全類推至每一位擁有相似經歷的受害者，但具備一定之參考價值。個案的找尋透過非正式機構的中介，其限制有二：一為未報案或尋求社福機構協助之符合資格並有意願受訪的成年女性無參與管道；二為探問的議題較為私密，易降低遭受兒時性創傷之潛在受訪者的訪談意願。

訪談乃回溯兒時性創傷經驗，仰賴受訪者的記憶與口語表達能力，且無法排除受訪者對於兒時性創傷經驗與當時未揭露的原因可能已經過重新理解與解釋。研究者透過進行至少二次的深度訪談，釐清事件脈絡與時間線，降低受訪者遺漏

或選擇性知覺的機率。

本研究收案之性侵害事件兩造關係皆屬家內性侵，在面對家內性侵與家外性侵時，非施虐家庭成員的立場、觀點，以及原生家庭關係困境有哪些異同，有待後續探究。

三、反思

一次在與一位警察朋友的閒聊中得知一個故事：女孩獨自走進派出所說要報案，報案內容是遭到哥哥性侵害。警方考量女孩尚未成年，通知其父母介入處理。沒多久，父母到所內，把女孩帶了回家。

因為加害人是女孩的哥哥，也是父母唯一的兒子，這種事情怎麼能跟別人說，還跑來報案呢？這件未成功受理的案件隨著女孩的離去消融於街頭巷弄的日常。

「這種事情多少會有吧？」我在心中這樣想著，小說裡、劇裡、新聞裡。只是此刻我身邊正坐著一位真真切切接觸到事件的人呢，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第一次距離性侵害議題這麼近。對於這段時間正在思索論文要寫什麼的菸酒生霎時靈光乍現，探討性侵害與原生家庭關係是不是能成為論文的題目？莽撞又懵懂地一頭撞入性侵害議題的資料海中，全然遺忘其實自己曾經設定是要研究毒品相關主題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文獻搜索，以及與導師來回的討論——採用量化問卷或質性訪談的方法？性侵害經驗是要在兒童時期或成年階段？因為要探討原生家庭，所以要以非施虐父母還是受害者為研究參與者？是否對於受訪者的性別和年齡區分或限制？最終將題目聚焦在探究有兒時性創傷經驗的成年早期女性，以及討論其原生家庭的關係。

在真正確立題目時立下了心理準備：因為議題的私密性，個案的找尋絕對無法如預想般順利，請記得不要著急，稍安勿躁，多花一點時間總會走完的。應該吧（對於那些能夠於未知的未來勇敢前行、少有驚疑的人，我總是無比佩服）。

遙想當時的我，定無如蘇軾吟嘯且徐行的意態瀟灑。那些於風雨如晦的憂懼

有三：

其一，關於受訪者的找尋。一言以蔽之，把能想到的方法一一嘗試：透過向北中南的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發函徵求、向各基金會與協會詢問或申請協同研究、透過網絡性侵害相關社群發布研究邀請表單，甚至考量了使用 Hashtags 尋找曾於貼文中陳述自身經驗之對象的受訪可能性。

當然，多次碰壁。一些受限於當案件完結後並未對個案做後續追蹤；一些答覆主要協助的對象非為過往的性侵害經驗，而是近期或即時性的；一些受限於本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條件限制，不僅需滿足已成年之條件，還需符合性侵害經驗是發生於 12 歲以前，更遑論該對象之受訪意願。所幸，最後藉由基金會與從業心理師的中介找到五位受訪對象，大恩不言謝。

其二，進入場域後的現實感。當真實案例現身說法時，撲面而來的沈重、複雜感受以言語或文字描寫都顯得空白。兩次訪談，至多三小時的時間，要去完全瞭解每一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絕對是不夠充分的。這五個生命的重量，三言兩語間實難敘明。

其三，在訪談與回顧過程中。在傾聽時，保持中立客觀是重要的，然而我卻感受到理性與感性間的搖擺不定。理性太多時，受訪者或許會有「我只是一份研究數據，你不關心我」的感受；感性太多的時候，如當我共情受訪者的悲傷或憤慨，會導致探索思路及訪談的中斷。如何在二者間維持並調整至適合個別受訪者的舒適狀態，每一次都需審慎把度。

與受訪者的言語交談間，其實會發現自己難以避免有預設立場存在。例如：每一位受訪者有各自因應兒時性創傷事件的方法。我本身對於復原的看法是「面對並能夠處理事件」，但是當有受訪者以「不處理、慢慢淡忘」的方式因應時，我會察覺到彼此間主觀意識的落差並略感困惑，需時時提醒自己謹慎留意偏見，懸置個人非客觀想法，以保持探索、尊重受訪者意見而不擅加置喙的穩定狀態。

重新詮釋兒時性創傷經驗，調適和加害者距離，調整與原生家庭關係，重視

自己內外在感受，是現階段受訪女性展現的共同特質。多數受訪者表示，復原之路最終還是只能靠自己走完。我想，或許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將這五則人生故事真實而完整地書寫呈現，讓更多的聲音得到妥善對待與傳遞，少一點責備，多一些陪伴，為所有有同樣遭遇的人在復原之路上點亮些許的微光。

論文即將完成之際，腦海中其實沒有太多想法，情緒上也頗為平和，並沒有我以為的「哦耶，我終於寫完了啊啊啊」的興奮感。唯一有的念頭是仍不斷、不斷地思考著「我有好好承接這五份生命故事並敘說嗎？」或許，這只能待後人評議。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Ashfor, J. B., Lecroy, C. W., & Lortie, K. L. (2018).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張宏哲、林哲立、吳家慧、徐國強、陳心詠、鄭淑方譯；四版)。雙葉。(原著出版年：2016)。
- Bauer, M.W. & Gaskell, G. (2013). *質性資料分析：文本、影像與聲音* (羅世宏、蔡欣怡、薛丹琦譯；初版)。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 Courtois, C. A. (2002). *治療亂倫之痛：成年倖存者的治療* (蔡秀玲、王淑娟譯；初版)。五南。(原著出版年：1988)。
- Herman, J. (2018). *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初版) 左岸文化。(原著出版年：1992)。
- Healy, K. (2018). *社會工作理論脈絡：創立實務的架構* (黃松林、劉鶴群、陳武宗、林東龍、陳雅玲、王明鳳、李新民、張麗玉、林怡欣、陳秀靜譯；初版)。心理。(原著出版年：2014)。
- Rogers, A. T. (201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發展與生命歷程的觀點* (張紉、劉嘉雯、李靜玲譯；初版)。心理。(原著出版年：2016)。
- Papalia, D. E., Olds, S. W., & Feldman, R. D. (2014). *人類發展：成人心理學* (張慧芝譯；十一版)。科技圖書。(原著出版年：2008)。
- 內政部 (2000)。社會工作辭典。內政部。
- 王雪岩 (2022)。父母並非不愛你，卻又讓你傷痕累累的「隱性虐待」：如何療癒童年傷痕，走出原生家庭所給的痛苦情緒。方言文化。
- 王嵩音 (2019)。雖遠似近—親子關係維繫與溝通管道之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47，55-85。
- 王麗雲 (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上的應用。麗文。
- <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39052>

- 伊慶春(2014)。臺灣地區家庭代間關係的持續與改變—資源與規範的交互作用。
社會學研究，171，189-215。
- 伊慶春、章英華(2008)。父系家庭的持續與變遷—台灣的家庭社會學研究，1960-2000。載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發展史—1945-2005*(頁23-73)。
群學。
-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2019)。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
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Field.aspx
- 李青松、林歐貴英、陳若琳、潘榮吉(2010)。老人與家庭。空大。
- 李佩珊。(2019)。Bronfenbrenner生態系統理論的近期發展與應用。*輔導季刊*，
55(3)，14-24。<http://doi.org/10.29742/GQ>
- 李彥臻(2017)。淺談父職角色與類型。*家庭教育雙月刊*，68，29-34。
- 李淑杏、莊美華、莊小玲、莊安慧、梁香、黃良圭、趙國玉、梁淑華、金幼婷、
陳可欣、王淑真、戴仲宜、黃惠滿、許燕玲、林雪貴、黃琴雅(2021)。人類
發展學(八版)。新文京。
- 李維倫(2017)。受傷的時間性：受性侵害及家庭關係斷損少女之生活經驗的存在現象學分析。*中華心理學刊*，59(3)，145-161。
<http://doi.org/10.6129/CJP.20170518>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五版)。洪葉文化。
- 阮新邦(2008)。實證主義本土取向研究立場之剖析—兼評楊國樞及楊中芳的本土化研究觀。載於楊中芳主編，*本土心理研究取徑論叢*(頁187-232)。遠流。
- 利翠珊(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臺北地區年輕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260-321。<http://doi.org/10.6254/1995.4.260>
- 利翠珊(1999)。已婚女性與上一代的互動關係與情感連結。*中華家政學刊*，28，

31-46。

利翠珊 (2000)。親子情感、家庭角色與個體界域：已婚女性代間情感糾結的經驗。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3(4)，77-107。

利翠珊 (2007)。華人已婚女性代間矛盾情感之特色與測量。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357-386。 [http://doi.org/10.30074/FJMH.200712_20\(4\).0003](http://doi.org/10.30074/FJMH.200712_20(4).0003)

吳嘉瑜 (2003)。代間關係研究的新思維：代間矛盾研究趨勢的興起與相關文獻。 *輔導季刊*，39(4)，1-9。

吳嘉瑜 (2004)。子代夫妻對偶代間關係經驗：「他」的矛盾？「她」的矛盾？ *中華輔導學報*，15，123-149。 <http://doi.org/10.7082/CARGC.200403.0123>

吳啟誠、張瓊云 (2000)。主題分析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69，29-42。 [http://doi.org/10.7034/DSE.202006_\(69\).0003](http://doi.org/10.7034/DSE.202006_(69).0003)

林世琴、李玉嬋 (2020)。無法說出口的「#MeToo」～心理諮商揭開的難言之隱。 *諮商與輔導*，413，48-52。 <http://doi.org/10.29837/CG>

林松齡 (2000)。 *台灣社會的婚姻與家庭：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五南。

林國亮 (2004)。 *家庭樹·生命樹—原生家庭探討完全手冊*。雅歌。

林淑馨 (2010)。 *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巨流。

林萬億 (2013)。 *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五南。

周玉慧 (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 *中華心理學刊*，57，67-89。 <http://doi.org/10.6129/CJP.20140831>

周吟柔、施俊名 (2013)。就性別、法律與文化的角度探討性侵害議題。 *安泰醫護雜誌*，19(4)，23-30。 <http://doi.org/10.7078/TSMHMNJN>

尚曉援、田甜、談子敏 (2019)。他們為什麼不說話：性侵犯受害兒童自我揭露的實證研究。 *濟南大學學報*，29(5)，121-169。

洪素珍、王玥好 (2004)。童年期性侵害婦女處理原諒議題之歷程。 *臺灣性學學刊*，10，35-51。 <http://doi.org/10.6784/FJS.200403.0035>

- 姚淑文 (2001)。是支持還是壓力？性侵害受害者與家人互動之困境。 *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1，11-16。 <http://doi.org/10.6256/FWGS.2001.61.11>
- 侯季吟、蔡麗芳 (2013)。親職化蘊涵著正向力量?-弱勢家庭子女親職化與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 *輔導與諮商學報*，35(2)，25-46。 <http://doi.org/10.7040/JGC>
- 高瑱娟、陳政智 (2019)。以沉默的螺旋理論談#MeToo 的系統暴力現象。 *中科技大学學報*，6，35-46。 [http://doi.org/10.6902/JNTUST.201912_6\(1\).0003](http://doi.org/10.6902/JNTUST.201912_6(1).0003)
- 許臨高、徐錦鋒、張宏哲、莫藜藜、曾麗娟、黃韻如、顧美俐 (2016)。 *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 (三版)。五南。
- 陳昱如、周愷嫻 (2016)。從兒童性侵害案件看兒童性同意權與證述能力。 <https://www.cprc.moj.gov.tw/media/8648/722115352367.pdf?mediaDL=true>
- 陳彰惠、楊玉娥 (2013)。成年早期。載於張媚主編， *人類發展之概念與實務* (頁399-430)。華杏。
- 陳慧女 (2011)。遭受性侵害女性的母職經驗。 *人文與社會學報*，2，53-82。
- 陳慧女 (2020) 寬恕對性侵害被害人復原的意義之初探。 *社區發展季刊*，172，382-393。
- 陳慧女、廖鳳池 (2006)。家庭內性侵害受害者之性受害經驗、適應症狀與諮商介入情形之分析研究。 *諮商輔導學報*，14，102-139。
<http://doi.org/10.6308/JCG.14.04>
- 陳慧女、盧鴻文 (2013)。性侵害被害人自我療癒與對修復式正義的看法。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9，29-48。
- 鈕文英 (2020)。 *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三版)。雙葉書廊。
- 彭秀玲 (2017)。從“#MeToo”運動思考台灣性侵害與性騷擾的現狀。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23(4)，1-3。 <http://doi.org/10.30060/CGP>
- 彭淋、張思恒、楊劍、李洋、葉雲鳳、董曉梅、王聲蘆 (2013)。中國兒童期性虐待發生率的 Meta 分析。 *中華流行病學雜誌*，34，1245-1249。
<http://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012.021>

- 黃軍義、林旖旎 (2017)。華人強暴迷思概念與測量工具。 *中華心理學刊*，59，63-87。 <http://doi.org/10.6129/CJP.20170406>
- 黃俐婷 (2004)。家庭支持的結構與功能分析。 *社區發展季刊*，105，367-380。
- 費孝通 (1984)。 *鄉土中國*。鳳凰出版社。
- 楊中芳 (2001)。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遠流出版公司。
- 楊思芳、丁原郁 (2017)。兒少性虐待受害者與身體虐待受害者在心理創傷與生理健康之比較研究。 *教育心理學報*，49 (2)，321-343。
[http://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7](http://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7)
- 楊蓓 (2014)。 *烽火家人：從原生家庭看自我成長*。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 溫信學 (2021)。 *醫務社會工作 (五版)*。洪葉文化。
- 趙梅如 (2008)。親子互動關係型態的「和諧」階層模式驗證與親子對偶互動關係之差異探討。 *教育與心理研究*，31(4)，83-113。
- 鄭欣怡、黃宗堅 (2012)。遭受性侵害青少年的創傷與復原：諮商師對自身價值觀的立場與反思。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4(3)，1-16。
-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2021)。 *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 (含各縣市與通報人員別、兩造關係、主要發生場所交叉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2.html>
-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2021)。 *兒少保護受虐者人數-以受虐類型及性別分*。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4.html>
- 蔡春美。(2021)。原生家庭與成長歷程如何塑造個人的自我價值感。 *輔導季刊*，57，13-24。 <http://doi.org/10.29742/GQ>
- 潘淑滿 (2000)。 *社會個案工作*。心理。
- 賴紹臻 (2016)。性侵害受害兒童的治療因子與干擾因子探究——從遊戲治療師的觀點。 *台灣遊戲治療學報*，5，17-45。 <http://doi.org/10.6139/JTPT.2016.5.4>

- 謝秀芬 (2016)。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技巧 (四版)。雙葉書廊。
- 簡美華 (2008)。回首來時路：成年女性因應兒時性侵害經驗之策略及其轉變因素。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3，81-116。
<http://doi.org/10.7082/CJGC.200803.0081>
- 簡美華、管貴貞 (2006)。向非施虐母親揭露亂倫經驗及其影響之探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4，1-24。<http://doi.org/10.29734/SJSW.200606.0001>
- 瞿海源 (編) (2018)。楊國樞文集第六冊：孝道與家庭。Airiti Press (華藝學術)。
<http://doi.org/10.6140/AP.9789864371501>

二、英文部分

- Adams, J. A., Farst, K. J., & Kellogg, N. D. (2018). Interpretation of medical findings in suspected child sexual abuse: An update for 2018. *Journal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Gynecology*, 31(3), 225-231.
<http://doi.org/10.1016/j.jpag.2017.12.011>
- Adamsa, J., Mruga, S., & Knighta, D. C. (2019).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as predictors of psychopatholog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86, 167-17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8.09.019>.
- Alaggia, R. (2004). Many ways of telling: Expand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8, 1213-122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4.03.016>
- Alaggia, R. (2010). 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Considera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 32-39.
- Alaggia, R., & Kirshenbaum, S. (2005).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family dynamics on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s. *Families in Society*,

86, 227-234. <http://doi.org/10.1606/1044-3894.2457>

Alaggia, R., Collin-Ve'zina, D., & Lateef, R. (2019). 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to child sexual abuse (CSA) disclosures: A research update (2000-2016).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20*, 1-24. <http://doi.org/10.1177/1524838017697312>

Allnock, D., & Miller, P. (2013). *No one noticed, no one heard: A study of disclosures of childhood abuse*.

<http://uobrep.openrepository.com/uobrep/handle/10547/600875>

Altman, I., & Taylor, D. A.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Atkinson, R. (2004). Life story interview. In M. S. Lewis-Beck, A. Bryman & T. F. Liao (Eds.), *The Sage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pp. 566-570). Sage.

Atkinson, R. (2007).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as a bridge in narrative inquiry. In D. J. Clandinin (Ed.), *Handbook of narrative inquiry: Mapping a methodology* (pp. 224-245). Sage Publication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15). *Responding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disclosures of abuse*. <https://aifs.gov.au/cfca/publications/responding-children-and-young-people-s-disclosures-abu>

Baker, J. N., Tanis, H. J., & Rice, J. B. (2001). Including siblings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Research, Treatment, and Program Innovations for Victims, Survivors, and Offenders, 10*(3), 1-16. http://doi.org/10.1300/J070v10n03_01

Baker, A. J., & Schneiderman, M. (2015). *Bonded to the abuser: How victims make sense of childhood abus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Beckert, T. E., Strom, R. D., Strom, P. S., & Yang, C. T. (2006). The success of Taiwanese fathers in guiding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41*, 493-509.

- Bengtson, V. L. (1985). Diversity and symbolism in grand-parental roles. In V. L. Bengtson & J. F. Robertson (Eds.), *Grandparenthood* (pp. 11-25). Sage Publications.
- Bengtson, V. L., & Schrader, S. S. (1982).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D. J. Mangen & W. A. Peterson (Eds.),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Vol. 2, pp. 115-128).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ngtson, V. L., & Roberts, R. H. L.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856-870. <http://doi.org/10.2307/352993>
- Bernard, H. R. (2017).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 Bogar, C. B., & Hulse-Killacky, D. (2006). Resiliency determinants and resiliency processes among female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ounseling*, 84, 318-327. <http://doi.org/10.1002/j.1556-6678.2006.tb00411.x>
- Bolen, R. M., & Lamb, J. L. (2007). Parental support and outcome in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6(2), 33-54. http://doi.org/10.1300/J070v16n02_03
- Bond, M. H. (2002). Reclaiming the individual from Hofstede's ecological analysis-- A 20-year odyssey: Comment on Oyserman et al.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73-77. <http://doi.org/10.1037/0033-2909.128.1.73>
- Bowen, M. (1993).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Jason Aronson.
- Boynton-Jarrett, R., Wright, R. J., Putnam, F. W., Hibert, E. L., Michels, K. B., Forman, M. R. & Rich-Edwards, J. (2013) Childhood abuse and age at menarc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2(2), 241-247. <http://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2.06.006>
- Brattfjell, M. L., & Flåm, A. M. (2019).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saw me and

listened.” From child sexual abuse to disclosure: Adults’ recalls of the process towards final disclosur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89, 225-236.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8.11.022>

Brazelton, J. F. (2015). The secret storm: Exploring the disclosure process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raumatology, 21(3), 181-187.<http://doi.org/10.1037/trm0000047>

British Columbia (n.d.). *Topic 3: Recogniz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Direct and indirect disclosures*. <https://childdsafe.prn.bc.ca/recognizing-child-abuse-and-neglect/direct-and-indirect-disclosures/>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nfenbrenner, U. (1995). *Developmental ecology through space and time: A future persp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ronfenbrenner, U., & Morris, P. A. (1998). *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Wiley.

Bronfenbrenner, U., & Morris, P. A. (2006).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Wiley.

Brown, A. M., Fitzgerald, M. M., Shipman, K., & Schneider, R. (2007). Children’s expectation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interparental conflict: Do parents talk to children about conflict?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2, 407-412.

<http://doi.org/10.1007/s10896-007-9095-x>

Bussey, K., & Grimbeek, E. J.(1995). Disclosure processes: Issues for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K. Rotenberg (Ed.), *Disclosure process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p. 166-20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bbigat, F. K., & Kangas, M. (2018). Parental relation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non-offending caregivers of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7, 1287-1298. <http://doi.org/10.1007/s10826-017-0972-5>

- Campbell, R. Sefl, T., Barnes, H. E., Ahrens, C. E. Wasco, S. M., & Zaragoza-Diesfeld, Y, (1999). Community services for rape survivors: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r increasing traum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7, 847-858. <http://doi.org/10.1037/0022-006X.67.6.847>
- Campbell, R., Wasco, M. S., Ahrens, E. C., Sefl, T., Barnes, E. H. (2001). Preventing the “second rape”: Rape survivors’ experiences with community service provid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6(12), 123. <http://doi.org/10.1177/088626001016012002>
- Campbell, R. (2008).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ape victi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8), 702-717. <http://doi.org/10.1037/0003-066X.63.8.702>
- Cantón-Cortés, D., Rosario-Cortés, M., & Cantón, J. (2015). Child sexual abuse, attachment style, and depression: The rol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us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0(3), 420-436.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4535101>
- Catherall, D. R. (2005). *Family stressors: Interventions for stress and trauma*. Routledge. <http://doi.org/10.4324/9780203997123>
- Chan, K. L. (2011).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adult sexual victimizat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Hong Kong Chine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 220-229.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0.11.005>
- Chang, C., , A. N., McLean, C. P., & Foa, E. B. (2018). Emotion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TSD and depression among female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0(3), 319-326. <http://doi.org/10.1037/tra0000306>
- Chaudoir, S. R., & Fisher, J. D. (2010). The disclosure processes model: Understanding disclosure decision making and postdisclosure outcomes among

- people living with a concealable stigmatized ident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2), 236. <http://doi.org/10.1037/a0018193>
- Chen, J., Cai, Y., Cong, E., Liu, Y., Gao, J., Li, Y., Tao, M., Zhang, K., Wang, X., Gao, C., Yang, L., Li, K., Shi, J., Wang, G., Liu, L., Zhang, J., Du, B., Jiang, G., Shen, J., ... Flint, J. (2014).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on in Chinese women. *PLoS ONE*, 9(1), 1-9. <http://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87569>
- Clarke, E. J., Preston, M., Raksin, J., & Bengtson, V. L. (1999). Types of conflicts and tensions between older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The Gerontologist*, 39, 261-270. <http://doi.org/10.1093/geront/39.3.261>
- Clevenger, S. (2016). Mothers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s: How women “do mother” after their child has been sexually assaulted. *Feminist Criminology*, 11, 227-252. <http://doi.org/10.1177/1557085115586024>
- Cole, P. M., Woolger, C., Power, T. G., & Smith, K. D. (1992). Parenting difficulties among adult survivors of father-daughter inces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6, 239-249. [http://doi.org/10.1016/0145-2134\(92\)90031-L](http://doi.org/10.1016/0145-2134(92)90031-L)
- Collin-Ve'zina, D., Sablonni, D. L., Palmer, A. M., & Milne, L. (2015). A preliminary mapping of individual, rela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impede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43, 123-13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5.03.010>
- Collings, S. J., Griffiths, S., & Kumalo, M. (2005). Patterns of disclos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 270-285. <http://doi.org/10.1177/008124630503500207>
- Collins, W. A., & Steinberg, L. (2006).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interpersonal context. In W. Damon & N. Eisenberg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oemotional processes*(pp. 1003-1067). Wiley.

- Cooky, C. (2012). Success without honor: Cultures of silence and the Penn State scandal.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Methodologies*, 12, 326-329.
<http://doi.org/10.1177/1532708612446432>
- Courtois, C. A. & Ford, J. D. (2013). *Treating complex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Scientific foundations and therapeutic models*. (p. 391-414). Guilford Press.
- Cozby, P. C. (1973). Self-disclosure: A literature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9(2), 73-91. <http://doi.org/10.1037/h0033950>
- Crabtree, E., Wilson, C. & McElvaney, R. (2018). Childhood sexual abuse: Sibling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2.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8769356>
- Crisma, M., Bascelli, E., Paci, D., & Romito (2004). Adolescents who experience sexual abuse: Fears, needs and impediments to disclosur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8, 1035-1048.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4.03.015>
- Crisp, B. R. (2010). Silence and silenced: Implications for the spirituality of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 *Feminist Theology*, 18, 277-293.
<http://doi.org/10.1177/0966735009360386>
- Cyr, M., Allarda, M., Fernetb, M., & Hébertb, M. (2019). Paternal support for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s: A qualitative stud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5, 1-1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9.104049>
- Cyr, M., Hébert, M., Frappier, J., Tourigny, M., McDuff P., & Turcotte, M. (2014). Parental support provided by nonoffending caregivers to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 comparison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Journal of Child Custody*, 11, 216-236. <http://doi.org/10.1080/15379418.2014.954688>
- Cyr, M., Frappier, J., Hébert, M., Tourigny, M., McDuff, P., & Turcotte, M. (2016).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non-offending parents after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of their child.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5, 757-776.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6.1228726>

Del Castillo, D., & O'Dougherty Wright, M. (2009).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in disclosing childhood sexual abuse to a romantic partner.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8*, 386-404. <http://doi.org/10.1080/10538710903035230>

Derlega, V. J., & Grzelak, J. (1979). Appropriateness of self-disclosure. In G.Chelune (Ed.), *Self-disclosure: Origins,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of opennes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ssey-Bass.

Derlega, V. J., Metts, S., Petronio, S., & Margulis, S. T. (1993). *Self-disclosure*. Sage.

Desrochers, G., Bergeron, S., Khalifé, S., Dupuis, M. , & Jodoin, M. (2010). Provoked vestibulodynia: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topical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treatment outcom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 106-115.

Dewit, D., Wister, A. & Burch, T. K. (1988). Physical distance and social contact between elder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Research on Aging, 10*, 56-80. <http://doi.org/10.1177/0164027588101003>

Diniz, N. M. F., e Lira, M. O. S. C., Couto, T. M., Vieira, M. C. A., Justino, T. M. V., & Barbosa, K. M. G. (2019). Limits and intolerances of women surviving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Nursing, 3*, 407-413. <http://doi.org/10.5205/1981-8963.2019.239787>

Domhardt, M., Münzer, A., Fegert, J. M., & Goldbeck, L. (2015). Resilience i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16*, 476-493. <http://doi.org/10.1177/1524838014557288>

Donalek, J. G. (2001). First incest disclosure.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2*, 573-591. <http://doi.org/10.1080/01612840118152>

Dorahy, M. J., & Clearwater, K. (2012). Shame and guilt in men exposed to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1*(2), 155-175.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2.659803>

- Draucker, C. B., & Martsof, D. S. (2008). Storying childhood sexual abus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8*, 1034-1048.
<http://doi.org/10.1177/1049732308319925>
- Draucker, C. B., & Mazurczyk, J. (2013).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substance use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s during adolescence: An integrative review. *Nursing Outlook, 61*(5), 291-310.
<http://doi.org/10.1016/j.outlook.2012.12.003>
- Dyb, G., Holen, A., Steinberg, A. M., Rodriguez, N., & Pynoos, R. S. (2003). Alleged sexual abuse at a day care center: Impact on parent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7*, 939-950. [http://doi.org/10.1016/S0145-2134\(03\)00141-8](http://doi.org/10.1016/S0145-2134(03)00141-8)
- Easton, S. D. (2013).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mong adult male survivors. *Clinic Social Work Journal, 41*, 344-355. <http://doi.org/10.1007/s10615-012-0420-3>
- Easton, S. D. (2014). Masculine norms, disclosure, and childhood adversities predict long-term mental distress among men with histori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8*(2), 243-25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3.08.020>
- Easton, S. D. (2019a). Childhood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adulthood: Assessing merits of early disclosure and discuss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3*, 208-21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9.04.005>
- Easton, S. D. (2019b).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rections for breaking new grou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9*, e104287-e10428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9.104287>
- Easton, S. D., Kong, J., Gregas, M. C., Shen, C., & Shafer, K. (2019). Child sexual abuse and depression in late life for men: A population-based, longitudinal analysi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4*(5), 842-852.

<http://doi.org/10.1093/geronb/gbx114>

Elder, G. H., Jr.(1984). Families, kin, and the life cours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R. D. Parke(Ed.),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The family*(pp. 80-13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nsink, K., Bégin, M., Normandin, L., & Fonagy, P. (2016). Maternal and child

reflective function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ld sexual abuse: Pathways to

depression and externalising difficul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7, 1-10. <http://doi.org/10.3402/ejpt.v7.30611>

Ensink, K., Borelli, J. L., Normandin, L., Target, M., & Fonagy, P. (2020).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attachment insecurity: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90, 115-124.

<http://doi.org/10.1037/ort0000407>

Everson, M. D. (1997). Understanding bizarre, improbable, and fantastic elements in

children's accounts of abuse. *Child Maltreatment*, 2(2), 134-149.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97002002007>

Fahrudin, A., Edward, D., Yusuf, H., Sulaiman, W. A. & Malek, M. (2018).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functioning associated with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child sexual assau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ocial Science*, 8, 958-967.

<http://doi.org/10.18488/journal.1.2018.811.958.967>

Feiring, C., Taska, L., & Lewis, M. (2002). Adjustment following sexual abuse

discovery: The role of shame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 79-92. <http://doi.org/10.1037//0012-1649.38.1.79>

Fergusson, D. M., McLeod, G. F. H., & Horwood, L. J. (2013).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adul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indings from a 3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 New Zeala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7, 664-67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3.03.013>

- Figley, C. R. (1998). *Burnout in families: The systemic costs of caring*. CRC Press.
- Fischer, L. R. (1981). Transitions in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3-622. <http://doi.org/10.2307/351762>
- Fisher, C., Goldsmith, A., Hurcombe, R., & Soares C. (2017). *The impa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apid evidence assessment*. <https://www.iicsa.org.uk/cy/key-documents/1534/view/iicsa-impacts-child-sexual-abuse-rapid-evidence-assessment-full-report-english.pdf>
- Fitzgerald, M. M., Shipman, K. L., Jackson, J. L., McMahon, R. J., & Hanley, H. M. (2005).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versu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mong incest survivor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9, 661-68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4.10.012>
- Fong, H., Bennett, C. E., Mondestin, V., Scribano, P. V., Mollen, C., & Wood, J. N. (2017).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overy on caregivers and families: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7.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7714437>
- Fontes, L. A., & Plummer, C. (2010). Cultural issues in disclosur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9, 491-518.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0.512520>
- Foster, J. M., & Hagedorn, W. B. (2014).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wounded: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children's sexual abuse experiences and recovery proces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3, 538-557.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4.918072>
- Gagnier, C., & Collin-Vézina, D. (2016). The disclosure experiences of male child sexual abuse survivor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5(2), 221-241.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6.1124308>
- Gallo, E. A. G., Munhoz, T. N., Mola, C. L., & Murray, J. (2018). Gender differences

- in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adul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79, 107-11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8.01.003>
- Germain, B. C. (1979). *Social work practice: People and environment* (pp.1-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ilbert, R. D. (2018). *The eight concepts of Bowen theory*. Leading Systems Press.
- Gilligan, P., & Akhtar, S. (2006). Cultural barriers to the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Asian communities: Listening to what women sa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6, 1361-1377. <http://doi.org/10.1093/bjsw/bch309>
- Gitterman, A., Knight, C., & Germain, C. B. (2020). *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ff, B. S. N., & Schwerdtfeger, K. L. (2004). The systemic impact of traumatized children. In D. R. Catherall (Ed.), *Handbook of stress, trauma, and the family* (pp. 179-202). Brunner-Routledge.
- Goodman-Brown, T. B., Edelstein, R. S., Goodman, G. S., Jones, D., & Gordon, D. S. (2003). Why children tell: A model of children's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7(5), 525-540.
- Goodson, I., & Choi, P. L. (2008). Life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s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Studying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Teacher Education Quarterly*, 35(2), 5-28.
- Graham-Bermann, S. A., Kulkarni, M. R., & Kanukollu, S. (2011). Is disclosure therapeutic for children following exposure to traumatic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6, 1056-1076.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0365855>.

- Gray, S., & Rarick S. (2017). Exploring gender and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7*, 570-587.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8.1484403>
- Greene, K., Derlega, V. J., & Mathews, A. (2006). Self-disclosure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A. L. Vangelisti, & D. Perlma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409-4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doi.org/10.1017/9781316417867>
- Grinyer, A., & Thomas, C. (2012). The value of interviewing on multiple occasions or longitudinally. In J. Gubrium, J. Holstein, A. Marvasti, & K. McKinne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aft* (pp.219-230). Sage.
- Grossmann, K., Grossmann, K. E., Kindler, H., & Zimmermann, P. (2008). *A wider view of attachment and exploration: 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and fath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from infancy to young adulthood.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2nd ed.) (pp. 857-879). Guilford Press.
- Gupta, A., & Ailawadi, A. (2005).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sexual abuse and incest: experiences of women survivors in India. In S. J. Jejeebhoy, I. Shah, & S. Thapa (Eds.), *Sex without consent: Young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171-202). Zed Books.
- Hamilton, G., Brubacher, S. P., Powell, M. B. (2016). Expressions of shame in investigative interviews with Australian aboriginal childre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51*, 64-7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5.11.004>
- Han, S., & Kim, J. (2016). Perceived needs for support program for family with child sexual abuse victim in South Korea: Focus group interview with therapists and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Research, Treatment, and Program*

Innovations for Victims, Survivors, and Offenders, 25, 738-756.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6.1221489>

Harrison, B. (2009). Editor's introduction: Researching lives and the lived experience.

In B. Harrison (Ed.), *Life story research* (Vol. 1, pp. xxiii-xxlviii). SAGE Publications.

Hébert, M., Tourigny, M., Cyr, M., McDuff, P., & Joly, J. (2009).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timing of disclosure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adults from Quebec.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4, 631-636.

<http://doi.org/10.1177/070674370905400908>

Herman, J. L. (2005). Justice from the victim's perspectiv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1(5), 571-602. <http://doi.org/10.1177/1077801205274450>

Hill, A. (2003). Issues facing brother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8, 281-290.

<http://doi.org/10.1046/j.1365-2206.2003.00291.x>

Hogerbrugge, M. J. A., & Komter, A. E. (2012).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Comparing two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using longitudinal panel data.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 372-383. <http://doi.org/10.1093/geronb/gbr157>

Holt, T., Cohen, J., Mannarino, A., & Jensen, T. K. (2014). Parental emotional response to children's trauma.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and Trauma*, 23, 1057-1071. <http://doi.org/10.1080/10926771.2014.953717>

Hofstede, G. (1980). Motiv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9, 42-63. [http://doi.org/10.1016/0090-2616\(80\)90013-3](http://doi.org/10.1016/0090-2616(80)90013-3)

Homma, Y., Wang, N. R., Saewyc, E., & Kishor, N.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abuse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 boy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1, 18-24.

<http://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1.12.032>

Hu, M. H., Huang, G. S., Huang, J. L., Wu, C. T., Chao, A. S., Lo, F. S., & Wu H. P.

(2018).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and risk factors of recurrent sexual abuse and delayed reported sexual abuse in childhood. *Medicine, 97*(14), 1-5.

<http://doi.org/10.1097/MD.00000000000010236>

Hunter, S. V. (2010). Evolving narratives about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halleng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victim and survivor paradigm.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1*(2), 176-190. <http://doi.org/10.1375/anft.31.2.176>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1(2), 176-190. <http://doi.org/10.1375/anft.31.2.176>

Hunter, S. V. (2011).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s a life-long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2*, 159-172. <http://doi.org/10.1375/anft.32.2.159>

Inman-Amos, J., Hendrick, S. S., & Hendrick, C. (1994). Love attitudes: Similarities between parents an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amily Relations, 43*, 456-461.

<http://doi.org/10.2307/585378>

Jackson, S., Newall, E., & Backett-Milburn, K. (2015).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3), 322-332.

<http://doi.org/10.1111/cfs.12080>

Jensen, T. K., Gulbrandsen, W., Mossige, S., Reichelt, S., & Tjersland, O. A. (2005).

Reporting possible sexual abuse: A qualitative study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s and the context for disclosur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9*, 1395-1413.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5.07.004>

Jeremiah, R. D., Quinn, C. R., & Alexis, J. M. (2017). Exposing the culture of silence:

Inhibiting factors in the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mitigation of sexual abuse in the Eastern Caribbea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66*, 53-63.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7.01.029>

- Jernbro, C., Otterman, G., Lucas, S., Tindberg, Y., & Janson, S. (2017). Disclosure of child physical abuse and perceived adult support among Swedish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Review, 26*, 451-464. <http://doi.org/10.1002/car.2443>.
- Jobe-Shields, L., Swiecicki, C. C., Fritz, D. R., Stinnette, J. S., & Hanson, R. F. (2016).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 the nonoffending caregiver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parenting practice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5*, 110-125.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5.1078867>
- Jonzon, E., & Lindblad, F. (2004). Disclosure, reac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Findings from a sample of adult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Maltreatment, 9*(2), 190-200.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04264263>
- Jourard, S. M.,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disclosur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91-98. <http://doi.org/10.1037/h0043357>
- Kamiya, Y., Timonen, V., & Kenny, R. A. (2016).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of older adults.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8*, 415-422. <http://doi.org/10.1017/S1041610215001672>
- Katz, R., Lowenstein, A., Phillips, J., & Daatland, S. O. (2005). Theorizing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Solidarity,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in cross-national contexts. In V. L. Bengtson, A. C. Acock, K. R. Allen, P. Dilworth-Anderson, & D. M. Klein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93-402). Sage.
- Keating, D. M., Russell, J. C., Cornacchione, J., & Smith, S. W. (2013).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difficult family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 160-180.
- Kerr, M. E., Bowen, M., & Kerr, M. E. (1988). *Family evaluation*. WW Norton & Company.

- Kennedy, S. (2011). *Why I didn't say anything: The Sheldon Kennedy story*.
Insomniac Press.
- Kennedy, A. C., & Prock, K. A. (2018). "I still feel like I am not normal":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stigma and stigmatization among female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exual assault,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19(5), 1-16. <http://doi.org/10.1177/1524838016673601>
- Kilimnik, C. D., & Meston, C. M. (2016). Role of body esteem in the sexual excitation and inhibition responses of women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13(11), 1718-1728. <http://doi.org/10.1016/j.jsxm.2016.09.004>
- Kim, J., Thompson, E. A., Walsh, E. M., & Schepp, K. G. (2015). Trajectorie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at-risk youth: Parental depression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9, 434-440. <http://doi.org/10.1016/j.apnu.2015.07.001>
- Kivett, V. R., & Atkinson, M. P. (1984). Filial expectations, association and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older rural-transitional paren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9, 499-503. <http://doi.org/10.1093/geronj/39.4.499>
- Knott, T., & Fabre, A. (2014). *Maternal response to the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http://www.ipt-forensics.com/journal/volume20/j20_1.htm
- Kumar, A. K. S., Stern, V., Subrahmanian, R., Sherr, L., Burton, P., Guerra, N.,...Mehta, S. K. (2017). Ending violence in childhood: A global imperative.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22, 1-16. <http://doi.org/10.1080/13548506.2017.1287409>
- Labov, W. (1972).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syntax. In W. Labov (Ed.),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p.

354-39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bov, W., &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p. 12-4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ahtinen, H., British Columbia, N. (2018). Children's disclosures of sexual abuse in a population-based sampl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76, 84-9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7.10.011>

Lamb, M. E. (2010). How do fathers influe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Let me count the ways.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1-26.

Latzman, N. E., & Latzman, R. D. (2015).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child sexual abuse and sexually intrusive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aregiver discipline strategy.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2), 480-490.

<http://doi.org/10.1007/s10826-013-9860-9>

Leach, C., Powell, M. B., Sharman, S. J. & Anglim, J.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age and disclosures of sexual abuse during forensic interviews. *Child Maltreatment*, 22(1), 79-88.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16675723>

Leclerc, B., & Wortley, R. (2015). Predictors of victim disclos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incarcerated adult sex offender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43, 104-11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5.03.003>

Lee, W. K. M., & Kin, K. H. (2005).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formal support for older persons in Hong Kong: Modification to filial piety. *Ageing International*, 30, 188-206. <http://doi.org/10.1007/s12126-005-1011-1>

Levinson, D. J. (1978).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Random House Digital.

Levinson, D. J. (1996). *The seasons of a woman's life*. Alfred A. Knopf.

- Lewis, T., McElroy, E., Harlaar, N., & Runyan, D. (2016). Does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ffer from maltreated but non-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 prospective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on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51*, 31-40.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5.11.016>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 Lind, M. J., Brown, R. C., Sheerin, C. M., York, T. P., Myers, J. M., Kendler, K. S., & Amstadter, A. B. (2018). Does parenting influenc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severe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psychiatric resilience in adulthood?.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49*(1), 33-41. <http://doi.org/10.1007/s10578-017-0727-y>
- Linell, H. (2017). The process of disclosing child abuse: A study of Swedish social services protection in child abuse cases.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2*(4), 11-19. <http://doi.org/10.1111/cfs.12245>
- Lippert, T., Cross, T. P., Jones, L., & Walsh, W. (2009). Telling interviewers about sexual abuse: predictors of child disclosure at forensic interviews. *Child Maltreatment, 14*, 100-113.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08318398>.
- Livingston, G. & Parker, K. (2019). *8 facts about American dads*.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2/fathers-day-facts/>
- London, K., Bruck, M., Ceci, S. J., & Shuman, D. W. (2005).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What does the research tell us about the ways that children tell?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1*, 194-226. <http://doi.org/10.1037/1076-8971.11.1.194>
- London, K., Bruck, M., Ceci, S. J., Shuman, D. W. (2007).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eview of the contemporary empirical literatur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542198_Disclosure_of_Child_Sexual_Abuse_A_Review_of_the_Contemporary_Empirical_Literature

- London, K., Bruck, M., Wright, D. B., & Ceci, S. J. (2008). Review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n how children report sexual abuse to others: Findings,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forensic interviewers. *Memory, 16*, 29-47. <http://doi.org/10.1080/09658210701725732>
- Lopez-Castroman, J., Melhem, N., Birmaher, B., Greenhill, L., Kolko, D., Stanley, B., Zelazny, J., Brodsky, B., Garcia-Nieto, R., Burke, A. K., Mann, J. J., Brent, D. A., & Oquendo, M. A. (2013). Early childhood sexual abuse increases suicidal intent. *World Psychiatry, 12*, 149-154. <http://doi.org/10.1002/wps.20039>
- Love, S., & Robinson Kurpius, S. E. (2020).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coping as young adults: The roles of attachment and mattering.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12), 1177-1200.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20958647>
- Lovett, B. B. (2004).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Maternal response and other variables impacting the victim.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1*, 355-371. <http://doi.org/10.1023/B:CASW.0000035221.78729.d6>
- 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http://doi.org/10.1111/1467-8624.00164>
- Magnusson, M., Ernberg, E., & Landström, S. (2017). Preschoolers' disclosur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Examining corroborated cases from Swedish court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70*, 199-209.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7.05.018>
- Maikovich-Fong, A. K., & Jaffee, S. R. (2010).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haracteristics and victim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e of youth.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4*, 429-43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9.10.006>

- Masur, P. K. (2019). *Situational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online environment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http://doi.org/10.1007/978-3-319-78884-5>
- Malloy, L. C., Brubacher, S. P., & Lamb, M. E. (2011).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disclosure revealed in investigative interviews with suspected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5*(1), 8-19.
<http://doi.org/10.1080/10888691.2011.538616>
- Malloy, L. C., Brubacher, P., & Lamb, M. E. (2013). Because she's one who listens: Children discuss disclosure recipients in forensic interviews. *Child Maltreatment, 18*, 245-251.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13497250>
- Mansbach-Kleinfeld, I., Ifrah, A., Apter, A., & Farbstein, I. (2015). Child sexual abuse as reported by Israeli adolescents: Social and health related correlate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40*, 68-80.
- Marriott, C., Hamilton-Giachritsis, C., & Harrop, C. (2014). Factors promoting resilience following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 structured,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hild Abuse Review, 23*, 17-34. <http://doi.org/10.1002/car.2258>
- Mathews, B., & Collin-Vézina, D. (2019). Child sexual abuse: Toward a conceptual model and definition.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20*(2), 131-148.
<http://doi.org/10.1177/1524838017738726>
- Mathews, S., Hendricks, N., & Abrahams, N. (2016). A psychosocial understanding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among female children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5*(6), 636-654.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6.1199078>
- McCarthy, A., Cyr, M., Fernet, M. & Hébert, M. (2018). Maternal emotional support following the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8*(3), 259-279.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8.1534919>

McElvaney, R. (2015).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Delays, non-disclosure and partial Disclosure. What the research tells u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Child Abuse Review*, 24, 159-169. <http://doi.org/10.1002/car.2280>

McElvaney, R., & Culhane, M. (2015).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hildren's assessment reports: What helps children tell? *Child Abuse Review*, 26(2), 103-115. <http://doi.org/10.1002/car.2390>.

McElvaney, R., Greene, S., & Hogan, D. (2014). To tell or not to tell? factors influencing young people's informal disclosur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9(5), 928-947.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3506281>

McGillivray, C. J., Pidgeon, A. M., Ronken, C., & Credland-Ballantyne, C. A. (2018). Resilience in non-offending mothers of children who have reported experiencing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7, 793-801.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8.1477221>

McGregor, K. (2008). *Surviving and moving on: Self-help for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Random House New Zealand.

McGuire, K., & London, K. (2019). A retrospective approach to examining child abuse disclosur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9, 104-263.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9.104263>

McTavish, J. R., Sverdlichenko, I., MacMillan, H. L., & Wekerle, C. (2019).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and PTSD: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review.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2, 196-208.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9.04.006>

Melville, J. D., Kellogg, N. D., Perez, N., & Lukefahr, J. L. (2014). Assessment for self-blame and trauma symptoms during the medical evaluation of suspecte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8, 851-857.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4.01.020>

- Miles-McLean, H., Liss, M., Erchull, M. J., Robertson, C. M., Hagerman, C., Gnoleba, M. A., & Papp, L. J. (2015). Stop looking at me! Interpersonal sexual objectification as a source of insidious trauma.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9(3), 363-374.
- Monteith, L. L., Bahraini, N. H., Matarazzo, B. B., Soberay, K. A., & Smith, C. P. (2016). Per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predict suicidal self-directed violence among veterans exposed to military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2(7), 743-755. <http://doi.org/10.1002/jclp.22292>
- Montgomery, E., Pope, C., & Rogers, J. (2015). A feminist narrative study of the maternity care experiences of women who were sexually abused in childhood. *Midwifery*, 31, 54-60. <http://doi.org/10.1016/j.midw.2014.05.010>
- Morrison, S. E., Bruce, C., & Wilson, S. (2018). Children's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xploring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7, 176-194.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8.1425943>
- Musliner, K. L., & Singer, J. B. (2014). Emotional support and adult depression in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8, 1331-1334.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4.01.016>
- Newsom, K. C. (2013). *"I am not a victim, I am a survivor": Healthy sexuality as a context for resilience in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Manhattan, KS.
- Okur, P., Pereda, N., Knaap L. M., & Bogaerts, S. (2019). Attributions of blame among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Findings from a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8, 301-317.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8.1546249>
- Olafson, E., & Lederman, J. C. S. (2006).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about children's

- disclosure patterns in child sexual abuse cases.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ournal*, 57, 27-40. <http://doi.org/10.1111/j.1755-6988.2006.tb00112.x>
- O'Leary, P., Coohy, C., & Easton, S. D. (2010). The effect of severe child sexual abuse and disclosure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adulthood.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9, 275-289. <http://doi.org/10.1080/10538711003781251>
- Omarzu, J. (2000). A disclosure decision model: Determining how and when individuals will self-disclos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2), 174-185.
- One In Four (2015). *Survivors' voices: breaking the silence on living with the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http://www.oneinfour.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11/Survivors_Voices_Report_November_2015-2.pdf
- Opydo-Szymaczek, J., Jarzabek-Bielecka, G., Kędzia, W., & Borysewicz-Lewicka, M. (2018). Child sexual abuse as an etiological factor of overweight and eating disorders—considerations for primary health care providers. *Ginekologia Polska*, 89, 48-54. <http://doi.org/10.5603/GP.a2018.0009>
- Paine, M. L., & Hansen, D. J. (2002). Factors influencing children to self-disclose sexual abus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2, 271-295. [http://doi.org/10.1016/S0272-7358\(01\)00091-5](http://doi.org/10.1016/S0272-7358(01)00091-5)
- Palm, G. (2014). Attachment theory and fathers: Moving from “being there” to “being with.”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and Review*, 6, 282-297. <http://doi.org/10.1111/jftr.12045>
- Palo, A. D., & Gilbert, B. O.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response to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later outcome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4, 445-463.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5.1042180>
- Parent-Boursier, C., & Hebert, M. (2015). Security i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behavior problems in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30,

113-122. <http://doi.org/10.1007/s10896-014-9653-y>

Pegram, S. E., & Abbey, A. (2019). Associations between sexual assault severity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Caucasian survivo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 4020-4040.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6673626>

Petronio, S., Reeder, H. M., Hecht, M. L., & Ros-Mendoza, T. M. T. (1996).

Disclosure of sexual abuse b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181-199.

<http://doi.org/10.1080/00909889609365450>

Pitzer, L. M., & Fingerman, K. L. (2010). Psychosocial resources and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and adult well-being.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65B*, 425-433. <http://doi.org/10.1093/geronb/gbq031>

Plummer, K. (2001). The call of life storie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Lofland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p. 395-406). SAGE Publications.

Plummer, C. A., & Eastin, J. (2007). The effe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investigations on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 1053-1071. <http://doi.org/10.1177/1077801207305931>

Pogue, J. K., Schreier, A., West, T., Pittenger, S. L., Meidlinger, K., Flood, M. F., & Hansen, D. J. (2014, November). *Non-abused siblings of sexually abused youth: Symptom presenta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victim distres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48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Philadelphia, PA.

Pratt, R. J., & Tolliday, D. (2018).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What does the research tell us?*

https://www.kidsguardian.nsw.gov.au/ArticleDocuments/953/Understanding_chil

d_sexual_abuse_disclosure.pdf.aspx?Embed=Y

- Priebe, G., & Svedin, C. G. (2008). Child sexual abuse is largely hidden from the adult society: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adolescents' disclosure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2, 1095-1108.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08.04.001>
- Pulverman, C. S., Kilimnik, C. D., & Meston, C. M. (2018).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women's sexual heal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Sexual Medicine Reviews*, 6. <http://doi.org/10.1016/j.sxmr.2017.12.002>.
- Quadara, A., Stathopoulos, M., & Carson, R. (2016).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sclosure of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Rachel_Carson2/publication/307860375_Family_relationships_and_the_disclosure_of_institutional_child_sexual_abuse_-_Report_for_the_Royal_Commission_into_Institutional_Responses_to_Child_Sexual_Abuse/links/57cf804608ae582e0693926c/Family-relationships-and-the-disclosure-of-institutional-child-sexual-abuse-Report-for-the-Royal-Commission-into-Institutional-Responses-to-Child-Sexual-Abuse.pdf
- Radford, L., Corral, S., Bradley, C., & Fisher, H. L. (2013).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7, 801-813.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3.02.004>
- Rakow, A., Smith, D., Begle, A. M., & Ayer, L. (2011). The association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chil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The role of maternal support following chil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 467-480.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1.588189>.
- Ramírez, C., Pinzón-Rondón, A. M., & Botero, J. C. (2011). Contextual predictive fact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 1022-103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1.10.004>

- Rapsey, C. M., Scott, K. M., & Patterson, T. (2018). Childhood sexual abuse, poly-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across adulthood and older age: Findings from a 2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44*, 171-179. <http://doi.org/10.1016/j.jad.2018.10.095>.
- Rehan, W., Antfolk, J., Johansson, A., & Santtila, P. (2019). Do single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abuse increase psychopathology symptoms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5), 1021-1038.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6647004>
- Rellini, A. H., & Meston, C. M. (2011). Sexual self-schemas, sexual dysfunction, and the sexual responses of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0*, 351-362. <http://doi.org/10.1007/s10508-010-9694-0>
- Robert, K. Y. (2015).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start to finish*. Guilford Publications.
- Roesler, T. A., & Wind, T. W. (1994). Telling the secret: Adult women describe their disclosures of inces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9*(3), 327-338. <http://doi.org/10.1177/088626094009003003>
- Sampson, H. (2004). Navigating the waves: The usefulness of a pilo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4*, 383-402. <http://doi.org/10.1177/1468794104047236>
- Santa-Sosa, E. J., Steer, R. A., Deblinger, E., & Runyon, M. K. (2013). Depression and parenting by nonoffending mothers of children who experience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2*, 915-930.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3.841309>
- Satir, V., Banmen, J., Gerber, J., & Gomori, M. (1991). *The Satir model: 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 Sawyer, A., & Bagley, C. (2017). Child sexual abuse and adolescent and adult

- adjustment: A review of British and world evidence, with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and mental health and school counselling. *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 7, 1-15. <http://doi.org/10.4236/aasoci.2017.71001>
- Schaeffer, P., Leventhal, J. M., & Asnes, A. G. (2011). Children's disclosures of sexual abuse: Learning from direct inquir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 343-352.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1.01.014>
- Schoenbuecher, V., Maier, T., Mohler-Kuo, M., Schnyder, U., & Landolt, M. A. (2012).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by adolescents: A qualitative in-depth stud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7, 3486-3513.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2445380>
- Schreier, A., Pogue, J. K. & Hansen, D. J. (2017).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on non-abused siblings: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4, 254-262. <http://doi.org/10.1016/j.avb.2016.11.011>
- Schug, J., Yuki, M., & Maddux, W. (2010). Relational mobility explains between-and within-culture differences in self-disclosure to close frien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471-1478. <http://doi.org/10.1177/0956797610382786>
- Schwab-Reese, L. M., Hovdestad, W., Tonmyr, L., & Fluke, J. (2018). The potential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other internet-related data and communications for child maltreatment surveillance and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Scoping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85, 187-20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8.01.014>
- Sethi, D., Bellis, M., Hughes, K., Gilbert, R., Mitis, F., & Galea, F. (2013). *European report on 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26375>
- Sewell, W. H., & Hauser, R. M. (1975).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earnings:

- Achievement in the early care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1236-1238.
<http://doi.org/10.1086/226210>
- Shackel, R. (2009).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medium for disclosing sexual abuse: A tool for overcoming potential misconceptions in the courtroom.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16(3), 379-393. <http://doi.org/10.1080/13218710903040280>
- Shalhoub-Kevorkian, N. (2005). Disclosure of child abuse in conflict area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1(10), 1263-1291. <http://doi.org/10.1177/1077801205280180>
- Shea, C. (2000). Don't talk to humans: The crackdown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ingua Franca*, 10, 27-34.
- Sigurdardottir, S., & Halldorsdottir, S. (2018). Screaming body and silent healthcare providers: A case study with a childhood sexual abuse surviv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 94.
<http://doi.org/10.3390/ijerph15010094>
- Sigurdardottir, S., Halldorsdottir, S., & Bender, S. S. (2014). Consequenc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Gende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2, 278-286.
<http://doi.org/10.1177/1403494813514645>.
- Silverstein, M., Parrott, T. M., & Bengtson, V. L. (1995). Factors that predispose middle-aged sons and daughters to provide social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5-475.
<http://doi.org/10.2307/353699>
- Slepian, M. L., & Kirby, J. N. (2018). To whom do we confide our secre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 1008-1023.
<http://doi.org/10.1177/0146167218756032>
- Smith, D. W., Letourneau, E. J., Saunders, B. E., Kilpatrick, D. G., Resnick, H. S., &

- Best, C. L. (2000). Delay in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rap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4*, 273-287. [http://doi.org/10.1016/s0145-2134\(99\)00130-1](http://doi.org/10.1016/s0145-2134(99)00130-1)
-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3). Dangerous safe haven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es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 119-124. <http://doi.org/10.1002/jts.21778>
- Somer, E., & Szwarcberg, S. (2001). Variables in delayed disclosure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1*(3), 332-341. <http://doi.org/10.1037/0002-9432.71.3.332>
- Sorsoli, L. (2010). "I remember", "I thought", "I know I didn't say": Silence and memory in trauma narratives. *Memory, 18*(2), 129-141. <http://doi.org/10.1080/09658210903168046>
- Sorsoli, L., Kia-Keating, M., & Grossman, F. K. (2008). "I keep that hush-hush": Male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 and the challenges of disclosur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 333-345. <http://doi.org/10.1037/0022-0167.55.3.333>
- Stiller, A., & Hellmann, D. F. (2017). In the aftermath of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Consequences, needs, and wishes. *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23*(3), 251-265. <http://doi.org/10.1080/13552600.2017.1318964>
- Stoltenborgh, M., van Ijzendoorn, M. H., Euser, E. M.,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2011).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child sexual abuse: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around the world. *Child Maltreatment, 16*, 79-101. <http://doi.org/10.1177/1077559511403920>
- Sullivan, H. 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orton.
- Sumner, S., Mercy, J., Saul, J., Motsa-Nzuza, N., Kwesigabo, G., Buluma, R., Marcelin, L. H., Lina, H., Shawa, M., Moloney-Kitts, M., Kilbane, T., Sommarin, C., Ligiero, D. P., Brookmeyer, K., Chiang, L., Lea, V., Lee, J.,

- Kress, H., & Hillis, S. (2015). *Prevalence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use of social services-seven countries, 2007-201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84766/>
- Takeda, Y. (2010). Understanding the life stages of women to enhance your practice. *Jap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53, 273-278.
- Talmon, A., & Ginzburg, K. (2017).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ham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3), 325-337.
<http://doi.org/10.1177/0361684317702503>.
- Talmon, A., & Ginzburg, K. (2018). The differential role of narcissism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dissociation, and self-Harm.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18799450>
- Tavkar, P., & Hansen, D. J. (2011). Interventions for families victimized by child sexual abuse: Clinical issues and approaches for child advocacy center-based servic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6, 188-199.
<http://doi.org/10.1016/j.avb.2011.02.005>
- Taylor, S. C., & Norma, C. (2013). The ties that bind: Family barriers for adult women seeking to report childhood sexual assault in Australia.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7, 114-124.
<http://doi.org/10.1016/j.wsif.2012.11.004>
- Tener, D. (2010). *Between me and them: Forgiving inces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Haifa, Israel.
- Tener, D., & Murphy, S. B. (2015). Adult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literature review.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16, 391-400.
<http://doi.org/10.1177/1524838014537906>
- Testa, M., Hoffman, J. H., & Livingston, J. A.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vulnerability as mediated via parent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 363-371.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1.01.010>

Tilton-Weaver, L. (2013). Adolescen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mparing ideas about why adolescents disclose to or keep secrets from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 1-11. <http://doi.org/10.1007/s10964-013-0008-4>

Turnbull, G. J., & McFarlane, A. C. (1996). Acute treatments. In B. van der Kolk, A. McFarlane, & L. Weisaeth (Eds.), *Traumatic stress* (pp. 480–490). Guilford Press.

Tyler, K. A., Johnson, K. A., & Brownridge, D. A. (2008).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child maltreatment on later outcomes among high-risk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 506-521. <http://doi.org/10.1007/s10964-007-9250-y>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2022). *Child maltreatment 2020*. <https://www.acf.hhs.gov/cb/report/child-maltreatment-2020>

Ullman, S. (2003). Social reactions to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2, 89-121. http://doi.org/10.1300/J070v12n01_05

Ungar, M., Barter, K., McConnell, S .M., Tutty, L. M., & Fairholm, J. (2009). Patterns of abuse disclosure among yout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8(3), 341-356. <http://doi.org/10.1177/1473325009337842>

Vaillancourt-Morela, M. P., Godbout, N., Labadie, C., Runtz, M., Lussier, Y., & Sabourin, S. (2015). Avoidant and compulsive sexual behaviors in male and female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40, 48-59.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4.10.024>

van Toledo, A., & Seymour, F. (2013). Interventions for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ho disclose sexual abuse: A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3, 772-781. <http://doi.org/10.1016/j.cpr.2013.05.006>

- Von Bertalanffy, L. (1971). *Teoria dei sistemi*. Istituto librario Internazionale,.
- Wager, N., Sneddon, H., & Allnock, D. (2016). *Responding sensitively to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 evidence review*.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f914/2ccb478ef4575ba56b647c8870c3cd5d98cb.pdf>
- Walsh, K., Zwi, K., Woolfenden, S., & Shlonsky, A. (2018). School-based education progra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8*, 33-55.
<http://doi.org/10.1177/1049731515619705>
- Wang, V. (2019). *They were sexually abused long ago as children. Now They Can Sue in N.Y.*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28/nyregion/child-sex-abuse-victims.html>
- Weiner, B. (1979). 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 3-25.
- Weiss, R. S. (1973). *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MIT Pr.
- Wekerle, C., Vakili, N., Stewart, S. H., & Black, T. (2018). The utility of Twitter as a tool for increasing reach of research on sexual violenc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85*, 220-228.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8.04.019>
- Wiley, T. (2009). Legal and social service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A primer an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8*(3), 267-89. <http://doi.org/10.1080/10538710902901754>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Responding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have been sexually abused*.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9270/9789241550147-eng.pdf?sequence=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Child maltreatment*.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ild-maltreatment>
- Wright, N. M.,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7).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Study abroad, trauma, and institutional betrayal.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and Trauma*, 26, 50-68. <http://doi.org/10.1080/10926771.2016.1170088>
- Wu, C. W., & Yeh, K. H. (2020). Intergenerational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nd its effect on elderly life adaptation: Adult children's filial belief and relating autonomy as antece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62, 1-30. [http://doi.org/10.6129/CJP.202003_62\(1\).0001](http://doi.org/10.6129/CJP.202003_62(1).0001)
- Wyatt, G. E., & Mickey M. R. (1987). Ameliorating the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upport by parents and oth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403-414. <http://doi.org/10.1177/088626058700200406>
- Xiao, H., & Smith-Prince, J. (2015). Disclos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The case of Pacific islanders.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4, 369-384. <http://doi.org/10.1080/10538712.2015.1022294>

附錄一、訪談大綱

【第一次訪談】

你好，我是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學生曾莉雅，希望了解成年女性遭遇兒時性侵害和其原生家庭（非施虐父母）親子關係發展歷程，非常感謝你願意參與研究。研究至少進行二次訪談，每次時間約 60 至 90 分鐘。這是訪談同意書，請你詳細閱讀，理解並同意後，在下方簽名。同意書內容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提出，若無，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訪談，謝謝。

我們今天的訪談主要在了解你的個人背景資料，對於親子關係的看法與理解。如果時間允許，會談到一些關於兒時遭性侵害經驗的問題。你可以用最自在的方式回答我的提問或提出你的疑問，有需要暫停或停止的請求都可以隨時提出。

以下為訪談大綱，僅供研究者在訪談時的指導，但不因此而限定訪談的內容。

一、基本資料

- 請簡單的自我介紹。（年齡？職業？個性？興趣？）

二、原生家庭與親子關係

（一）對原生家庭的看法。

- 回想你的成長過程，你會如何描述你印象中的家庭？
 - 家庭成員有哪些？
 - 如果讓你對與家人親密度評分，1-10 分，會給幾分？
 - 與家庭的成員們的關係、狀態？（可以每個成員單獨討論，或描述成員們的相互關係）
 - 你會如何描述、排序與家庭成員的互動？（常一起做的事、平常的相處狀況、可以凸顯與該家人的相處情況的經驗或事件）
- 對原生家庭最深刻的記憶？對此記憶的感覺是什麼？
 - 與其關係是否有過變化或轉變？原因為何？

（二）成年階段與原生家庭關係

- 人際關係
 - 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
 - 你覺得與原生家庭關係有影響你人際發展嗎？
 - 親密關係呢？
- 描述成年階段
 -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成年人？為什麼？
 - 成年後與原生家庭關係（生活、情感、責任方面）？
- 結婚後與原生家庭關係有什麼不同？（已婚之受訪者）
 - 能說說當初走入婚姻的想法嗎？
 - 婚前婚後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 與父母互動關係？（居住遠近、聯絡頻率、支持、情感或衝突）

(三) 你覺得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四) 原生家庭對你的影響？

【第二次訪談】

你好，感謝你參與第二次訪談。今天訪談時間同樣約 60-90 分鐘。首先我們會延續上次的訪談，對於不足或模糊的內容進一步詢問及補充，之後進入關於揭露兒時性創傷經驗的部分。最後詢問兒時性創傷經驗對原生家庭關係發展歷程之影響性。

三、兒時性創傷經驗

- 能否請你談一談當時性侵害經驗？
 - 大約幾歲？加害者是誰？
 - 當時你如何看待這件事情？（你覺得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當下的心情與反應？對加害者的看法？）
 - 創傷症狀與影響

- 在此時此刻，那些經歷過的事件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 您會如何描述自己這一路走來的經歷？
- 改變您對事件想法的人、事或物？

四、揭露的歷程與家庭關係

- 有沒有向他人揭露？
- 你會怎麼描述揭露的經過？
 - 揭露的阻力與推力、對象和反應如何？
- 揭露事件後對你的影響（包含個人和人際關係層面）？
- 揭露性創傷經驗前後與原生家庭關係是否有什麼不同？



附錄二、訪談邀請函

「當心碎共振鳴響，能讓全世界都聽見。」——38 號樹洞

您好：

我是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曾莉雅，目前正在撰寫碩士論文。期望透過研究過程深入了解兒時遭性侵害的成年女性其親子關係的發展歷程變化。

若您符合以下條件，竭誠邀請您參與我的研究訪談：

1. 年齡 20-45 歲成年女性；
2. 兒童時期（12 歲以前）曾遭熟人或陌生人性侵害（含性騷擾）；
3. 身心狀況穩定、司法程序已完成或目前未受司法因素影響。

訪談過程原則上為二次，每次訪談時間約 60-90 分鐘，二次訪談間隔約 7 天。完成所有訪談後，將贈予一千元禮券，以感謝您付出的時間與心力。訪談過程將會全程錄音，訪談內容限用於本碩士論文而不另他用。研究資料的呈現將遵守保密原則，為保障匿名性，參與者的身分及資料會以代碼或代號稱謂。回溯過往經驗過程中可能引發不舒服感受或二次波動，參與者有權利隨時要求中斷訪談或退出研究，研究者會協助轉介專業諮商資源但不予賠償。

若您有意願接受訪談、想了解更多自己或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聯絡。非常感謝您！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

研究生：曾莉雅

手機：

E-mail：feifei@alum.ccu.edu.tw

指導教授：林明傑教授、陳慧女教授

願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照亮彼此的微光，被世界溫柔以待。

附錄三、訪談同意書

副COPY本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非人體研究參考範本)

109年10月21日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109年度第8次會議通過



| | | | |
|------------|-------------------------|----------------------|-------------|
|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版本 | | 110/06/09/Version.02 | |
| 研究計畫名稱 | 揭露兒時性創傷對成年女性親子關係發展之影響探究 | | |
| 研究機構名稱 |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 經費來源 | 研究者本身 |
| 計畫主持人 | 曾莉雅 | 職稱 | 學生 |
| 聯絡電話 | [REDACTED] | 職責 | 執行計畫與知情同意程序 |
| 共同主持人 | 林明傑 | 職稱 | 教授 |
| 協同主持人 | 陳慧女 | 職稱 | 副教授 |
| 二十四小時緊急聯絡人 | 曾莉雅 | 電話 | [REDACTED] |

一、研究目的

1. 瞭解成年女性知覺兒時性侵害經驗的過程與影響。
2. 探索當事人向非施虐照顧者揭露的脈絡、方式與時間點。選擇揭露的因素、需求和期望，以及揭露後的衝擊。
3. 遭遇兒時性創傷成年女性知覺親子關係發展歷程，與兒時性創傷經驗之關聯性。

二、研究對象

參與訪談之必要條件為：(1)年齡 20-45 歲成年女性；(2)兒童時期（12 歲以前）曾遭熟人或陌生人侵害（含性騷擾）。

為確保訪談過程的順利，當前在受訪者有下列任一情況則予以排除：(1)目前正接受精神科治療並服用精神藥物者；(2)仍在接受心理諮商，且訪談過程中可能情緒不穩定或對其經驗之認知仍在變動者；(3)對過去兒時性創傷經驗記憶模糊者。

三、研究方法與程序

採用生命史研究，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作為深度訪談的工具，預定訪談四至六位符合相關經歷成年女性。

原則上，每位受訪者至少進行二次訪談，每次約 60-90 分鐘，實際訪談時間與次數視個別情況而定。二次訪談間最少間隔 7 天。

四、參與研究應配合事項

研究探討主題涉及敏感議題，所有受訪者皆為自願參與，並簽署訪談同意書再度確保其意願。待受訪者簽署同意書後，才正式進行訪談。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隨時中斷或退出研究。個別訪談逐字稿完成之際，將邀請受訪者們檢視各自訪談內容無誤，並有權決定資料的刪除與保留。研究完成後，受訪者可以向研究者索取一份訪談自己的逐字稿或研究摘要。

五、研究潛在風險與處理方式

本研究為深度訪談，內容詢問較隱私之問題，可能會引發二次傷害。訪談過程中將考量受訪者個人隱私及心理傷害，研究者隨時確保並觀察受訪者的情緒與反應，若因回溯過往經驗而有任何不舒服感受或情緒波動，參與者可於任何時間點向研究者提出暫停或退出研究，研究者將提供相關之輔導及諮商資源，或協助轉介性創傷諮商輔導資源。

訪談中若受訪者情緒失控，研究者須維持自身身心狀態的穩定，並協助受訪者平穩下來，如：帶著受訪者暫時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中，慢慢平靜。待受訪者情緒平緩後，由其決定是否繼續訪談。若無法繼續訪談，就停止該次訪談，並再約訪，若情況允許，下次訪談時將請受訪者談談情緒失控之原因；若受訪者欲退出研究也尊重其意願，並做後續追蹤與關心，如有必要將提供諮商輔導資源。

六、研究益處

本研究透過成年女性敘說遭遇性兒時性創傷之經驗及其與原生家庭關係變化之生命故事，進行重新的建構與探究。在各自獨特脈絡下嘗試了解每位受訪者在訪談時，如何在經驗流裡賦予條理和次序，使他們生命中的事件和行動賦予意義，觸發自我覺察與探索。

七、研究參與者之權益

1. 參與本研究您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2. 為感謝您參與本研究訪談，完成全部訪談後研究者將贈送您一千元禮券，以表達感謝。
3. **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可辨識您身分的紀錄與個人隱私的資料視為機密處理，絕對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仍將保密。中央主管機關及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在不危害您的隱私情況下，依法有權檢視您的資料。

4. **新資訊之提供**

過程中如有新資訊可能影響您繼續參與本研究意願的任何重大發現，都將即時提供給您。

5. **損害賠償或保險**

若您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良事件或損害，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但可預期之不良事件（如：情感性或心理性的傷害），不在此限。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6. **聯絡方式**

若您對研究有疑問時，您可以和計畫主持人聯絡，計畫主持人 曾莉雅，電話：_____ 手機：_____。

本研究已經過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內容包含利益與風險評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准。委員會係依規範運作，並通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查核認證之審查組織。若您於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認為權利受到影響、傷害，可直接與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中心聯繫，電話：05-2720411 分機 22236、E-mail：depthrec@ccu.edu.tw，或郵寄地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中心。

八、中止研究參與或退出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如果您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也不會有任何的懲罰，更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益（工作、修課或醫療照護）。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可透過電話、e-mail、機構轉述或當面聯繫說明進行，計畫主持人將會停止或終止對您的訪談。研究計畫主持人或

研究計畫贊助或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若您決定退出本研究(請勾選)：

同意研究者使用已提供之資料。

不同意研究者使用已提供之資料，研究者應將該資料銷毀。

九、研究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

無。

十、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本研究所得之研究資料皆妥善保存，並存放在只有研究者知曉的地方。保存期限為論文完成後五年(即保存至民國 116 年 08 月 31 日)，到期後將其資料予以銷毀。相關之紙本資料和電子檔案僅供學術論文使用並發表，不做任何其他用途。

十一、研究主持人/研究人員聲明

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說明者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的，及可能產生的風險與益處。

研究主持人

正楷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說明者 (擔任本研究計畫職稱：_____)

正楷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十二、參與者聲明

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說明者已完整地向本人說明本研究之性質與目的，且已回答本人有關研究的問題，同時也解釋本人有權隨時退出研究。

研究參與者

正楷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

附錄四、同意研究證明書

副COPY本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Tel: 886-5-2720411 ext:22236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同意研究證明書

計畫名稱：揭露兒時性創傷對成年女性親子關係發展之影響探究

送審編號：CCUREC110050401

計畫書版本及日期：第 2 版，110 年 6 月 9 日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版本及日期：第 2 版，110 年 6 月 9 日

計畫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曾莉雅研究生

計畫主持人計畫起訖時間：110 年 6 月 25 日至 111 年 8 月 31 日

通過日期：110 年 6 月 23 日

核准有效期間：110 年 6 月 25 日至 111 年 8 月 31 日

期中報告繳交截止日期：111 年 5 月 25 日

結案報告繳交截止日期：111 年 11 月 30 日

依照本委員會規定，凡研究期間超過一年之計畫，研究計畫每屆滿一年，送本委員會進行期中審查。請於有效期限到期一個月前檢送期中報告至本會。

計畫在執行期間計畫內容若欲進行變更，須先向本委員會提出變更申請。倘若計畫主持人於非核准有效期間收案，此同意研究證明書視同無效。若研究參與者在研究期間發生嚴重不良事件，計畫主持人須立即向本委員會提出書面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主任委員



連雅慧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副COPY本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168, Sec. 1, Daxue Rd., Minxio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 Taiwan (R.O.C.)
Tel : 886-5-2720411 ext:22236

Expedited Approval

Date : 24. 6, 2021

To : Ms. Li-Ya, Tseng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From : Prof. Bella Ya-Hui Lien
Chairperso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has approved of the following protocol:

Protocol Title :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fter the Early
Adulthood Women Disclosing the Childhood Sexual Abuse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in Taiwan) : Li-Ya, Tseng

Duration of research : From 25. 6, 2021 to 31. 8, 2022

Application No. : CCUREC110050401

Protocol Version and Date : Version 2 / 9. 6, 2021

Informed Consent Form Version and Date : Version 2 / 9. 6, 2021

Date of Approval : 23. 6, 2021

Valid Period : From 25. 6, 2021 to 31. 8,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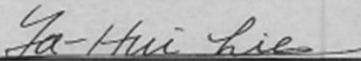
Submitted Deadline of Progress Report : 25. 5, 2022

Submitted Deadline of Final Report : 30. 11, 2022

According to the Committee's provisions, by the end of this period you may be asked to inform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your project. If this has not been completed, you may be requested to send status of progress report one month before the final date for renewed approval.

You are reminded that a change in protocol in this project requires its resub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Also,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must repor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promptly, and in writing, any unanticipated problems involving risks to the subjects. If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does not execute this project during valid period, this expedited approval will be regard as invalid.




Prof. Bella Ya-Hui Lien
Chairperso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